

彭尼·凯恩著

中国的

大饥荒

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

——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

彭尼·凯恩 著

郑文鑫 毕健康 戴龙基 等译

冀飞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美)凯恩(Kane,P.)著;毕健康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2

书名原文:Famine in China 1959~61;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ISBN 7-5004-1463-3

I. 中… I. ①凯… ②毕… II.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研究 IV. D6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华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2 千字 印数:1—15000 册

定价:6.50 元

目 录

图表.....	1
数字.....	2
致谢.....	4
中文术语说明.....	6
第一章 资料的搜集.....	1
第二章 饥荒的理论与实际状况	12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	30
第四章 人的因素	47
第五章 饥荒的范围和程度	66
第六章 饥荒期的死亡人数.....	100
第七章 求存机制.....	124
第八章 饥荒的后果.....	150
参考书目.....	181

图 表

- 2.1 饥荒指数序列
- 2.2 社区和个人对饥荒的反馈类型
- 3.1 中国 1400—1850 年间的自然灾害对钱慈其家族的影响
- 5.1 中国 1960 年受旱涝灾害影响的省份
- 5.2 中国 1952—1957 年的人均产量、人均产量增长和稳产情况
- 6.1 中国 1956—1965 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 6.2 中国 1955—1965 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死亡率
- 6.3 四川省南泉公社 1981 年、河南省 1982 年人口年龄金字塔
- 7.1 中国 1950—1968 年每千名妇女中初婚者人数
- 7.2 中国 1957、1970、1977 年成婚与头胎生育时间间隔
- 7.3 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及城乡差别
- 7.4 安徽淮北平原妇女各年龄段平均成婚与头胎生育年龄
- 7.5 中国 1910—1959 各年出生妇女的总生育率
- 7.6 中国 1950—1981 年每千名妇女特定年龄段生育率
- 7.7 南泉公社各男女出生段完成学业情况抽样调查
- 8.1 中国 1950—1981 年城乡出生率

数 字

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 1918 年莫斯科工人的家庭开支

4.1 中国的粮食产量(1952—1957)

5.1 中国 1957—1964 年的受灾面积

5.2 中国 1957—1964 年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

5.3 1958—1964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

5.4 中国 1959—1962 年粮食进出口额

5.5 1952—1958 年安徽征购额增长百分比

5.7 中国 1958—1959 年到 1960—1963 年人均粮食拥有量

5.8 中国 1959—1960 年各省份的粮食征购与消费

5.9 中国 1960—1962 年 12 省份全部人口人均粮食产量估计

量估计

6.1 中国官方和班尼斯特估计的中国 1953—1965 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6.2 中国 1953—1965 年的人口总数和增长率

6.3 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6.4 从中国 1981 年统计数字中整理出的特定年龄段死亡率的百分比变化

6.6 中国 1964 年 0—2、3—5 和 6—8 岁年龄段的情况

6.7 1953—1982 年中国婴儿死亡率

- 6.8 1953—1964年及1964—1982年各省人口增长情况
- 6.9 1964年安徽省0—2、3—5、6—8岁年龄段的人口数
- 6.10 1982年中国及部分省份18—20、21—23、24—26岁年龄段情况
 - 6.11 中国1959—196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率
 - 6.12 中国1959—1964年出生的年龄段的性别
 - 6.13 安徽1952—1964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
- 7.1 中国1953—1965年的出生率
- 7.2 1959—1961年中国饥荒对生育的影响
- 7.3 中国四川南泉公社各育龄段平均生育率间隔
- 7.4a 1982年对饥荒期间年龄段及其生育年龄的调查
- 7.4b 安徽淮北平原各年龄段生育率
- 7.5 中国1957—1965年生育率对比
- 7.6 中国1958—1965年农村基本结算单位(农村人民公社)的收入分配
 - 8.1 国家1953—1964年对农业的支援
 - 8.2 湖北荆州地区7种常见病的发病率(1979—1981)

致 谢

本书的写作完全出之于拉多·T·鲁齐卡的想法。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留意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以撰写一篇关于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论文。使我感到有些惊奇的是，我发现这方面的资料并不象过去常常想象的那么少。因而，我及时地完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并在死亡率社会与生物成因研讨会上提交了这篇论文。这个研讨会是由国际人口问题科学研究联合会和日本学术振兴会联合主办，1984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我十分感谢这两个机构的邀请，并提供费用使我得以成行。我也感谢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同行们，他们对我的论文进行了评论，我还要感谢乔纳森·米尔斯博士，他对论文初稿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和建议。

在准备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日益意识到有关1959—1961年困难时期有说服力的资料的数量，或者那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线索，而大会组织规定的篇幅限制使我越来越灰心。因而我决定，尽管关于1959—1961年中国饥荒有更多的资料有待于发掘，但是，一个至少能说明这次饥荒的主要原因、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和对这些地区的居民产生的后果的小册子，可能对当前的饥荒研究有所帮助，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主要之点。

许多中国人谈到这次令他们或他们的家庭难以忘怀的饥荒经历，他们的回忆录是无价之宝。我也从其他人那里获得

有益的批评、建议和鼓励，其中有，杰克·考德威尔教授、艾伦·洛佩兹博士、马丁·奥尔布罗博士和肯尼思·希尔博士。拉多·鲁齐卡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并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还在整个写作期间一直帮助我。当然，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对本书的错误或遗漏负责。本书是献给拉多的。

中文术语说明

斤 1.1 磅

里 1/3 英里

亩 1/6 英亩

两 计量单位，相当于 1 盎司银；19 世纪 70 年代约值 6 先令

元 中国货币；在 1949 年后的不同时期，1 英镑值 3—5 元不等；1 元=100 分

汉语和人名注释

每每涉及中国，就会出现中国人名问题。中国目前使用拉丁化的拼音形式，本书大体上遵循这种拼音形式。不过，在本书、尤其是在第三章中，我使用的资料里人名和地名用的是旧式拼法，而我把那些拼法原封不动地留下未改，除了用拼音容易辨认的拼法，比如在省和朝代这种情况下。后面各章的一些资料，例如引用大卫·克鲁克和伊沙贝尔·克鲁克或欣顿（中文名韩丁——译者注）的资料，仍用旧式拼法，我还是不想改变村名或人名的拼法。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计量制度。例如，在传统上，在中国的不同地区，1 斤或 1 里是有差别的。在本页的开头部分我们下了现代标准化的定义，而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提供的所有资料都使用这种标准的计量单位。但是，我只在利用资料中

的中国计量单位作内部比较时才使用中国的计量法，况且精确的定义并不比计量单位之间的关系更重要。最后，各省的边界和其它空间计量单位随时间而变化；我们应该注意，不要用不同时期的统计资料作比较。

第一章 资料的搜集

要不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生产和人口两方面的统计资料都缺少，那么用更明确的措词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评估也许是可能的。但是，正如阿瑟·史密斯博士在回答一名记者要求了解中国局势的“真相”时说的，中国没有真相，也没有事实。你只能根据在这个国家的经历说话，而不管你的居住时间有多长或你的观察力有多敏锐，充其量只能是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这是中国的博大精深之处。

这段话是从中国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的 G. B. 埃利斯顿口中说出的，半个多世纪前，马洛里在其名著《中国——饥荒的国度》（1926年）中引用了它。对于研究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对于孜孜以求探讨 1959—1961 年中国饥荒期间生产和人口问题的任何学生来说，这段话仍是资料的源泉。确实，在撰写本书时，我在人口统计学家和中国专家那里遇到的最普遍问题是，我到哪里寻找这个时期的资料？例如，直到 1982 年，中国政府才公布 1959—1961 年的人口总数和生存率；几年之后，他们公布了 1953 年以来其它年份的人口总数和生存率。

然而，事实上，现在拥有的资料来源比通常认可的要多一些。困难在于要找到这些资料，并在浩瀚的资料中分辨出

那些是只鳞片爪的饥荒资料。在多数情况下，在某篇全文或某本书（文章或书的标题可能与饥荒毫不相干）中，关于饥荒的资料只有附带提到的寥寥数语，本书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把这些零散的资料集中起来，就好像一个人在没有现成的七巧板图案做参照、而且本来就无法确定这些杂乱无章的部件能构成那个独特的七巧板的情况下拼成一块七巧板。令人惊奇且令人满意的是，大多数资料片断确实彼此相容；它们反映了相同的景象，揭示了始终如一的趋势和共同的经历。几乎没有发现相左的资料。因此，尽管根据将来发掘的资料，饥荒的详情、特别是各省在饥荒中的不同经历可能有些变更，但我认为，接受已拼成的七巧板、把它当作 1959—1961 年饥荒年间所发生的事件的准确轮廓是可能的。毕竟只是在最近三年里中国才对这些资料解密，从而在根本上使对这场大饥荒的任何研究开始成为可能。然而，如果认为新增的资料解密将解决这场危机存在的所有问题，那也许有些过分乐观。象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任何国家的饥荒很少如同人们期望的那样得到充分的记载。

中国官方统计资料

有关饥荒的资料来源可以分成几大类。第一类包括中国官方统计资料，它可再细分为人口统计资料、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其它统计资料以及外界的其它方面。多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统计资料引起国外人士的争议：这些资料零零散散，人口统计学家们常常怀疑它们的正确性。大多数统计资料根据的是人口出生和死亡登记；1964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没有立即公布，而好多年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过有人口普查这回事。不过，从 1978 年起，解密的人口统计资料

越来越多，并于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同年，中国进行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以前的生育行为等回溯性问题。如同1982年人口普查的许多资料一样，这次调查的结果很快就公布出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为了作比较，1964年人口普查的一些资料也公布出来（人口普查办公室，1982年、1983年）。

人们普遍认为，1982年人口普查（为此中国获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的大力帮助）做得很细致，普查结果具有很高的精确率。大家也同意，1964年人口普查看来做得不错，而且这两次人口普查反映出的人口趋势和布局有很强的连贯性。1982年人口生育率调查是一次全国性的、对33万多妇女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要求调查对象回答婚姻、生育史、避孕用具的使用和流产等问题。这次抽样调查不仅包括调查妇女本人、而且常常涉及其它家庭成员和邻居的详细讨论，尽管这次调查受到惯常的、老年妇女部分检索率问题的困扰，但它确实努力获取了许多结果，而这些结果从人口动态登记制度是无从知道的。人口生育率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历次人口普查和以往人口动态登记制度所显示的人口生育率总趋势和总格局（有关人口普查和人口生育率调查的可靠性的具体论述，请参阅考德威尔、布雷克等书，1984年；科尔，1984年；金坎农和班尼斯特；1984年；夏洛特，1984年；希尔，未标明日期）。

斯通（1982年，第205—245页）论述了中国的统计制度、尤其是统计制度在农业方面的应用。中国有三个主要系统：在全国、省和农村各级运行的中央系统；在每一级中与专职部门相联的系统；以及在公社和工厂里的统计资料搜集。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性的机构和统计工作的方针负责，它的统计资

料有两个来源：调查和标准的汇报制度。例如，在产量、农民家庭的收支和农产品成本等方面进行定期的分层调查。在各省选出约十分之一的县，在国家统计局的直接指导下，由这些县中有代表性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来完成这些调查。国家统计局也就各式各样的项目印发标准的汇报表，指定地方一级使用从各生产队收集到的原始统计资料填写这些报表。在动荡的年代里，这些统计资料汇编满是错误和瞒骗，因而国家统计局倾向于审慎地对待它们，而主要依靠自己的调查。除了自己的统计资料汇编外，国家统计局常常认可或订正由农业部独立搜集的统计资料。尽管中国统计的基本方法和各独立系统之间的合作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然而，总的来说，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相比，中国的统计资料是令人满意的，而且近年来，中国为改进统计资料的质量和连续性做了许多努力。

关于我们要涉及的这个时期，在按时间编排的所有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年鉴》于1983年出版之前，只能找到一丁点儿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又很分散。不管怎么说，本书所提供的1959—1961年统计资料的完整性和精确性仍是一大问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描述了在“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家统计局是如何编纂统计资料的（李成瑞，1984年）。他指出，相当多的统计资料是在地方一级收集的，纵然这些统计资料从未被适当地汇集或整理过。此外，为了编纂按时间编排、连续出版的统计年鉴，例如，统计学家们从几种统计资料来源，包括当地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及商业部门和粮食部门，收集农业产量方面的统计资料，并反复核对这些统计资料，他们还把这些统计资料与当地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作比较。许多回溯性的调查要求有好

多年的检索率，从而为进一步的核对或扩充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些统计数字的最终结果，李成瑞的评价是：尽管这些统计数字有某些“水分”，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因为它们以原始记录为根据，并经过反复核实（李成瑞，1984年，第6—7页）。

尽管李成瑞对所使用的统计程序的解释只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然而，我们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采取类似的步骤编纂大跃进时期的统计资料的。不过，这样做的话会产生一些大问题，因为那个时期的统计资料不是遗缺，而是歪曲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然而，尽管没有人会把《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任何单个数据当作百分之百的精确，但每一辑统计年鉴可能确实体现了统计的总体水平和活动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才使用这些统计资料；例如，在大饥荒年间揭示了产量的显著下降。

最后一种类型的统计资料是从中国某些特定地区的小规模调查中获得。两个特别有用的调查是：1984年拉夫利对四川省一个公社的人口生育调查和1985年杨泉河（音）对华北平原人口生育率调查的再分析。这两个调查都受到通常检索率的限制，但两者都对大饥荒在地方一级产生的婚姻和人口生育率后果有非凡的见解。

对大饥荒时期中国的研究

第二个主要的资料来源包括西方学者利用中文资料做的具体研究，尤其是对这个时期中国农业和中国政治的研究。特别在过去的二三年里，阐述中国饥荒岁月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面世，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了1976年以来能够获得的、比以前多得多的中文资料。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是麦

克法夸尔的巨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 1983年), 该书描写了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 并了解促使大饥荒到来的诸多事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沃克的《中国的粮食采购和消费》(1984年)。美中不足的是, 该书出版后不久, 中国官方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农业专题系列资料汇编。如果沃克能早些获得这些统计资料, 他也许会修正他的某些论点, 或者对某些问题采取另一种看法, 不过, 他的统计资料, 尤其是省一级甚至更低一级的资料仍极为有用, 这些统计资料是以一点一点解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 并花几年时间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我只在引用大饥荒时期按人口计算东西的情况下, 才修正他的那些计算结果。沃克没有得到1959—1962年中国官方统计的人口总数数据和城市/农村的人口数据, 因而他对中国总人口的估计不太准确。最大的差别在于计算城市人口时, 他远远低估了中国的城市人口, 因而他对农村按人口计算的结果需稍作修正。另一部尽管有争议但有趣的中国农业研究专著是拉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食消费》(1983年)。

据我所知, 只有两篇短论文专门探讨了这场饥荒, 即伯恩斯坦撰写的论文(1984年)和艾什顿等人撰写的论文(1984年)。伯恩斯坦对采购制引人入胜的论述极为有用, 而正是采购制加速了大饥荒的到来, 他的论述只是因他与珀金斯共同提出的假设(1969年)而不那么有力了, 即政府征集粮食、分配粮食的能力避免了死亡人数的大幅度增加。我们现在知道,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伯恩斯坦的信仰也许促使他过分地把重点放在征集制的水平上, 而忽视政府所面临的减灾必要性。艾什顿等人的论文(1984年)勾画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导致这场饥荒诸因素的轮廓, 另有希尔对这场饥荒做了

人口分析的尝试。为了对这场饥荒做出分析，希尔（未标明日期）对历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人口生育率调查提供的统计资料作了一些极为复杂的修正，而这些修正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令人惊讶和难以置信的结果。由于受到人口统计资料的限制，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使用这些统计资料时作最小限度的修改，并明确标明，根据这些统计资料得出的估计，则只能是近似的。

私人回忆录和人类学研究

由于从政治文献中；从中国人、外国居民和那个时代访问中国的人士所撰写的新近和同时代作品中，以及这场大饥荒的幸存者提供的内情或轶闻趣事中，搜集到这个时期的参考资料，从而在某种速度上弥补了统计资料的不足。这类回忆录也往往是启发性的，而不是结论性的。这也没有什么惊奇之处。确实，饥荒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1979年肯尼亚人口普查期间，为了确认出生和死亡，调查员列出一串重大事件，当他们在半干旱地区与有文化的居民谈及最近一百年间许多人知道的30件事时，其中15件是饥荒或发生的事件直接与粮食供应不足有关（卡尔森，1982年，第6页），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忆那些事，更不用说在作品或演说中描述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时期和他们遭受苦难的时间长短。一位资深的、基本上还算坦率的干部只是告诉我：“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代”，而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这场饥荒流露出兴高采烈的心情，为此，韩素音感到如此震惊，以至差不多有20年不愿写这场饥荒（韩素音，1980年，第318—319页）。当她记述自己在

这场饥荒中的经历时，贯穿其中的一条线是那些遭受饥荒的人的耻辱，而他们的自尊心不容许他们承认蒙受的苦难。

我的朋友都瘦了，瘦了好多！谈论他们体重下降是不礼貌的事！人们必须说：“你身体很好。”尽管有些人在傍晚下班回去时拖着疲惫的身子，空着肚子摇摇晃晃，他们却满脸堆笑地回答：“是的，我们身体都很好，我们有吃的”（韩素音，1980年，第283页）。

甚至她四川老家的亲属也只接受她的一顿聚餐，而不愿接受更多的馈赠。

韩素音有一半中国血统，并在中国长大。当大饥荒来临时，她已年年访问中国，因而处在有利的地位来观察饥饿给她的家庭和朋友带来的微妙变化，尽管那时，这些变化不太明显，“……他一直很瘦，现在脸更瘦了，很难认出来。1962年我再次见他时，我才更意识到1960年他是那么的消瘦”（韩素音，1980年，第280—281页）。

对埃德加·斯诺而言，这些细微的变化并不明显，1960年的访问是他自1945年以来首次重返中国。上次他看到中国是在中国八年抗战结束之时，那时中国内战正酣，因而他低估亲眼目睹的灾难的程度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斯诺，1966年，第619页）。韩素音道出了斯诺的困惑之处：“他不能接受粮食短缺这样的事实。粮食短缺是公开承认的，然而，他所到之处看到了巨大的进步。”健康、安全、消费品、生产等方面的真正收益使他很难看到危险信号。也有这样的可能，即中国人尽量避开他，甚至那些了解和钦佩他的人亦如此，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美国人，那时美国是帝国主义威胁

的标志（本书第5章将讨论斯诺对这个时期中国粮食短缺的估计）。

另一位在中国度过童年的小说家也写过这场大饥荒的“耻辱”，她生就中国人的一种性格，埋怨“消息传到国外，丢了中国的脸”（赛珍珠，1984年，第227页）。这种耻辱可能是所有耻辱中最大的，因为中国革命结束后，农民们感到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他们已经“站起来”了，现在是通过食品和好客赢得“一点自尊”的时候了（费孝通，1983年，第193页）。

“站起来”并不仅仅意味着用一个领导人取代另一个领导人；共产党人是一种远更深刻的变化的象征，即最终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信仰体系。没有比人与土地的关系更能说明这场革命的重要性。从前，皇帝充当臣民和土地之间的中间人，现在，中国革命告诉农民们，他们不需要中间人；土地属于他们，他们将使自己的土地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

另一个由外国人做的、有关那个时代的一些记述是伊沙贝尔和大卫·克鲁克撰写的《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1966年）。河北杨仪曾是共产党抵抗区的核心，1948伊沙贝尔和大卫·克鲁克在其中一个村子中住过10个月，撰写他们的巨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变革》（1959年）。因此，当他们回到中国时，他们就更能对1959年和1969年夏季这个地区的状况进行比较了。不过，伊沙贝尔和大卫·克鲁克从中国内战以来一直居住在中国，并在此任教，还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因而，他们在描述水旱灾害时，闭口不谈灾害对这个地区居民的影响。因此，他们对大跃进和1959年、1960年气候条件的叙述比对作为任何危机的标志的叙述更有价值——尽管人们认为这个地区只在1960年发生过旱灾，而直到

次年，粮食的严重短缺才暴露无遗。

稍后，有个名叫威廉·欣顿的外国人设法再次体验大饥荒时期的某种生活。1971年，欣顿回到山西省长弓村（即张庄——译者注），这是他早年对中国革命进程进行伟大研究的地方。著有《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在1971年前后的历次访问中，他为续写该村的历史搜集资料，第二卷题为《身翻》（1983年），叙述到1971年。《身翻》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文化大革命对这个村庄和这个省的影响，相对而言，几乎没有留意1959—1961年的大饥荒。然而正如我所用的引语阐述的，无论对饥荒的叙述有多少，都是有启发性的。

统计资料的局限

根据以上所述，大家也许已经清楚，关于这场饥荒，某些方面的统计资料较为完整，而其它方面的统计资料相对残缺。甚至在中国，迁移的统计资料也极其缺乏，而且这一时期保存的任何统计资料都没有公诸于世。所有的迹象表明，关于中国人对这场大饥荒的反应，我们的知识中存在严重的空白。这方面资料的缺乏与更进一步的统计资料局限关系重大，尽管有明白无误的迹象显示，在各个地区或作物栽培区，这场饥荒的后果并不相同，但我们还是缺少地区、省或县一级的饥荒资料。

由于1982年人口普查中各省统计资料和计划中中国各省人口资料系列汇编的及时出版，从而将在某种程度上修正这一局限；比上述做法更有用的是公布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省的统计资料，然而据我所知，中国方面还没有这种打算。如果将为编纂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作准备的历年统计资料

分散开来，为各自出版一部统计年鉴，那么，我们对这场饥荒的阐述会更加清晰。当然，我又无从知晓这样的计划。

最后，关于这场饥荒中的流行病学仍有更多的问题有待商榷。一般而言，人们可以说在一场饥荒中直接死于饥饿的人屈指可数；更为普遍的人，营养不良造成对传染病和其它疾病的抵抗力不断削弱，结果导致死亡。50年代假使中国的卫生保健事业已初步发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人们感兴趣的是，在这次特定的饥荒环境中，哪些疾病流行，而卫生系统又是如何设法战胜这些疾病的。

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和其它问题仍有待于我们来回答，那么，想找到答案的愿望就不仅仅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的结果。直到最近，无论是中国的饥荒，还是世界其它各地的饥荒，都仍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有这么一个假设，不管它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认为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对付饥荒这种局面，饥荒将不再大规模地发生。遗憾的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萨赫勒和孟加拉国发生的饥荒事件使之有必要修正这一假设。正如下一章所描述的，这些饥荒事件也表明，直到对饥荒的原因和人们对饥荒作什么样的反应有更好的了解，避免饥荒或控制饥荒以及把死亡率降到最低限度等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此，任何饥荒研究都是这么一个尝试，即它不仅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而且有助于增进我们控制这些悲惨的、可怕的危机的知识。

第二章 饥荒的理论与实际状况

“饥荒”一词被用来指各种各样的情形，包含一系列的
定义，尽管在过去，这些定义的范围受到某些限制。如同巴
蒂亚指出的（1967年，第1页），“由于惯常食品供应不足，一
个地区的居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这一定义只适用于最基本
的经济条件。他论证说，甚至在食品充裕，但对许多居民来
说价格太昂贵时，现代饥荒也常会发生。最近，阿拉姆格阐
述了这个论题，并把饥荒分成三种类型：全面饥荒遍及整个
国家或者至少一大片地区；地区性或地方性饥荒限于一个国
家内的一个特定地区；阶级饥荒是那儿的过量死亡主要或全
部限于居民中的各个亚群体。他认为，虽然有例外情况，但
历史上，饥荒已从全面饥荒转为地方性或地区性饥荒，现
在正在成为阶级饥荒（阿拉姆格，1980年）。

阿拉姆格也论证说，在识别饥荒时，营养不良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衡量标准。他断定，一个全面的饥荒定义会明确地把过量死亡作为关键性特征，以区分饥荒定义和牵涉到食品匮乏及营养不良的其它公共危机之间的不同。他还断定，这一定义应该与以往的饥荒指数相符，并指出最终造成过量死亡的饥荒状态的最近时期。

以上所述说明，人们现在把饥荒看成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状态，一种比单一的自然灾害后果更加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研究，需要对饥荒过后的指数加以识别，

也需要认清人口统计的意义。在过去几年里，人们对饥荒做了一些形容，致力于上述问题中一个或更多问题的研究。

森为发展饥荒分析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最重要的尝试（1981年）。象巴蒂亚一样，森批驳这种主张，即饥荒是由食品供给的减少引起的，其理由是，即使没有全面的、严重的食品供应减少，饥荒也会经常发生，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就是一个例子。况且，甚至在食品供应严重减少的地方，饥饿的因果机制也包括众多的其它可变因素。他提出一种更有用的总体框架，牵涉到食品权利这一观念：个人和家庭获得货物以便得到充足的食品的途经，或人与食品资源的关系。有些关系是单一的，如农民种植何种农作物的权利；直接权利。其它权利中有更为复杂的贸易权利，如游牧民族用动物换取粮食的权利。有些权利与市场有关，个人用他的手艺所得换取食物；其它权利即公共政策，如就业津贴或政府救济（森，1981年，第159页）。邦加茨和凯恩（1982年，第54页）提出一组更深层的权利：依附权利，例如，在孟加拉国这样的社会中，依附权利是重要的权利，在那里，妇女被排除在许多农业活动之外，不能从事领取工资的雇佣工作。因此，她们被置于经济上依附于男人的地位，经常通过男人，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儿子，确立她们的食品权利。妇女不得不依赖的男亲属反过来取决于她生命周期中危机发生的一瞬间：即她是未婚姑娘、妻子，还是寡居的母亲。这两位作者指出，在所有社会中，幼童都享有这类权利，对妇女进行归类的重要性在于，社会与社会之间依附权利并非一成不变，因而研究妇女面临的特殊风险在分析上是重要的。

食品权利的基本构成和威胁这一权利的事件或环境的趋势都是影响个人和家庭的因素。单个农民的作物歉收将影响

他的直接权利和其家庭的依附权利。一场更大规模的旱灾或水灾可能导致直接权利和贸易权利更多的丧失，因为贸易权利易受到劳动力需求不旺、就业不充分或失业、以及购买力下降的打击。不顾及自然灾害的价格上涨对那些与贸易权利有关的人的影响比对那些拥有直接权利的人的影响要大；配偶的失业或死亡或离婚可能对依附权利产生影响。

“把饥荒看成是经济灾难，而不只是食品危机”的权利方法（森，1981年，第162页）以及在不同的饥荒中权利丧失的不同类型之间进行的比较，都对了解饥荒的准确起因，制订预测、救济和预防政策起重要作用。遗憾的是，森没有做这样的尝试，即检验权利方法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如何起作用，而不只是提到“在完全的管制经济中，每人仅仅得到分配给他的那一份日用品”（前引书，第45页），以及该理论框架中的这一重要领域仍有待于探索，云云。

对了解饥荒作出第二大贡献的人是阿拉姆格（1980年）。他主要涉猎饥荒的起因和“饥荒指数”的识别，后者将提供预警系统，使在饥荒初期进行国家干预或国际干预成为可能（阿拉姆格，1980年，第393—404页）。被识别出的指数分成几组，以便反映即将到来的危机时期（见表2.1）。

第一组，即饥荒初期警告系统指数是根据这一方法归类的，在这一组中，指数反映了诸如生产、进口、出口、漏损量或贮存等方面的变化。这一组的警告信号能使国家机构或国际机构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即将发生的食品危机。第二组包括第一、二、三级饥荒前综合症指数，这些指数使对国家干预或国际干预的成效进行检验成为可能，如有必要，预防措施和救济措施都已开始实施。最后一组是饥荒综合症指数，发出危机信号，即饥荒正在发生，需要采取紧急救济措施以

挽救生灵。

对所列的指数进行扩充和精简以便提出一个更灵敏的警告系统是可能的。但是，这个模型确实体现了把所谓的饥荒进程系统化的一次重要尝试。与其说这个模型本身存在的任何局限性削弱了它的效用，不如说各国政府不愿意利用这个模型更能削弱它的效用。在饥荒问题上，一个更为不幸的方面是，在国内或国际政治危机期间，饥荒时常发生，而且饥荒部分是由政治危机引起的。在政治危机时期，各国政府认为，承认饥荒就是承认缺点或者甚至承认失败。过去40年间，在历次重大饥荒——1943年孟加拉省大饥荒、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1974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中，政局紧张促使政府极力否认危机，甚至在危机成为大规模的灾难后仍是如此。

第三种饥荒模型是由邦加茨和凯恩（1982年，第44—59页）提出来的。这一模型显示出，在一个生育率高、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一次为期约半年、中等严重的饥荒期间或饥荒结束后不久（饥荒的开始和结束有很明确的标志），饥荒的人口反馈可以预测出来。它表明，死亡率上升是饥荒中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后果，死亡率的总体格局分为三个阶段。在饥荒发生期间，死亡率日益迅速地上升；在饥荒终止时，死亡率达到高峰。此后，死亡率才逐步下降到饥荒前的水平，因为那些遭受饥荒的人，他们虚弱的生理状况使疾病夺走更多人的生命。最后，饥荒过后一年或更长时间，死亡率下降幅度很大，降到饥荒前的水平以下，并在几年时间里维持这种局面。这是因为到那时，居民中最易受饥荒打击的亚群体极有可能在饥荒中幸存下来，并且从此以后继续活下去。大体

上，饥荒死亡对居民中最贫穷的群体包括无地农民的影响最大。用母乳喂养的婴儿在某种程度上能免遭饥荒的影响，但是，随着出生时体重下降、疾病蔓延、营养不良越来越普遍，婴儿死亡增加。1岁以上，尤其是1—3岁这个年龄组的儿童特别易受饥荒冲击。在老年人、孕妇和哺乳母亲这一组中，死亡率也很高。

在一次为期不长的饥荒期间，虽然新生儿出生时体重下降，死胎数量增加，但生育率实际上仍保持稳定。然而，饥荒过后9个月，出生率下降，而且出生率下降幅度与饥荒的严重程度成正比。造成出生率下降的因素包括生育率下降、男子性功能衰退（艾克罗伊德，1974年，第18页）、性交次数减少、自愿节育增加和结婚推迟。饥荒结束后不久，受孕率恢复很快，在3年内，人口出生率可能超过饥荒前水平。

对饥荒造成的迁移不太好预测，它取决于特殊的环境；一般而言，在饥荒期间，从受灾地区往外迁，而在饥荒结束后，又回到原来地区。不过，如果受灾地域很广，在饥民附近救济中心又很少，那么迁移的人也许很少。饥荒之后移民回到原地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对恢复正常状态的期望值。

邦加茨和凯恩指出，饥荒的人口反馈对受灾居民长期的总体规模没有什么影响；人口出生率的波动比死亡率的波动幅度小，饥荒后的高生育率通常弥补了先前的人口损失；死亡也许在短时期内减少人口总数，但在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如孟加拉国，1974年饥荒造成全国2%人口的死亡，但每年3%的人口增长率使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恢复到过去的人口规模。他们指出，饥荒本身可能使人口高增长率这种状况不断持续下去，高风险的环境诱发了高生育率这一反应，或者对自然生育率不做限制，这反映出孩子作为一种保险形式

是有用处的。

雨果（1984年，第7—31页）为了提出社区和个人对饥荒的一种反馈模型，强调特定的人口反馈而详细阐述了邦加茨和凯恩的模型。雨果把长期调整和短期调整区分开来，也把在饥荒地区发生的那些事与离开受灾区的个人和群体发生的那些事区分开来。雨果论证说，第三世界国家近来发生的饥荒有这种迹象，即永久迁移和临时迁移成为目前对饥荒所做的最普遍、最重要的调整。在这一点上，要区分永久迁移和临时迁移也许是困难的，因为许多迁移活动起初被视为一种短期反馈，结果却是永久性的人口再分布。人口迁移领域甚至比饥荒人口学的其它方面更备受冷落。雨果的论述突出了对饥荒人口学做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性，不仅有助于自然灾害干预方案和政策的部署与贯彻，而且由于这一观点加深了我们对人口统计基本方法的了解，使得我们在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流动的变化诸方面，朝更加全面的理论模型迈进。

对饥荒的人口反馈的考察可能在大体上为了解人口行为的性质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这一考察能用来证明，对饥荒的人口反馈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正常”行为——例如，没有给妇女、儿童或老人优先权——那么，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人口行为和人口变迁。另外，如同邦加茨和凯恩指出的，一个经常受饥荒威胁的人为了把饥荒的影响减到最低限度而可能形成长期的人口机制。

过去40年间发生了一些饥荒，对特定饥荒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解这些饥荒的理论贡献和概念贡献的依据。通过对1943—1944年孟加拉省饥荒的研究，森创立了交换权利理论。格里诺（1982年）对同一次饥荒做了调查，把这次饥荒置于更广阔的文化 and 人类学框架中加以考察，但在同时，他

表 2.2 社区和个人对饥荒的反馈类型

内部调整		短期调整					外部调整	
每日规定的食物量	死亡增加	生育率降低	就业	外援	临时流动	永久迁移		
食品匮乏 营养食品较少 食品的不同种类 杀野生动物或家畜 营养不良 体重减轻 家庭内有组织的禁食	溺婴 传染病发生率较高 营养不良 易受害群体(老人、婴儿等)中过量死亡 社会经济和空间差异	流产 禁欲 晚婚 哺乳期延长 生育率降低 性交次数减少	找农活 在新的地区耕种和放牧	居住在其它地区的亲属汇款 政府和国际援助	游牧放牧 改变季节性迁移 移居 农村——城市流动	移民 农村——城市迁移 在新农业区定居		
内部调整		长期调整					外部调整	
每日规定的食物量	死亡增加	生育率	就业	外援	临时流动	永久迁移		
食品匮乏 营养食品较少 食品的不同种类 身材较小	溺婴 传染病发生率较高 营养不良 易受害群体(老人、婴儿等)中过量死亡 社会经济和空间差异	由于为反危机“提供保障”而上升 由于较低生育力,死亡人数减少	找农活 在新的地区耕种和放牧	居住在其它地区的亲属汇款 政府和国际援助	确立固定的季节性迁移方式 确立固定的迁移方式	移民 农村——城市迁移 在新农业区定居		

资料来源: 雨果, 1984年

对饥荒原因的分析与森的分析在方法上一点也不矛盾。按人口计算获得稻米数量的逐渐减少，以及无地农民和雇佣劳动者（他们的低收入迫使他们依赖雇主的施舍）数量的增加，改变了交换权利的平衡。低效率的粮食市场体系、战乱、当地自然灾害、政治纷争和失灵的市场干预，所有这些都造成大部分居民的权利减少。“控制资源的男人们——地主、耕种者、户主——声称他们无力养活所有那些习以为常地依靠他们提供食物和保护的人”（格里诺，1982年，第138页）。

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是阿拉姆格对饥荒进行研究的主要焦点，大部分人口的实际收入（交换权利）急剧下降也被视为低水平均衡遭到破坏的一种主要解释（阿拉姆格，1980年，第三章）。不过，阿拉姆格论证说，这次大饥荒并不只是交换权利减少一事：地方性和季节性的食品供应不足也促使饥荒发生。在论述1943—1944年孟加拉省饥荒时，森和格里诺都否认饥荒与粮食短缺有关，虽然巴蒂亚（1967年，第321页）认为，粮食短缺是在这场灾难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迄今为止，调查饥荒以致发展起一个因果框架的唯一尝试是由阿拉姆格做的。阿拉姆格在创立自己的模式时把孟加拉省大饥荒和孟加拉国饥荒都考虑在内，因此，他的模式包括这两场危机中事件的后果。他的一些指数可以与考德威尔、雷迪和考德威尔（1984年）所做的对处于饥荒边缘的人的特定研究相参照。1983年，他们对卡纳塔卡地区9个周期性干旱肆虐的村庄进行研究，发现那时确实有一场旱灾，结果造成作物歉收。这些村庄没有发生过量死亡，但是，如果发生的话，农民们也不会知道；他们说不清旱灾是不是会持续到来年。因而，短期战略一半基于希望，而另一半基于恐惧。这些战略包括减少食品消费量（尤其是减少妇女、儿童和老人

的食品消费量)、晚婚和避免生小孩，卖家畜和举债。有趣的是，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迁移或卖珠宝和其它贵重物品的现象。相比之下，1943年在孟加拉，卖珠宝是经济灾难的最初迹象之一；随着这场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卖日用杂物如铜壶，最后发展成卖手艺人用的工具。只有当形势变得绝望时，才会卖家畜，然后卖土地（格里诺，1982年，第196页）。根据进一步的证据，我们需要修正阿拉姆格模型中“饥荒综合症指数”这一栏，把“财产转让”移到“饥荒前综合症指数”这一栏中的第三级指数内，与其它指数如信贷需求的增加归在同一组。

对卡纳塔卡地区饥荒的研究也证实了邦加茨和凯恩提出的假设，即易发生饥荒的环境引起高生育率。这两位作者认为，在这个易受饥荒打击的地区，长期战略首先基于农民对农村收入不稳定的认识。因此，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农民们至少设法让某些家庭成员接受教育，为自己的儿子们不做农活做准备，能在城市地区工作更好，为的是在危机期间，儿子们能用现金收入资助家里。同样，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宁愿把女儿嫁给在城市工作的人，也不愿把她们嫁给殷实的农民。这两位作者指出，这些长期避险战略不会使家庭规模有任何缩小，因为为了扩大保险系数，家庭需要足够多的孩子。

评述对饥荒的人口反馈的论文数量也相当有限。邦加茨和凯恩在其模式形成过程中大量利用马特拉布周围地区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由霍乱研究实验室（现在是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收集的。最近，雨果也大量利用马特拉布地区的人口登记资料，他指出，从本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74年饥荒发生，那个地区拥有的人口调查系统覆盖着约26.8万人，这是

“在易发生饥荒的地区缺少人口资料的……一个显著例外”（雨果，1984年，第14页）。特别是，这些资料能使我们对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一个受灾区进行详细的考察。

在1974年饥荒期间，婴儿死亡率和10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45岁以上成年人的死亡率都急剧上升。育龄妇女（在孟加拉国，她们的死亡率通常比同年龄段男子的死亡率高）继续保持较高的死亡率，而在1—9岁的女孩中，死亡人数中较高的两性差别尤为突出（陈和乔杜里，1977年）。1974年全年，粗出生率维持原有水平，1975年第一季度粗出生率下降，而在第二季度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21.9%。直到1976年，粗出生率才恢复到饥荒前水平（鲁齐卡和乔杜里，1979年）。

在马特拉布，这次饥荒期间的婴儿死亡率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的显著差异，实质上，较穷的群体受饥荒的影响更大，而在正常时期，这种差异不很明显。另外，婴儿死亡中的两性差别颠倒过来，在这次饥荒中女婴的死亡率较高。在居民中，最穷的群体的总死亡率比最富的群体的总死亡率高3倍。在最富有的群体中，结婚继续进行，这个群体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只及最穷群体生育率下降幅度的一半。1974—1975年，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下的男子中，从马特拉布地区迁移出去的人大量增加；不过，迁移主要是临时性的，一俟饥荒结束，这些男子又回到原地。在这次饥荒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男子仍留在自己的村庄里，但是，饥荒结束以后两年，他们的迁移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次饥荒的经历“促使他们寻找稳定的城市职业”（拉扎克，1985年）。

阿拉姆格也着眼于1974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人口后果，他利用了1974年11月进行的、对8个村庄和8个食品分发

中心所做的一次调查。第三季度即8—10月份的粗死亡率：食品分发中心的居民是每1000人中死122.8人，受饥荒影响的村民和不受饥荒影响的村民分别为每1000人中60.4人和每1000人中37.6人，而正常的死亡率估计值是每1000人中19.4人。结果，他估计，不包括食品分发中心之外的城市死亡人数和饥荒造成的过量死亡总数为约150万人，因而，这场饥荒“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现象”（阿拉姆格，1980年，第143页）。饥荒期间成年人和儿童的死亡率差别比正常年头的死亡率差别明显，而在饥荒地区，这种差异更为显著。遗憾的是，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让我们确定所有年龄和性别的死亡率模式，况且与女性相关的成年男性死亡率问题仍不清楚：无论是在饥荒的村庄还是在未遭饥荒的村庄，女性死亡率都超过男性死亡率，但在食品分发中心，情况刚好相反。

在1845—1849年的爱尔兰饥荒中，婴儿和老人的死亡率似乎也比较高。对这场饥荒统计论据的最新研究（博伊尔和奥格拉达，1982年）表明，在约850万居民中，有100万人左右的过量死亡，男性的死亡人数比女性的死亡人数多（虽然这种差别比较小），而从婴儿出生至4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差不多全部死于饥荒，紧随其后的是60岁以上（包括60岁）这个年龄段。

在1943年孟加拉省饥荒中，人口行为更加扑朔迷离。1944年7月，印度政府成立一个饥荒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这场饥荒的原因，南印度库努尔营养研究实验室主任W.R. 艾克罗伊德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艾克罗伊德的任务之一是预测饥荒的死亡人数，后来他描述了这项任务的困难之处，即除了已记录的死亡外还要预测其它可能的死亡（艾克罗伊德，1974年，第77页）。他后来认识到，他的估计即1943年有100

万人的过量死亡，1944年又有50万人的过量死亡太低，“那时我们不可能象现在一样意识到；大部分饥荒死亡发生在婴儿和儿童中，而那些年龄段的死亡可能在混乱的人口中没有留下记录”。不过，他认为，他对饥荒死亡人数的低估不象后来有人所说的那样严重。

造成他的估计与后来的估计之间出现偏差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估计是在1944年做的。在确定饥荒的持续时间方面出现了问题；森和格里诺都论证说，虽然1944年以后食品状况已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因为与饥荒相关的流行病，至少直到1947年，也许迟至1951年，死亡率才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传统所估计的150万人的过量死亡应增加至少300万人，可能还要多（森，1981年，第195—216页；格里诺，1982年，第299—315页）。

根据森的观点，除了因“热病”引起的各种死亡这一类别外，造成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依次递减）：疟疾、霍乱、痢疾、腹泻和各类伤寒以及天花。在饥荒期间，饥饿似乎不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部分是因为在报告死亡时，不把饥饿当作典型特征加以单独分类，还因为死亡的近因如腹泻等更符合传统上的分类。流行病不仅仅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而且也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例如，饥荒对卫生设施、供水和其它使人舒适的民用物品的影响；由于寻找食物的活动而增加了与疾病传染媒介的接触；以及由于贫困和公共卫生设备的损坏而不能获得治疗。除了肺结核没有较高的死亡发生率迹象外，其它的主要杀手是那些在正常时期已经流行的疾病。各种主要的死亡原因在增加的死亡总数中所占的份额是：疟疾36.7%，霍乱7.1%，痢疾5%，以及“各种热病”27.4%。

相对而言，农业劳动者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最多。在其

他群体如渔民、运输工人和农业地区的非农业劳动者中，死亡发生率也较高。在加尔各答，大多数因饥饿而死的人是那些迁移到城市里的赤贫者；原有的城镇居民受到食品分发计划的保护。然而，1943年以后，城镇居民蒙受因饥荒引发的流行病的严重打击，可能是因为城市里极为拥挤的人群使疾病易于传播。

与通常人所持的观点相反，森认为，在孟加拉，1943年饥荒之前和饥荒期间（至1946年）的死亡率性别比很相似，尽管在1943年饥荒的高峰期，男性死亡人数稍多于女性死亡人数。虽然饥荒期间儿童死亡率很高，但在所有的过量死亡中，儿童死亡比例与饥荒前相似，饥荒期间老人死亡的比例也与正常时期相似。按月计算的季度死亡发生率也反映出正常状态，尽管显得略高些。“这场饥荒似乎通过增加每月的死亡人数、使死亡高峰人数比较多而产生影响。……虽然这是一场大饥荒，但主要还是通过对该地区已经存在的疾病和死亡雪上加霜而杀死人”（前引书，第215—216页）。

森的这一观点受到格里诺的挑战。格里诺断言“饥荒年间的死亡分布显示了一个有别于正常分布的格局，人们可以断定，饥荒死亡并不是饥荒前死亡趋势的简单增大或加深”（格里诺，1982年，第313页）。根据一次抽样调查中未发表过的资料（这次调查是由印度统计协会做的），格里诺断定，尽管在1943年所有年龄和性别的死亡人数增加，但在那些类别中死亡人数的分布很不均匀，不存在死亡人数增加的简单模式。总的看来，在几乎所有类别中，女性的死亡人数有少量增加。50岁和50岁以上的男性构成受饥荒影响最深的一个类别；男女两性构成受饥荒影响最小的一个类别是20—30岁这个年龄段。育龄妇女从这次饥荒中获得真正的好处：随

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她们活下来的机会增加了。

格里诺怀疑把重点放在婴儿和育龄妇女身上的饥荒救济计划的实际效果。他的怀疑部分基于自己的调查结果，即婴儿和育龄妇女的危险较小，而部分是因为在某些文化环境中，几乎不可能把食物从成年男性那里拿走。“在这场饥荒的重压下，共同居住、人人有份的强有力家庭观念让位于家庭延续这一更强有力的观念，而家庭延续最终取决于成年男性”（格里诺，1982年，第224页）。这种行为方式的另一个影响是，饥荒期间家庭解体的发生率很高：婴儿被父母亲抛弃，妻子被丈夫遗弃，还有妻子被赶出家门的。家庭解体是饥荒期间发生迁移的主要原因，迁移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寻找食物而“盲流”，另一种是决意进行更艰难的尝试，到城市地区特别是加尔各答去，那里的食品供应比较好。

1921—1922年的苏联饥荒以盛产谷物的伏尔加地区为中心，据估计，有300万人死于这场饥荒。1914—1918年的战争和俄国革命引起的国家进一步解体使农事荒废，产粮区产不出粮食，结果是几乎一半的可耕地没有耕种。协约国的封锁和外国拒绝给苏联商业信贷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1920年部分地区雨水不足和1921年的旱灾导致这一局面：至1922年，俄国有100万平方英里和约3000万居民受饥荒的影响（艾克罗伊德，1974年，第91页）。1920—1921年彼得格勒学龄儿童的平均身高比前几年的平均身高矮，而影响最明显的是9—11岁这个年龄段（索罗金，1975年，第48—49页）。体重减轻也是普遍现象，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浮肿经常发生。在儿童中，“神经机能衰弱症”表现为沮丧、易流泪和极度烦躁；在成年人中，愤怒和烦躁是普遍现象（前引书，第64页）。智力和劳动生产率都下降。除了谈论食品外，

几乎没有人谈论或思考其它任何事，“不论你到哪里，不论原先的话题是什么，谈话最终转到食品问题、配给卡、黑市、食品费用和获得它们的途径”（前引书，第75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1918年（那时食品供应已极为匮乏）莫斯科工人家庭的开支比较显示出，不仅食品支出的百分比有显著变化（这是以牺牲几乎其它所有类别的活动为代价的），而且工人们事实上不再向老家亲属汇款（前引书，第98—99页）。见表2.1。

表 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 1918 年莫斯科工人的家庭开支

类别	支出 (百分比)	
	战前	1918年
食品	37.3	76.7
住房和家常开支	12.0	3.8
服装	12.8	3.8
卫生用品	4.2	3.0
文化需求	2.6	2.2
给农村亲属汇款	27.6	2.2
其它	6.3	6.3

资料来源：索罗金，1975年

在彼得格勒，饥饿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尽管官方威胁说，偷窃者要挨枪子儿的，但从集体菜园中偷菜仍“司空见惯”，城镇居民赶到邻省，甚至冒得斑疹伤寒或被特别卫队射杀的危险，用所有剩余财物交换食品（前引书，第103页）。卖淫成为普遍现象，而人吃人的惨剧也曾发生过。婴儿被疯狂的母亲闷死，或者被遗弃，或者卖给别人。由于食品匮乏和重体力劳动引起的妇女经闭人数显著增加，冒怀孕风险的

妇女人数减少；其它避孕方式包括推迟结婚或不结婚以及“为了避孕而采取反常的性欲满足方式”（前引书，第111—128页）。索罗金的描写引起人们对中国饥荒的背景的兴趣，因为索罗金提供了一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早期岁月受饥荒影响的珍贵画面。

在1941—1943年彼得格勒被围困期间，饥荒是居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一。安东诺夫描述了1942年一年中饥荒对分娩的影响（1947年，第250—259页）。体力劳动者的面包配给量从1941年9月和1941年2月的每天500克到1941年11月和12月的每天250克—350克不等。1941年11月和12月，非体力劳动者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每天125—200克，而到1942年2月，也只达到每天400克。1942年上半年，在全部分娩中早产占41.2%；1942年下半年，这一比率多少恢复正常，在全部分娩中早产占6.5%；1942年上半年，在所有出生的婴儿中，死胎占5.6%，而在1942年下半年，这一比率是2.5%。在那些活着生下来的婴儿中，出生体重偏低的比率甚至更高：49%的婴儿体重不足2500克，而几乎21%的婴儿体重不到2000克。“1942年上半年，新生儿的显著特征是他们的活力低。大多数新生儿从分娩时起就是没有活力；他们不能很好地维持体温，容易打寒战；他们吮乳的动作无力；他们对外界的所有有害影响几乎没有抵抗力”（前引书，第254页）。结果，在1942年上半年，每100个出生婴儿的死亡人数是33.5人，在1942年下半年出生的婴儿，其死亡率是27.1%。在某种程度上，第二组婴儿早产或体重偏低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可能性不太。何况这些婴儿是一群生活条件优越的妇女所生的。1942年上半年，有414名妇女在诊所里分娩，但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只有79名妇女在诊所里分娩。那79名

妇女似乎是在浮肿蔓延的时候怀孕的，因为她们要么有能得到食品的绝好职业，要么有能搞到食品的丈夫。遗憾的是，从那些“生活在极端困境下的居民所搜集到的”的资料不足以澄清这个死亡率问题（前引书，第250页），这个死亡率可能是母乳喂养不足以及在食品匮乏和疾病蔓延时过早断奶造成的。安东诺夫只是提到，在1942年上半年，母亲们的奶水极少，加上婴儿吮奶能力低，这意味着甚至在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天，许多婴儿就得用代用品喂养（前引书，第253页）。

1939—1945年战争中的另一场饥荒降临在荷兰的一些城市，这就是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的“饥荒冬季”（斯坦和萨塞尔，1977年，第123—145页）。在整个饥荒期间，怀孕减少，但减少最厉害的是在这场大饥荒开始后的9个月。这场饥荒结束后不久，生育率就恢复到正常水平。配给量和分娩之间逐月的详细比较表明，只有在配给量低于1500卡时，两者之间的关系才变得牢固起来。那些在饥饿最严重时期怀孕的妇女比在其它时期怀孕的妇女年龄稍轻些，而且头胎更为普遍。居民们浑身无力，性欲减弱，浮肿也很普遍。根据荷兰的资料，营养不良、哺乳和长期不孕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然而，对孟加拉国饥荒所做的研究表明：“母乳喂养、而不是营养不良是造成闭经的主要因素”（霍夫曼，1985年，第166页）。

根据对现代饥荒理论和个别饥荒研究的论述，显而易见的是，关于饥荒有许多东西仍有待我们去认识。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尤其是对个别饥荒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们如何在饥荒中表现自己的线索，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其它饥荒中人的行为，或者提供其它零散的证据。

在研究中国的这场大饥荒时，本书提出下列诸多问题：

- 这场饥荒能否被描述成全面饥荒、地方性饥荒还是阶级饥荒？
 - 这场饥荒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交换权利的不足引起的，以及中央管制经济在何种程度上能调节交换权利的不足？
 - 饥荒指数的存在能被断定吗？
 - 中国的人口行为方式符合邦加茨和凯恩提出的模式吗？
 - 中国人对这场饥荒的反馈是雨果所说的那些反馈吗？
 - 这场饥荒的证据能够确切地阐明饥荒期间生育率是如何下降以及为什么要下降这些仍在争论的问题吗？
- 本书后面各章将主要涉及的正是这些问题。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

问题的范畴

在对中国早期饥荒的研究中，已经谈到了中国 1959～1961 年的饥荒的情况。我们从政府或其它渠道所了解到的情况，观察到了农民的行为和期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几千年里为适应饥荒而形成的“机制”。而且这个机制在近十年的革命中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样，对中国历代政府救灾所采取的传统行政措施，以及救灾的策略和局限性的正确评价，将有助于分析新中国政府的措施。

从上溯到现存最早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周期性的饥荒是中国的一大特点。30 年代初期，在大约 63% 的中国县城里和一些中年人交谈，发现他们几乎都经历了三次以上的饥荒（斯塔维斯，1982 第 113 页）。确实，对外国人来说，饥荒真是中国一大特色，他们的主要看法，都概括在马洛里的经典著作——《中国——饥荒的国度》（1926 年）一书之中了。

二百年前，欧洲一位经济和人口随笔作家理查德·坎特隆就已经注意到中国“非常注意农业”，俭朴，勤劳。

如果在《航海的关系》一书中所说的是可靠的话，他们的“人口”数是难以置信的，因而他们考虑到难以养活那么多的孩子，被迫将一些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仅留下他们能够抚养的……，当坏年景到来时，虽然帝王们

用储备的粮食来赈灾，但仍有千万人处在饥饿线上……
(坎特隆，1755年，第226页)。

从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间，所知的饥荒有1828次，或者说，在某些省份，几乎每年都有一次饥荒（马洛里，1920年，第1—2页）。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洪水与干旱，更经常的是干旱。英国领事馆的亚历山大·霍西1878年编写了公元620后到1643年间旱灾的《实录》，在公元620年到1619年的一千年间，在一个省或几个省里有旱灾记录的，共610年，特别严重的旱灾有203年。起码在15个最坏的年头里，《实录》都暗示有人吃人的现象，说明灾情非常严重。这通常都是由于旱灾延续时间太长，或受灾面积太大才引起的。长江流域以北，直至蒙古地区都是经常受灾的地区。另一部由楚可清（音）博士在1926年编写的《汇编》中，包括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末这一历史时期。虽然这两部汇编的记录不完全相符，但他们描述的情况都相同。在人口多的省份，更经常发生大灾荒，虽然从记录上看，可能有虚报的现象，因为这些省份都邻近京城，一些地方官为争取被免除税收而夸张了他们受灾的程度。即使如此，仍能清楚看出干旱经常发生，并引起饥荒（马洛里，1926年，第1—2、38—42页）。

到底是否由于农业情况恶化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饥荒不断，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作者都已提出，由于在18世纪人口相对高速增长，对已经高度集中的农业增加了极大的压力——人口数由1741年的14300万增加到1851年的43200万——同时还伴随着叛乱，战争，农业缺少改革，以及不相适应的半殖民地工业，由此而导致饥荒增加。就如托尼（1932年）一样，马洛里（1962年）是这一派人的典型

代表。近年的一些学者（最知名的是迈尔斯，1970年）已对此观点有不同看法，并提出争议，认为事实上中国农业耕作很好，并设法保持一定株距、行距。之所以发生灾荒，应归因于农作物品种的改换上，应引进新农作物（拉迪，1983年，第7—10页）。

有关此事的争议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两派学者取得了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才真正与我们有关，即：多数农民生活在社会下层，并且，他们所受到的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的危害要大于受到其它综合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危害（迈尔斯，1970年，第124页）。他们也都同样认为，40年代情况的恶化是同日本的战争和内战造成的结果。据估计，1944年完全处于日本人统治下的17个省的大约一千一百万非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背井离乡（答陈，1946年，第61页）。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是青壮年，因害怕国民党征兵或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才离家出走的。那些留在家里的人目睹自己的庄稼被抢去，土地毁于战火，成为政府一些决策的牺牲品，如炸毁黄河大堤淹没华北平原，以阻止日军推进。飞速增长的通货膨胀使得政府在1942年宣布农民用粮食交税，之后，又采用比市场价格低得多的固定价格购买粮食。在许多地区，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变化，地主们回到他们的村庄；内战仍在继续，通货膨胀，使政府在战争初期发行的金元券（当时大约20金元券兑换1美元）越来越不值钱。由于这些及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数大大地增加。

托尼曾生动地记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脆弱性：

饥荒总是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在出现足以引起人

们惊恐的征兆之前，劫难很早就蔓延开了。如果说灾难是指由于缺少粮食而使成千上万的人饿肚子的话，那么全国几乎没有地方能逃此厄运……

有些地方，农村人的处境就像永远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只要微风吹起一点涟漪，就能把他们淹死。大的灾难使人口减少的作用比起他们所说的即使在正常年间广大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就要逊色得多了……简而言之，饥荒是疾病的最后阶段，虽然不总是引人注目，但总是存在（1932年，第77页）。

大约在150年前，马尔萨斯在发展他的人口理论时，把中国作为其重要的实例，就已经提出相同的看法。他指出，必然有这样几个时期：当人口

在物质不增加的情况下持续增长……，假如我们有的数据是可信的话，那么社会底层的人们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物生活……一个国家如果处于这种状况就必然要出现饥荒。任何一个国家，当其生产能力仅能维持人民生命时，那么任何一个坏年成造成的物质不足都是致命的（马尔萨斯，1798年，第115页）。

中国人把饥荒视为对其安宁的一大威胁，这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古代祭典活动中，首领要祭奉他们的祖先，据说这种仪式在公元前一千多前的商代就有了。饥荒、战败、疾病和死亡都被视为是祖先对后人的惩罚，因为后人没有做必要的祭祀，使祖先感到不悦（贝克，1929年，第72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饥荒视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在孔夫子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意识到宗教在社会管理中的价值，而是将他们置于宗教之上”。哲学家荀子（公元前 298—238 年）对此做了很仔细的描述：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教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贝克，1979 年，第 105 页）。

皇帝，作为上天与百姓之间的中介人，受命代表百姓的意愿主持宗教仪式，有些更具代表性，如四千年前的大禹，因为他治理黄河洪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马洛里，1926 年，第 2 页）。每年皇帝都要为耕作举行仪式，将丰产的希望播向大地，当灾难蔓延时，皇帝也要出来祈求上苍。1832 年道光皇帝为求雨而作的祈文表现了皇帝的作用，不仅农作物和百姓感到了死亡灾难，就连野兽、昆虫、草木都要失去生命。我作为上天的臣子，被置于万民之上，负责保持世界的秩序，安抚平民。皇帝开始持斋，在土地神和谷物神的祭坛上摆放贡品，但仍无效果。道光自责道：唯一的原因是我平日罪恶深重，没有一点诚意和奉献，因此，我不能感动上天的心……请原谅我的无知与愚蠢，让我再自我完善；为着那些成千上万因为我而卷入灾难的无辜的人民，一个人……（马洛里，1926 年，第 44—45 页）。

皇帝必须做祈祷，因为一旦事情变得很严重后，公众的骚动就会越来越厉害，就会被视为上天已经不再支持他了，他的统治将被推翻。因为绝望的人很容易铤而走险，进而造反。

起义。中国元帅朱德（1886~1976年）回忆了他童年的一段经历，在四川一次干旱的次年夏天，

滚滚尘雾中，一帮行尸走肉的人出现了。有手持各种武器的男人，有背着婴儿的瘦足妇女，还有一群肚肿胀，眼睛无神，光着屁股的孩子，拖着无力的步子，踉跄地跟在后面。饥饿的人群像雪山崩塌了一样，蜂拥到“大路”上，其中有那么几百人涌向朱家院子，大声喊道：“一道去把大户吃光噢！”（史沫特莱，1956年，第41页）。

孔子的学生子贡向他请教政府管理艺术，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布兰德和布莱克豪斯，1910年，第113页）。

当大量饥民出现时，军队就失去了保障，人民的信任就成为皇帝与一个新王朝之间的最后一道脆弱的屏障了。

赈灾组织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中国统治机构就试图做一些赈灾之事了。这些努力也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当代马尔萨斯洪良奇（音）曾关注过无限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他明确表示，这些记载是不可信的，

在发生洪水、干旱和瘟疫时，他们能打开粮仓，用国库

来赈济灾民，但是皇帝和官吏的这些补救方法都能行之有效吗？简而言之，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和平统治，帝王和官吏既不能阻止人口的增长，他们也没有分给人民足够的食粮——最起码不会比我们所说的更好（西尔伯曼，1960年，第262页）。

从元朝（1229—1368年）到明朝（1368—1644年），大量的粮食从其它省份运到都市，在清朝统治下，指定八个省向京都提供粮食。在华北收成不好，粮价上涨时，允许商人从满洲运进粮食。但在这些省份中，运输粮食者常常不多。到18世纪，粮食主要都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运到北京的，湖南和河北地区的百姓抱怨说，在收成不好时，不断地运送粮食，使他们那儿倒真的感到困难了，甚至提出禁止外运粮食。地方农业自给自足的思想非常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孔夫子提倡这一思想（李成瑞，1982年，第34页）。农民们在报告土地占有和收成情况时，都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在40年代共产党管理的地区也有这种现象（撒克斯顿，1983年，第113页）。

几个世纪以来，从长江到北京的大运河是从东部省份运输到北方城市的主要渠道。13世纪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开始修造、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这一千多英里的水路是中国的伟大工程之一，也是为保证向京城运输而设计的。在大运河与黄河交叉处，其水利管理是由一独立的管理机构——黄河管理局负责，最初，这个机构是极有效率的。然而在18世纪时，它变成一个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渐渐不能预报洪水的汛期，也不能将灾难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他们不断增加税收，但很少用于治理黄河，最后，凡在此机构供差的人都肥了，与其

机构创建的初衷很难相容了。这些官僚们故意疏忽对黄河的重要河段的管理，和对重要河坝、堤的保护，以致使其“垮得更快，塌得更快，冲走得更快”，这就可以争得更多的拨款（迈尔斯，1970年，第225页）。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商业运输粮食采用海路，运河几乎弃之不用了。

最近，一些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事实上，最起码在18世纪，国家的确拥有把大运河的运输作为阻止粮价大幅度波动和减轻物质匮乏的制度和财政手段，并且这也解释了这段时期人口增加的问题（李，1982年，第33页）。这些手段包括高度专业化的机构，由省官员每月汇报有关水情和粮价的情况，河道保护计划，以及国家的粮食存贮网络等，该网络通过销售和借贷，可使粮价稳定，同时还可用于赈灾。假如发生饥荒，就可以提供紧急救灾粮，挨家挨户登记受灾情况，紧急发放和建粥棚，以减少灾难造成的危害。

对为避免或减轻饥荒而采取的传统作法可以做更详细的研究。国家的粮食存贮网络曾被说成是赈灾的主要方法（博尔，1972年，第28页），清朝粮食存贮网络由三大独立部分组成。“常规”粮仓由地方官管理，藏贮由地方机关收买的和分配的粮食；每年向省级官府汇报存贮情况。每一地区都有分配定额。在闹饥荒时，地方官吏可将粮食无息借给灾民，或按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销售，或免费发放。其损瘳两种存贮网络是慈善和建立在每一个县里的地区粮仓，可有息或无息贷给地方居民，在上级官员监护下，由地方人士管理。很难了解到这些粮仓的实际作用到底怎么样；新粮食应每年用来取代旧粮食，但也许没有做到。有些粮仓中有大量害虫，有时粮食根本没有收集上来。到20世纪，有资料说明这一网络或多或少已经瘫痪。

在 1876 年到 1879 年大灾荒期间，政府奋力救灾，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量资金从帝国银库送到受灾省份，从政府粮仓中运出大量粮食，原来进贡到北京的粮食又转送到地方。土地税或者免征，或者推迟一到三年，从其它未受灾的地区征收救灾税。三年荒年中在受灾区免除了 1800 万两白银的税收，另外指定用 260 万两白银援助受灾区（博尔，1972 年，第 26 页），同时由地方政府官员及乡绅配合政府进行赈灾活动。地方机构也努力寻求捐赠并考察灾民的需要。他们向穷困的农民发放农具和种籽。“虽然政府在组织和协调赈灾方面的努力极为有效，但非政府部门，特别是乡绅和商人们的赈灾作用是很明显的”（博尔，1972 年，第 31 页）。

山东省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政府在这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交通通讯问题，首都在山东省已受灾几个月后才得到报告。路面坏得几乎不能将粮食运到灾区，干旱致使运河水位下降，装载贡品的船只几乎动弹不得。在饥荒严重的山西，道路情况糟透了，随处可见干渴的生灵或者死了，或者被吃掉了，车辆也被烧掉了，“缺乏粮食运输工具可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只有少得可怜的粮食能运到灾区”（博尔，1972 年，第 70 页）。官僚机构的混乱、管理失误，低效率甚至谎报情况也是造成赈灾不力的原因。

正如前面谈到的，救济百姓成效更显著的是那些民间人士。灾区的乡绅们热心而努力地为分配粮食和组织救济而工作，不论是建粥棚；还是埋葬死者。还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不断增加的城市居民，纷纷向慈善机构捐款，他们的行动使政府官员们相形见绌。仅前福建省总督丁日昌一人就筹集了 70 万两白银。后来在国际上号召捐款筹集到 20 多万两，许多外国工人——多数，但不是全部——基督教徒为抗灾做出了

显著贡献。

即使有上述努力，但最少还是有 950 万人死掉了，博尔曾对此次饥荒作了出色的研究，他分析说所有情况说明“中国政府认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自然界运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政府只是考虑一旦饥荒发生了如何赈灾，而没有考虑如何铲除产生饥荒的原因”（博尔，1972 年，第 79 页）。马洛里在 20 世纪初讨论中国饥荒时也曾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马洛里，1926 年，第 71 页）。

但事实很清楚，一旦灾情发生，只能减轻灾情，极而言之，中国政府虽然做了很大努力，但只要发生大面积或偏远地区发生灾情，政府的努力就完全无济于事了。正如一位总督在 1700 年前后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存贮的粮食从来就不能救济大面积的饥荒（博尔，1972 年，第 75 页）。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上半叶，据估计存贮的数量仅是国家年产量的 3—4%，当然送到每一个受灾省中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对大多数的受灾者来说是杯水车薪（珀金斯，1969 年，第 164 页）。多数粮食由地方存贮，而且明确规定为地方缺粮时用，不是为一省或更多地区救灾使用。跨省或跨地区运送粮食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常常由于干旱和洪水使其能力倍受影响，而干旱和洪水都是灾荒的前奏。

正如前述，在 18 世纪时，最大限度的赈灾活动也不能将稻米运到广东省的边远地区。例如，在 1726—1727 年饥荒中，广州粮价增加了两倍，边远地区比平时增加了七倍。“这么高的价格，农民即使有一点存贮，也很快就花光了。如果一个农民没有土地拿去作为借款的抵押（大约半数左右农民是这样做的），他们或者种白薯（如果可能的话），或者抱着在城市找份工作的渺茫希望流入城市，或者滞留在本地等死。在

1726—1727 年间和 1786—1881 年间的全省性大饥荒中，人们无处可去，据估计，多数人都处在饥饿之中”（珀金斯，1969 年，第 164 页）。

在了解到中国多数饥荒的规模相对来说都比较小，而且是由地区性自然灾害引起的，以及全国的实际情况和贫困后，我们认为一项以减轻灾难影响为目标的政策不是没有合理性的，然而其局限性在每次大灾难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饥荒的后果

农民以各种不同方式抵御着饥荒，各种叙述农民行为的文献，常常相互呼应，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许多方式都是传统型的。有人对此做了总结：

家庭采取的第一步是减少粮食消费。不吃干粮，而喝稀粥，还有野菜等，甚至只要是无毒的东西都吃。家庭中一部分人外出，成为流浪灾民。如果剩余的粮食不够维持到第二年的收获季节，他们就开始变卖其仅有的一点家产——首先是牲畜和农具，然后门窗，然后是房梁，土地和残存的房架子也卖了。然后老婆和女儿也卖给别人当佣人、奴隶或老婆……。女孩子太多了，再生下来就扔了。有时有些家庭成员自杀了……，人肉也吃了——通常都是由一些饥饿的人群干的；有时也吃被屠杀的家族、被绑架的孩子，或者被打败的土匪。在大饥荒时，土匪强盗到处都有，疾病蔓延也非常迅速，特别是伤寒病（斯塔维斯，1982 年，第 118 页）。

事实上，除了对饥荒造成的死亡估计难以置信外（由于

通讯条件差，没有完善的人口登记系统，和由于饥荒造成的移民，使得对死亡情况了解不详，很难搞清楚现知死亡人数是整个时期所有死亡人数，还是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几乎不知道人口中哪些部分死亡了，或因为什么而死亡的。到1876年—1879年饥荒结束时，山西总督告诉北京政府，60~70%的人患过伤寒。饥民们吃的一些东西引起疼痛而致死。大批死尸没有埋葬；大群吃死尸甚至吃活人的野狗，加速了疾病的扩散（博尔，1972年，第20—23页）。伤寒和斑疹伤寒（19世纪时认为这两种概念是一回事），以及霍乱是在当时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几种病。从对贩卖人口和抛弃孩子的描述中可以知道，妇女和儿童在饥荒中是最大的牺牲品，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几乎不能得到同样多的食物。

通过微观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疾病对人口的影响。一项对1400年到1900年间浙江、江苏和安徽省16个家族的研究，以每5年男子出生人数为一座标点，以此绘出的曲线起伏较大。家庭人口出生减少的时间正好与该地区发生灾害的记录时间相吻合（刘翠荣，1981年，第125页）。有关这些家族记录的例子请见表3.1。

为什么出生人数或报告的出生人数在灾荒之年会减少的确实原因尚不清楚。或许是因为缺乏性欲，或许是妇女停止了经期，或许是家庭分离，致使生育数下降。

许多比我年长的人生动地向我讲述了1928—1931年间可怕的干旱，当时富人和穷人一样抛弃了家园，流亡到南方去找吃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手法是夫妇二人分别负担一些孩子，然后到不同地方去谋生。可以想象当时他们讨到一点点食物是不能养活一家

子的（沃尔夫，1984年，第465页）。

可能有很多婴儿生时体重很轻，或是死婴，流产等。那些勉强活下来的身体很弱，不会吮吸奶汁，或者患有疾病。在穷苦人家甚至一些中等人家都有溺婴的情况，特别是女婴（凯恩，1987年）。

分家——根据传统，家庭财产由几个儿子平分——在庄稼歉收的地区也少了。由于出生率降低（如20年代在北京周围的村庄中出现的现象一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年轻人匮乏，并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年轻人才又兴旺起来，因此，家庭群体的出现也大大推迟了。

1920—1921年中国北方发生干旱时，大约死了50万人，殃及两千万人。

有人进行了一次挨家挨户的调查，结果列出了下列食谱：糠、树叶或野菜粉，漂（白）土，花籽，杨树芽、玉米棒子芯，“黄金菜”（蒸的菜团子），锯末，蕲属植物，树豆荚，高粱壳，棉花籽，榆树皮，树籽（非常难吃），花生壳，甘薯秧（被认为是很美味的），草根，有些食物非常难吃，孩子们虽然很饿，但也不吃（马洛里，1926年，第2页）。

河北、山东、湖南的农民也谈到他们在1876—1829年和1920—1921年间大饥荒中吃过甘薯秧、野菜、蕲菜、水草等（撒克斯顿，1983年，第62页）。理查德叙述过1876—1879年间山东农民吃的食品情况，他所列的食品也和前面的大体相似，还有甘薯秧、荞麦杆、萝卜叶等（博尔，1972年，第

14 页)。在山东广大灾区中，到处“可见到 20 多英尺高的树被剥光，成了大饥荒悲惨凄凉的见证”（同上，第 20 页）。1928 年，在山东一产棉区，粮食减产一半，棉花市场上看不见棉花，村民们吃着谷糠和棉花籽（撒克斯顿，1983 年，第 70—80 页）。在 1942 年湖南饥荒中，花生壳和树皮也成了食物（撒克斯顿，1983 年，第 177 页），而在同一年里，日本在河北南部实行反游击战大扫荡，使灾情变得更为严重，“在日军蹂躏下残存的人们以死人肉为食，以死人骨为柴”（撒克斯顿，1983 年，第 181 页）。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不当作食用的部分农作物成为农民大部分的替代食品，中国农业的本质是完全的商品菜园型农业，这意味着几乎没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一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灾情时的替代食物，如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叶子等，在中国很难找到。

马洛里在报告 1920—1921 年饥荒时说，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连房梁也卖了（买者一般用来作燃料）。利息率高达 100%；在有些地区，整村的人都离家出走；卖儿卖女更是司空见惯。在 1876—1879 年大饥荒中，一千多万人移居江苏和山东的南部（博尔，1972 年，第 19 页）。撒克斯顿在叙述山东 1928 年村民大迁移时说，在留下的人中，有卖儿卖女的。在一个 130 户人家的村庄中，一百多个孩子被卖掉了（撒克斯顿，1983 年，第 80 页）。在山东一个县城，从 1876 年到 1879 年间，有 10 万妇女儿童被卖掉（博尔，1972 年，第 15 页）。

如果农民能有幸占有土地，这时也都卖掉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歉收年成中，在一个村庄中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抵押给外人（迈尔斯，1970 年，第 71 页）。租地的人在

坏年成时也想将能固定租金的办法改为付收成的百分比的办法（一般30%到65%都归地主），这种办法最起码使双方都能分到一些收成（迈尔斯，1970年，第228—229页）。有些地主趁饥荒大捞一把：如在1917年歉收时，农民都吃树叶，山东一地主用借粮食换地契的方法获得好处，他所付出的粮食只是后来这些土地中年产粮食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地主——不居住在产权地的地主——将所得利益投于商业、贷款和手工艺行业（迈尔斯，1970年，第233页）。

饥荒另一个不常为人们注意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它不象其他因素影响那样明显，就是入学和进一步求学的人数减少了。19世纪中国上学都要由家庭自付学费。家庭常要付出很大代价来保证最起码有一个孩子受到教育。在1876—1879年大饥荒中，山西总督曾国全，是一位精明的官员，他向朝廷报告说，该省由于饥荒而使教育备受摧残。学校关闭，原准备参加1878年省考的学生也因灾被迫中止学业。大地方的学生不足100人，小地方的学生仅剩50至30人。他请求朝廷准许将省考推迟，并强调这样该省在“将来才不会因此而受损”。他希望能尽快恢复教育（博尔，1979年，第138页）。

很少知道家族分散的成员是如何援助灾区的亲属的。中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城市人口有所增加，虽然由于粮食很少，农村家庭几乎无处花钱，但从农村新到城市的人们仍向他们的家乡汇款。在家族势力很强的地方，其成员中富有者的粮食、积蓄和现金将用来帮助其他成员。1849年河南中部受到洪水和干旱灾害，乡村之间开展了多项合作援助活动，由民团组织挨饿的穷人给有钱人家护院以换取食物或粮食，来维持家人生活（博尔，1972年，第41页）。获得支持的另一种途径可能就是从妻子那边的亲属获得。虽然普遍的

观念都认为一旦妇女成为夫家的一员，娘家对她的情况就不再负责，不再关心了，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也常常求娘家亲属帮助。因为他们居住在不同的村庄，也许如耕种、收割时间等都略有不同，在有了紧急情况：如受到台风威胁，都可能从娘家亲属那里得到帮助（贝克，1979年，第130页）。另一种情况，如娘家的村庄没有受到饥荒或者情况不太严重，相反，男方村庄却长期受灾，那么也可能会得到女方家的帮助。

在贫困潦倒、被迫无奈的绝望情况下，农民可能会铤而走险。他们多数人唯一的可能是当匪盗。所有叙述饥荒的文献都指出，随着饥荒加剧，出现了大群匪盗，他们抢劫一切有家产的人们。由于担心绝望的人们会聚集在一起，而使所有的法律、秩序和帝皇的旨谕土崩瓦解，政府采取了更严厉的行动。1876—1879年山西临汾县饥荒时的代理地方长官是姜廉，他的赈灾工作搞得很出色。同时他也关注到在该地区闹事的强盗，他们已经有一百多人结成一伙。他将八个或九个人判了死刑，“其他还有几个同伙被投入监狱，饿死者尚不在此数之中”。但他悲叹说，“人被逼而不畏死亡，虽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却完全无视法律，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希望能活下去”（博尔，1972年，第63—64页）。

在自然灾害后恢复生产非常缓慢，因为缺少牲畜肥料。在饥荒中，因为没有饲料，家畜都杀掉了，或者吃掉了。通常五头猪的粪便可供30亩地的肥料，而一个五口之家的粪便只可供8亩地的肥料，一般地说，人的粪便只是农家肥中很小的一部分（迈尔斯，1970年，第46和171页）。这样农民必须想方设法重新获得土地，获得他卖掉的农具和失去的家畜，加上所欠的债务，他要想重振家业会遇到多少困难！

第四章 人的因素

5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和困境

在中国，人均土地占有率一直是很低的。20世纪40年代之后，土地承受着越来越重的人口压力。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每公顷耕地上的劳作者人数每年递增2.5%，尽管采取了开垦荒地的措施，但是据说在这一时期耕地的数量仍减少了10%多（拉迪，1983年，第3—5页）。

粮食依然是中国家庭的主要食物，不管是出产大米的南方省份的家庭，还是小麦产区的北方省份的家庭，无论他们是否出售粗粮去换取少量的更有吸引力的细粮，在甚至象北京这样的城市里，人们95%的食物能量靠五谷杂粮供给（克罗尔，1983年，第26页）。在中国的北方和西部地区，至少到50年代，仍缺少家庭菜园提供蔬菜以改善饮食结构的不足。

经过改进的基础农业不仅需要解决人民的温饱，而且还要为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家提供后盾。仿照苏联对农业采取的一种本质上是耗取自然资源的政策模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年）中，给予工业以优先的绝对优惠的财政预算，而对农业、林业和水利的投入只占预算的7.6%。有人设想，如果实行计划经济，提高灌溉率，强化传统农业，将会使粮食产量得到提高。

计划经济将通过集体化而实现。土改（共产党人早在解

放区就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它包括土地再分配,主要是分配给广大贫下中农,使每个家庭都得到一份土地。在中国本来就一直就缺乏的耕地,从1936年的1.2亿公顷减少到1949年的0.98亿公顷,而这些耕地要养活5.5亿人口。提高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需要有工具、农机设备和肥料,单个的农民家庭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在土改运动中首先建立起了互相组共享设备和劳力,到1957年末建立了合作社,共同拥有土地所有权。

1957—1958年间,人们尽了最大努力,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快灌溉和水利设施建设,最初的目标是把一年内灌溉的土地面积提高到原来的二倍,结果还超额完成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措施都采取得得当,一些灌溉措施结果导致了土地含盐量增加,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河北、河南和山东,情况尤为严重。

不过,从50年代一直到1957年,粮食产量都在持续增长。正如所希望的那样,这项巨大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对传统农业的强化和计划经济。

表 4.1 中国的粮食产量 (1952—1957)

年份	粮食总产 (百万吨)	人均粮食 (公斤)	稻米	小麦 (百万)	谷物 (吨)	其它
1952	153.9	278	68.4	18.1	18.9	25.8
1953	166.8	283	71.3	18.3	16.7	28.6
1954	169.5	281	70.9	23.3	17.1	28.1
1955	183.9	299	78.0	23.0	20.3	28.0
1956	192.7	300	82.5	24.8	23.1	32.1
1957	195.1	301	86.8	23.6	21.4	32.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3年

农民把生产的大多数余粮留作自用。粮食的收购价格在1950—1952年提高了17—20%，仍未能使粮食的销售量满足市场的需求。1953年以后，国家实行粮食统购，并定期不断提高粮食价格。政府继续要求用粮食来交农业税，并且在“第一个五年”里，把粮食税收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农业税是根据估算的“正常产量”（据说是低于被征税土地的实际产量的平均值），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征收的。总体来讲，1952—1957年征收的税率平均是10.5%。当然省与省之间或者一个省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收税率不尽相同，但均限制在25%以内。然而，上述的措施都未能确保城市、军队的粮食供应，也未能解决缺粮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更没有增加国库的粮食储备，相反却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税粮占了所有余粮的40%，要不是用来交税，这些粮食都可以拿来卖掉。

中国农民的传统是自给自足，“一个产米的农家，除非不得已需要现金和日用品，是不去市场卖米的，而数量也仅限于出售或交换必需的……把农村中的米挤到市价上去，与其说是市价的引诱，不如说是需要货币的压力”（费孝通，张子毅，1949年，第106页）。现在政府正创造条件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使得提高产量成为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出租土地和雇用劳力已不再可能，信用社和政府以低息贷款取代了个人之间的货币借贷。政府对粮食实行统购使农民失去了最后的重大的选择自由，不再能够通过自身个体劳动致富，只能互相协作。合作社的出现使农民所付出的牺牲比以前减少了许多。

1955年，每个生产队都被硬性规定了粮食产量，政府还公布了统购及向缺粮地区调拨的粮食数目。另外，也规定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公顷数（据说占耕地面积的3/4），并多数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下达。这些指令性计划本来是为了保障定

额的完成，农民却误认为减少了他们与政府作交易的权力。这种政策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政府征收到的粮食数量下降了4—5%，尽管该年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1956年，政府不得不在上述政策中附加一项条款，规定增产的粮食，即超过定产部分收购增加到40%，即使这样，第二年国务院又颁布法令，取消了40%的限额，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超过这个数目。1953—1956年间，政府征收的税粮和统购的粮食估计占总产量的1/5—1/3。

然而，由于国家的粮食储备能力严重不足，许多粮食不得不留在农村的粮仓里，妨碍了这些粮食在其它地方发挥作用。落后的交通也限制了粮食迅速保值地运输。虽然在国家农业发展计划中设想了在60年代中期，国家将储备可供一至二年所用的粮食（这些粮食要求能保证3—18个月的供应）。然而在1953—1957年间，只有不到1千万吨的粮食或者说是只占总产量4.8%的粮食入国库储备。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各省的大部分余粮，约有90%—94%被运到别的省或者出口。各省之间的输出“必然是短期的、逐月进行的”（沃克，1984年，第76页），但是输出的总数在每年950万吨到1050万吨之间，非常接近每年征购的1060万吨的余粮总数。

地方的自给自足以及各省之间最低限度的调配可能是那个历史时期只能采取的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那些粮食生产不能满足自己需求的省必然不能使它们的粮食供应达到供求平衡，结果河北、山西和江苏在1956年，河北、山西、山东和陕西在1957年人均粮食供应短缺，甚至在政府的干预下，河北省的人均粮食供应也只有黑龙江的56%。

1956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造成国库粮食储备较少。为了鼓励农民参加新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毛泽东预言参加合

作社的90%的农民收入将会有所提高。“据证实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甚至没有完成向国家交售粮食的定额，以至造成国家粮食储备减少”（德恩柏格，1982年，第72页）。在此情况下，同年政府减少了对农村市场的限制，私人粮食交易量提高到400—600万吨，至少占国家统购和税粮的10%，据估计可能有一半中国农民家庭到市场（国家的、农村私人的）去买卖粮食以满足需求（拉迪，1983年，第32页）。这种农村市场自由贸易的扩大影响了国家对粮食收购和对税粮的征购。

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促使农民制造障碍，拒绝交售应该征收的粮食，或者与地方干部合作，请求政府放宽限制，做出让步。他们甚至虚报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当地灾害的规模、当地的人口数量和需要喂养的牲畜数量（沃克，1984年，第64页）。1957年，国家设法在重大程度上重新对粮食征购进行了控制。

以上这些是政府所关心的，而不是每个家庭都关心的。对每个家庭来说，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分到一份土地就意味着过好日子不仅仅是幻想，而且正在变为现实。政府通过社教运动以及对今昔情况的大量对比，巩固了对生活发生的变化认识。在杨仪人民公社，每个家庭都计算出了他们在过去几年的收入，而且要求以“万恶的旧社会”和“幸福的今天”为标题，分二栏列出。在二里店村，对比形式更加鲜明，村子里的两户人家被选出展示他们过去和现在拥有的财产。

他们把过去曾经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的破旧衣服，与如今的一堆堆过冬的色彩鲜艳而且厚实的丝绸棉被放在一起，把过去的破陶罐、讨饭碗和现在的搪瓷脸

盆和闪闪发亮的热水瓶放在一块；过去的破布鞋和木底鞋与光洁的胶底鞋放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类似的展览在每个村子都能看到（克鲁克等，1966年，第74页）。

当费孝通1957年回到开弦弓村时，他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在25年前写的经典著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中他首次对农民的生活进行了研究（1939年）。

分得了土地，兴修了水利，田里谷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床上没有盖的该买条棉被了，这是第一年。接着棉衣服得添得结实些了，夏天做身洋纱衫，赤脚不好看买双雨鞋，青年人更爱体面，新的制服做罩衫；过年了，猪已养壮了，不用花钱买肉，宰了腌腌，打打牙祭。来个客人留个饭也体面些。

“要说老乡们多穿了，多吃了，实在也不好出口。”但是，他担心他们的消费超过他们的承受力（费孝通，1983年，第193页）。从开弦弓村回来以后，他报道说：那些曾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认为，官方的宣传片面强调合作化以来在粮食上取得的成就，助长了盲目乐观的风气。当然即使政府提出警告，也有可能无法阻止农民的这种情绪。他们没有为将来的生计积蓄、储备粮食的经验，认为：“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

韩素音批评道：“肉也越来越少。肉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公社农民头脑发热，认为‘共产主义到来了’，拼命地大吃猪肉。农民大吃大喝，说什么‘省什么呀？政府会供给我们的，

这就是共产主义嘛’”（韩素音，1980年，第242页）。另外，她注意到：“另一些人狂购乱买，动用政府借款买电视机、建电影院。他们实行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连理发也不要钱。他们吃光花光，结果没有任何储备”（韩素音，1980年，第252页）。

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收入增加首先反映在其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食物消费量的增加，费孝通和张之毅早就对恩格尔定律在中国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这个定律是：食物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增加，生活水准将下降。中国人在可能的情况下，习惯在吃上面多花点钱。这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营养，也是为了享受”（费孝通、张之毅，1949年，第249—253页）。这种作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1978—1982年，中国工人家庭的收入提高了8.2%，农民的家庭收入提高了15%，但是花在食物上的比例，工人家庭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而农民家庭则提高了三个百分点（李成瑞，1985年，第17—18页）。

1953年至1957年，24个省中有19个省的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都有所增长，在一些地方有很大的增长（沃克，1984年，第104页）。费孝通和张之毅也注意到大多数农民不可能有积蓄。多数农户的经济条件只能维持基本的生计，有储蓄是很困难的（费孝通、张之毅，1949年，第265页）。这样，他们对如何处理剩余的粮食就没有经验，也不理解储备粮食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新的、改善了的条件下，更是如此。

大跃进

大跃进一直是麦克法夸尔关注的中心，他注意到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不满足于他们的政策所带来的成功（工业生产以每年18%的速度递增），也没有看到局限（农业

的年增长率低于4%)，而是转变思想集中大量的劳动力以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如果象有人说的那样，中国革命从1927年后所取得的胜利，不是由于客观因素，而是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才智后取得的，那么在领导干部中滋长的那种狂妄自信，认为可以无限制地调动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要被说成是灾难性的，是可以理解的（罗德津斯基，1984年，第404页）。

大跃进的一个方面是动员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各地小规模炼钢，希望钢产量能提高四倍。树立信念、群众动员及组织被认为可以替代专门知识、技术及主要设备（埃克斯坦，1977年，第36页）。到1958年9月，有2千万人参加了大炼钢铁，人数最多时达到了9千万人，据估计在这年的后四个月里，投入的工作量相当于正常年份的9千万个工作日。在铁路货棚里，房前屋后院子里，学校篮球场上，我看到了小砖炉的遗迹，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用小砖炉炼钢……连美丽端庄的宋庆龄女士也炼过钢，为大家树立榜样，千千万万的小学生也参加了大炼钢铁”（韩素音，1980年，第243页）。

炼出的许多钢铁都不能用，“常常是炉子建好之后，干部们才迟迟开始寻找铁矿和炼钢用的燃料。在供煤不足的地方，干部们就砍伐当地的树木作燃料……在沙头村，只有几代以来一直守护在村路口的巨大的多节的木兰树没有被斧子砍倒……”（莫舍，1983年，第265页），在村子里找不到足够的铁矿而导致了一场野蛮的搜寻。干部们撬走了农民家里窗户上的铁窗栅，让用竹子的代替。他们“借了老王收集的少量的废铁，留下了一张借条，后来证实老王没能收回东西。他们甚至让妇女们捐出自己厨房里煮饭用的锅、桶、盆子等用具……”（莫舍，1984年，第266页）。声称在公社食堂里吃

饭，再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当饥荒来临时，由于没有工具来煮食物以及由于大片树木被砍掉而导致的野生食物比平时更少，加剧了痛苦。

更加严重的是，大炼钢铁运动几乎抽走了全部壮劳力，当庄稼丰收时，从事收割的都是妇女，她们中有80%的人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农业生产（凯恩，1987年）。其中许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从未做过农活。

由于缺少劳动力，许多谷物不得不扔在地里烂掉。甚至在杨仪这个具有很长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公社，人们告诉克鲁克夫妇，几乎所有的壮劳力都去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去了，因此庄稼只能草草收割。由于关键时刻缺少人手，有些庄稼甚至来不及收割……许多粮食就白白地损失掉了（克鲁克等，1966年，第59页）。一个农民回忆道：当我看见落在地里的玉米时，就问另一个人为什么不把它们捡回去，他却朝我喊道：“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捡呢？”我又说：“你至少可以用它们来爆玉米花吧？”而他回答说：“谁还需要这么点东西？”这就是当时一些人的态度。那年在地里随处可见丢弃、散落的粮食。由于没有足够的工具来运输，公粮就堆积在公路上，当有一辆空卡车路过时，就让司机装一车带走……”（欣顿，1983年，第214—215页）。

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将军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看见一堆堆成熟的谷子被扔在田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农民，老人最后告诉他每个人都在争创炼钢铁纪录，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收割谷子，彭德怀激动地喊道：“你们每个人为什么不想想你们不收割谷子，明年你们吃什么？你们总不能去吃钢铁吧！”老农民深深点头表示赞同，同时尖锐地指出：“事情确实如此，但谁也不想那么做。除非中央高级干部下乡

来了解情况，谁敢站起来反对这股风？”（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95页）。在随后对西北的考察中，彭德怀看到有的地方一些房子被拆掉，树被砍倒，统统作为炼炉的燃料，而煮饭用的铁锅则被当作炼钢的原料。在湖南，他发现用饭锅作原料炼出的是一堆堆粗糙的、没有用的铁疙瘩，放在露天里生了锈。彭德怀在他的一首诗里悲愤地写道，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获量与姑。

老年日子怎么过？请与人民呼与救！（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200页）

在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的整个宏伟计划提出了挑战。其细节将在第七章中详述。当时，参加大跃进运动的人们一直吃的是当地的储备粮。晋东南地区的一位农民回忆道：“在大炼钢铁那会儿，我们吃得很好。每个人半夜还要加点儿馒头和面条。每个炉子旁边都有一个盛满面条的大锅，谁能忘记那好时光？”（欣顿，1983年，第216页）。70年代重访长弓村，欣顿发现人们不停地劳作无非是为了填饱肚子，“如果有一样东西能使每个人都能记住大跃进的话，那就是食物。”温德（音）说：“那时，我们的生活很好”，“我们有许多肉吃，自打那以后吃肉被认为是革命，如果你不吃肉那将不……人们甚至互相打赌看谁吃的最多”。蔡原（音）说：“突击队员们可以随时随地停下活来吃饭”，“他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欣顿，1983年219页）。

举个例子说，那些被动员参加重大工程——水坝修筑的人都会得到超额粮食配给。有一个村子曾选派500人去参加

修建水坝。在水坝动工的前几天，他们帮助当地村民摘棉花，当地村民很高兴地送3只大山羊作为酬谢。据参加修水坝的农民回忆，“正式开工后，我们的基本定量是每人每天1.2斤，这是我们自己从长弓村带来的。每挖走一立方土，我们会另外得到3斤粮食，其中40%是面粉。另外，我们还有4角3分的现金补助来买诸如盐、酱油或醋之类的东西。由于我们干得很快，所以我们挣的钱除了用于上述开销外，还能剩一些……”（欣顿，1983年，第221—222页）。

农民对这些额外工作的积极性可能会减少他们对其它日常工作、任务的投入。费孝通在另一篇著作中写道：

真正刺激农民辛苦劳作的不是为了得到丰厚的物质，而仅仅是为了生存，一旦他们的生计有了保障，农民就会松懈下来，甚至不再劳作。他们满足于过上一种舒适的生活。所谓“舒适”是指不再进行体力劳作，而不是获得巨大的物质享受……劳动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中国人真正把劳动描述为“流血流汗”。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们经常被叫去帮助农民劳动。在田里劳作的农民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相信艰苦的劳动会带来巨大的欢乐。避免劳动必然带来的痛苦是他们所首要关心的问题”（费孝通、张之毅，1949年，第82—83页）。

解放和土改或许给农村带来了一些新变化，但实际上用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强体力劳动，仍没有很大变化。

当人民公社替代了成立不久的合作社时，农民对大跃进的热情受到了挫伤。在1958年的8月和11月，98%的农业

人口被组织进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包括约 30 个合作社，2.5 万人。公社接管了所有的工业、农业资源，进行征税，接替了旧的镇、区的行政职能，管理银行、墓地、学校等。这使人很容易想到这样一种巨大的职能转换带来的行政问题。一些野心勃勃的公社想马上完全进入社会主义，河南建立了一种免费供应制度，在那里公社承担了十项“生活必需花费”中的七项，包括衣、食、住、生育、教育及婚葬的费用（斯诺，1966 年，第 434 页）。这种公社很快用完了它的储备，东风公社采取免费供应吃喝和义务教育，给予人民前所未有的生活保障。许多人不再为生老病死攒钱了，开始把钱花在四大件消费品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节俭的生活作风开始发生变化。人们想得较多的是他们想得到什么，很少想到由此可能带来的灾难（欣顿，1983 年，第 229 页）。

在杨仪公社一个村里，干部们听说所有资金都要交归公社时，马上冲出去为队里买了三辆自行车。这个大队是该公社较富裕的队之一，他们不想看见队里的积蓄被吞进公社的资金里去（克鲁克，1966 年，第 35—36 页）。

进入人民公社后，最初没有指示如何对农民交公的财产进行补偿。一些公社超出了只对土地和设备（如牲畜和农具）等公共财产进行收缴的范围，甚至要没收农民个人所有的铁锅、床和家具。许多农民宁愿卖掉它们，也不愿交给公社，但是当时市场已经饱和。至于食物和牲口则更简单：每家每户都把自己贮藏的粮食和养的牲口吃掉，而大队（旧的合作社）里则尽可能把它们藏起来。人们告诉韩素音，1957 年村里有 170 头猪，到 1959 年只剩下 28 头，最糟糕的一个生产队 200 头猪只剩下 4 头（韩素音，1980 年，第 350 页）。

当饥荒来临时，猪及其它家禽的减少可能远没有宰杀牲口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严重，交通落后，粮食运输主要依靠马车和牛车。这些牲口的数量在大跃进时就开始减少，甚至在因粮食缺乏而迫使农民杀掉或卖掉自己的牲口之前就开始减少了。把粮食藏起来或者吃掉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公社设了集体食堂，人们担心集体食堂会鼓励铺张浪费、救济较穷或不好好劳动的家庭从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由于公社集体食堂常常管理不善，不能提供足够的优质饭菜，很快就不受欢迎了（克罗尔，1963年，第360—365页）。

克罗克夫妇记述了杨仪公社的许多食堂，从组织得很好、很受欢迎的食堂到那些炊事员拒绝公布帐目（认为公布帐目是对其诚实的怀疑）或者不改变饭菜花样（他说：“有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面粉我们就做面粉，有玉米我们就做玉米。”）的食堂。有一个食堂是由以前的两个食堂合并成的，其中的一个厨师非常向着他以前的老主顾；还有一个食堂的厨师认为烹饪工作是一项卑下的工作，只有当队里的支书来和他们一起干时，才能说服他们继续好好干。后来，经过调整并在认真监督下，公社食堂的工作得以改善。但是工资和燃料费用必须由工作组负担，这是在他们以前的有限的家庭预算经历中从没有遇到过的。此外，由于每个家庭用来煮饭的火随时都可以用来取暖，因此，即使他们花钱在食堂吃饭，多数家务劳动和生活费用仍没有减少。

1960—1961年的冬天，杨仪公社的食堂关门了。由于那些年的自然灾害，家务劳动的改革未能取得进展”（克鲁克，1966年，第151—138页），在长弓村，食堂最初是很受欢迎的，但是随着粮食越来越缺乏，逐渐变得不受欢迎了，那些劳作比较辛苦的人开始不愿意和那些干活少的人平分食物。

一些家庭退出了食堂，终于在1962年食堂解散了（欣顿，1983年，第232页）。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事实上，公社的炊事员都是“阶级敌人”——过去的地主和富农，因为贫农和中农都要在地里干活，炊事工作是他们唯一能干的新差事（韩素音，1980年，第298页）。长期以来对地主的愤恨和怀疑使人们相信这些炊事员可能乘机用村民们的东西肥了自己。

农民参加人民公社后，一些公社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而农民大都依靠自留地种些蔬菜来补充食物的不足，或者卖菜来换一些钱。50年代后期的调查表明，农民约20—30%的现金收入是靠卖自留地的产品换来的（沃克，1962年，第48页）。这些自留地是集体土地的一部分，它的多少随着国家政策和地方分配制度的变化而波动。实际上自留地的面积一直是占总面积的5—8%。1958年国家规定自留地如果还存在也要征税。

在大跃进时期，人们希望粮食取得一个大丰收，早日过上安乐的日子，于是制定了不切合实际的荒唐的产量目标，从而使他们谎报情况；而别的单位为了超过他们也制定了同样不可能实现的更新更高的目标。他们自称超额完成定额而使国家提高了征购粮食的数量，实际上没有一个省能达到要求。1958年后，一些省采取了另一种办法，伪造统计数据，少报产量，这样，如果它是粮食出口省，就可以减一些定额；如果是缺粮地区，就可得到更多的粮食调配额。

举一个例子说明杨仪公社是怎样制定出一个浮夸的目标，最后怎样面对现实的。十里店大队制定的1959年的计划，要求粮食平均亩产600斤，“这个目标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在中共中央‘继续反左’的号召下大胆制定的。

但是制定它的基础是依赖于以前已经夸大的数据”（克鲁克，1966年，第121页）。当1958年的实际产量统计出来后，平均亩产是316斤，这个产量比前几年有很大提高，但离所制定的目标还差得很远。这引起了农民的悲观情绪，因为“目标是一个依据，超额有奖，完不成受罚……”。农民变得无精打采，对地方干部产生了不满。最后，把1959年的目标修改为每亩370斤，这年的实际产量明显超过了所定目标。

大寨大队的领导陈永贵讲述了“浮夸风”（他后来被树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再后来也被指责虚报产量），在这个时期，大寨大队还比较固执，不与大跃进运动合拍，顶着国家、地区的压力，陈永贵仍拒绝虚报离奇的庄稼产量。结果那些所谓的“先进集体”受到奖励，选派代表赴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没有被选上。“一个干部劝我说：‘你不要太生气了，那些被选上的干部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成绩。’这个干部是一个老党员了，我对他说：‘那些成绩都是虚假的啊’。他赶快说：‘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会闯祸的’。我知道他是好心，就对他说：‘好吧，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不要告诉别人’”（欣顿，1983年，第236页）。

在上面这个故事里，我们不清楚政府官员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些先进单位的报告，但有时，真相是被干部们隐瞒起来了。东风公社接到一个指示要建一个能饲养1万头猪的饲养场，这个地区有几头猪，而且没有人知道怎样饲养，所以这条指示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直到接到通知说省里的高级检查团即将来检查，公社书记才要求长弓村在第二天早上6点之前建一个看上去象大养猪场的东西……村民们建了一个大拱形门，称之为“大跃进门”。第二天早晨，当检查团坐车经过这里时，公社贾书记手拿一把大扫帚，指着大门说：“从

这里可以通向我们的一万头猪的饲养场，”但卡车并没有减慢速度打算停下来，很明显没有人想过要下车走到拱门后面看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们相信了贾书记的话，坐着车一溜烟地消失在公路的尽头……”（欣顿，1983年，第244页）。

长弓村的“成功”宣传终于得到了“回报”。1958年底，有关方面要求在原来定额的基础上再征收3万斤粮食，长弓大队领导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同意卖1.5万斤。但是当他们在收割前队里还需要有多少粮食时，发现他们很快就要缺粮了。辛发（音）（一个老村干部）说：“最后政府不得不返销给我们四万斤粮食。他们不能让我们人均吃的比以前还少，所以只能这样做。开始他们不相信这儿有足够的粮食，但后来当他们弄清楚我们确实没有粮时，才把粮食返给我们”（欣顿，1983年，第247页）。这样，在丰收的年份里，队里也不能满足自己对粮食的需求，甚至没有完成国家最初下达的征购定额。

甚至在公社内部，虚报的问题也不是没有。1959年，杨仪公社的33个大队有13个大队少报了他们的收入（克鲁克，1966年，第101页）。隐瞒收入的数量是不容忽视的；1959年一个大队的总收入是189729元，第二年又增加了34271元，但是他们向上报的是只增加了4000元左右，隐瞒的数目相当于前一年总收入的16%。

斯诺总结了这种混乱的情况：“许多虚报了高产的公社发现他们必须努力存钱存粮，以便交税和完成向国家许诺的交售合同上规定的粮食定额。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虚报产量，请求国家以救济粮的形式把粮食返还给他们。帐目被搞乱了，政府自己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整个经济失去平衡和计划（斯诺，1966年，第174—175页）。

浮夸的另一个结果是：根据最初夸大的估计，1958年的收成将是1957年的两倍，因此在制定1959年的经济计划时，把总的播种面积减少了5%，并且把较大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植工业粮，等到第二年减少已成定局时，已来不及修改计划。因为减少了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误才是重要的原因”（拉迪，1983年，第42页）。

由于大跃进时政策不统一，集中征购粮食变得很困难。允许各省在本省内调整购销定额，中央政府仍控制省际之间的粮食调配。政府从产粮多的省调拨粮食逐渐受到抵制。例如，四川在50年代中期粮食一直比较充裕，1953—1957年间有745万吨粮食被调往他省，据说光1957年一年调出的粮食就达280万吨（唐尼索恩，1985年，第75页）。结果，四川省1954年的人均日耗食物热量就降到1691卡，低于人体必需的水平，而该年四川的实际粮食调配是很不得人心的。有证据表明在50年代，一些粮食输出省的农民感到不满，因为政府不相信他们只有够自己吃的粮食，更不用说相信他们也缺粮了。粮食输出造成了这些省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沃克，1984年，第94页和127页）。在自然灾害期间，中央要求从这些省再调出一部分粮食，受到消极抵抗（唐尼索恩，1970年，第18页）。

由于“浮夸风”和政府相信农作物连年丰收，粮食征购任务下达得非常高。特别是在1959年政府征购粮食的比例之高是80年代以前从未有过的，该年统购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5.4%，1960年下降至39.1%，1962年再降到29.1%，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没有超过25%。大跃进期间，干部们由于忙

于其它事情，而没有空闲估定粮食收获量，以便征购粮食，直到1959年1月份，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才只完成了3/4。这样，到最后期限时，只能非常匆忙地估定和征购。当1959年粮食收获后，浮夸风已经吹遍全国。那年粮食统购计划以创纪录的速度很快完成了。但是，征购任务只是根据当年产量估算的（伯恩斯坦，1984年，第354—355页）。假定两年的粮食产量都破了纪录，那么农民就应有充足的粮食吃和上交了。但是，至少在一些地方，农民强烈反对不合理的征购要求，把粮食藏在自己家里或者地窖里，并有武装人员看守（沃克，1984年，第142页）。统购的粮食中到底有多少返销给了缺粮地区还不清楚，但一份资料表明1959年国家净收购的粮食超过了粮食总产的28%（伯恩斯坦，1984年，第341—342页）。

此外，政府还告诉农民把部分增产粮食（如果有的话）存放在当地的仓库里。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只有不到1%的粮食是作为增产粮留作库存。而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收获的粮食的15—20%成为地方的储备，政府还鼓励地方上自己解决类似粮食这样占很大空间的农产品的运输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大炼钢铁运动使交通中断，另一方面是因军事行动被迫中断交通，这些军事行动包括炮击金门、西藏叛乱以及后来的中印战争。1954—1957年间，各省之间的粮食调拨量只占粮食征购总额的10%，到1958年减少到7.5%。

表 5.9 中国 1960—1962 年 12 省份全部
人口人均粮食产量估计

省份	1953—1957 平均每年 (公斤)	1960 (公斤)	1961 (公斤)	1962 (公斤)
中国全国	293	217	227	238
东北				
黑龙江	598	386	335	199
辽宁	282	—	183	—
西北				
青海	276	186	—	—
华北				
河南	257	145	—	—
河北	244	186	—	—
山东	254	151	—	—
华中				
湖南	304	—	220	—
华东				
江苏	271	176	214	220
西南				
贵州	269	—	—	209
四川	293	181	192	191
华南				
广西	289		227	
广东	308	238	(城市平均) 247	285

资料来源：沃克，1984 年

第五章 饥荒的范围和程度

全国景象

中国历年公布的统计数字使确定 1959—1961 年饥荒覆盖范围和程度的尝试成为可能（国家统计局，1983 年）。由于统计数字是研究饥荒时期的第一手官方文件，故本章所叙述的内容，除特别标明的外，均以此为依据。有关这些文件的局限性，在第一章里已进行过讨论。

自从 1949 年有近 800 万公顷土地遭受灾害以来，大多数年份里有约 2000 至 3000 万公顷的土地遭灾，但相比之下，1959—1961 年的灾害程度要严重得多。

按粮食产量 1.7 亿吨估计，1959 年的收成是糟糕的，但尚不至于致命。1960 年和 1961 年产量进一步下降，分别为 1.43 亿吨和 1.47 亿吨，到 1962 年，产量仍不及歉收的 1959 年。同往年一样，并不是整个中国都受到灾害影响。粗看一下图 5.1 中的地图就可明了 1960 年自然灾害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情况。

整个中国东部，即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区域受灾严重。一方面是严重旱灾（传统上，位于小麦带的大部分地区易遭受饥荒），另一方面是又旱又涝。到 1961 年，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有关饥荒在各省的分布状况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全国的情况。由于整个农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在 1959 年和 1960 年形势日渐明朗之前，政府已开始花大气

力抓粮食生产。

表 5.1 中国 1957—1984 年的受灾面积

(百万公顷)

年份	全部受灾地区	受灾害影响的地区*	洪水淹没地区	受洪水影响的地区*	旱灾覆盖地区	受旱灾影响的地区*
1957	28.2	16.0	8.0	6.0	17.2	7.4
1958	31.0	7.8	4.2	1.4	22.4	6.0
1959	44.8	13.7	4.8	1.8	33.8	11.2
1960	65.6	25.0	10.2	5.0	38.1	16.1
1961	61.8	28.8	8.8	6.4	37.9	18.7
1962	37.2	16.7	9.8	6.3	20.8	8.7
1963	32.2	20.2	14.1	10.6	18.9	9.0
1984	21.6	12.6	14.9	10.0	4.2	1.4

说明：旱灾和洪水所覆盖及影响的地区相加之和不等于是受灾总面积，因为总数中亦包括霜冻、台风及冰雹造成的损失。

* 受灾害影响的地区是指与常年相比农作物产量下降 30% 的地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3 年

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下降。目前尚无能提供最坏年份情况的数据，但在 1962 年，小麦每公顷仅 690 公斤，而 1957 年为 855 公斤；水稻每公顷仅 2340 公斤，而 1957 年为 2593 公斤。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有机肥不足。圈肥产量在 1958 年达到最高峰的 2.56 亿吨，到 1960 年则下降为 1.69 亿吨，牛、马等挽畜的粪肥从 5.24 亿吨下降到 4.9 亿吨（许，1982 年，第 54 页）。就在饥荒之前，华北和华中挽畜数量不足，已经开始制约双熟作物播种面积的扩大，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弃耕现象。1959—1961 年间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还意味着衰弱的农民常常无力去耕作。与正常年份的 1957 年粮食总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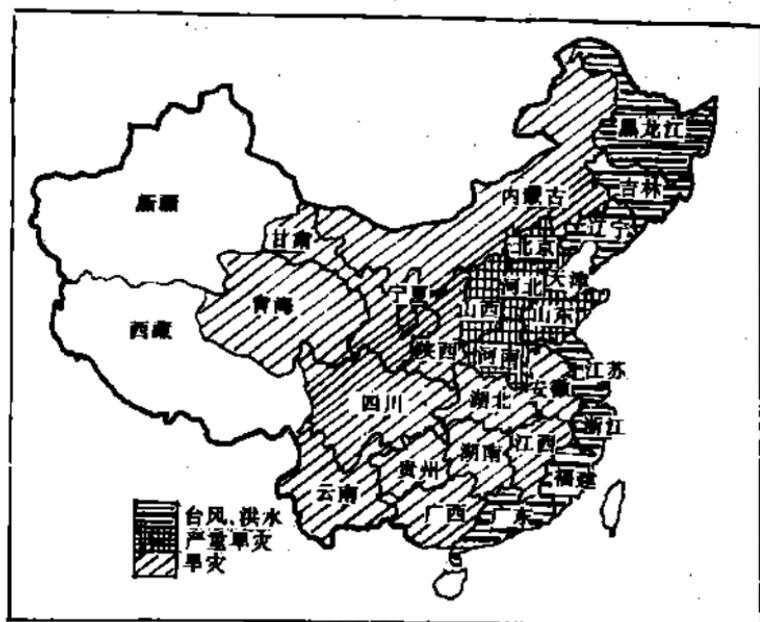


图 5.1 中国 1960 年受旱涝灾害影响的省份

1.95 亿吨相比，1960 年和 1961 年的产量分别下降 1/4。在 1959 到 1963 年的整个时期，粮食产量一直大大低于 1957 年。据计算，整个 50 年代平均来看，全部潜在的粮食增产量仅比全部潜在的地方缺粮额多出不足 100 万吨。其他农作物也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自 1961 年以后，因为自那时起，资源被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最紧要的粮食生产上去。

例如，茶叶产量由 1955 至 1957 年的平均 11.2 万吨下降到 1959 至 1963 年的 7.9 万吨，同期油料作物由 470 万吨下降为不到 180 万吨。猪、牛、羊肉产量下降到不足先前的一

半。棉花播种面积在1961年至1962年下降1/3。林区数字更令人震惊，森林面积由1957年的435.5万公顷减少到1961年的144.1万公顷，以及1962年的119.2万公顷。

表 5.2 中国 1957—1964 年全部农作物播种面积

年份	全部播种面积 (百万亩)	粮农作物占全部 播种面积 (%)	经济作物占全部 播种面积 (%)
1957	2358.7	85	9.2
1958	2279.9	84	9.1
1959	2136.1	81.5	9.5
1960	2258.6	81.3	8.8
1961	2148.2	84.8	6.5
1962	2103.2	86.7	8.3
1963	2103.2	88.1	7.3
1964	2153.0	85.1	8.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3年

表 5.3 1958—1964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

年份	粮食总产量 (百万吨)	人均粮食 产量 (公斤)
1958	200.0	303
1959	170.0	259
1960	143.5	217
1961	147.5	223
1962	180.0	238
1963	170.0	246
1964	197.5	28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3年

饥荒对经济的影响还通过其它特征表现出来，此即中国人所谓的“社会总产值”，即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事业以及商业产值的总和（李成瑞，1984年，第7页）。1960年至1961年，社会总产值下降了1/5，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生产下降首先由农业引发，1961年后其他部门积蓄日渐告罄以及不得不拨出款项用以进口粮食，致使所有部门的生产一齐下降。

1959年，运输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得到了增加，次年又有进一步增长。这部分地反映了国家在分配供应物资方面的努力。例如，1959至1961年，日均运粮车数比1955至1957年增加16%。铁路货运量1957至1959年增加了一倍，1960年又有所增加，但到1961年即恢复正常。公路货运量在1960年也达到高峰，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空中运输量的增长甚至更为明显，1960年竟为1957年的5倍。这种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同印度的战争引起的频繁军事调动所致。不过，至少部分原因应归在于全国范围内所加强的对食物和药品的转运。这也是一件不易的事。尽管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10年里公路长度增长6倍，但公路质量依然是参差不齐的。水路通航里程在这几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在1959至1962年间达到高峰。相比而言，铁路网的建设速度较为缓慢，到1959年线路长度只比原来增长1/3。然而，即使没有运粮专车的拖累，中国铁路也是“所有大国中使用最繁忙的系统”（帕金斯，1969年，第160页）。这些增加对于有效地医治好这个辽阔国家的交通沉痾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1959至1961年，中国出口下降1/3，按照埃克斯坦（1962年；第20页）的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产品出口减

少，尤其是粮食出口的减少；不久前中国官方发表的数字表明，这一下降的幅度实际更大，达45%。有关粮食出口总量的数据目前仍然不明。就在最近中国资料公开前不久，唐尼索恩（1970年，第34页）和萨尔斯（1978年，第655页）曾对粮食出口数据进行过广泛比较，结果表明1961—1962年间，粮食出口下降了一半。但这些数据从总体上说不仅与近来中国发表的有关谷物出口数字显著不同，而且也明显有别或大大低于沃克（1984年）的估计。各种数字见表5.4。从沃克和中国官方的数字中也同样可看出出口额至少下降了一半。

中国在1959年和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这一事实令人惊讶。这很可能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统计上的混乱，再加上受1958年和1959年助长起来的浮夸风（虚报产量）后遗症的影响。这两种情况使得高层领导相信国内有可供出口的粮食。其次，粮食大部分出口到苏联用以抵偿对方曾给予的援助。1959年，中国人曾从俄国得到总数为3亿美元的贷款；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人又为中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军事援助，所有这些均须全部偿还（罗德津斯基，1984年，第395页）。在两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履行偿还义务的压力日益增大，特别是当时苏联也一样经历着歉收的年景（米利斯，1984年，第301页）。

与此同时，粮食不断短缺迫使政府转向进口。官方数字不仅清楚地表明1961年后谷物进口大量增加，而且显示出主要是小麦进口增加了。据萨尔斯（1978年，第657页）估算，购买粮食占从国外进口数额的26%；1961至1964年间，粮食进口用去了国家所支出硬通货的一半以上。鉴于萨尔斯对小麦进口的估计比较接近于官方数字，故可认为他的估算大

体上正确。不过，他同时指出，60年代初人均粮食净进口不会超过6—7公斤（上引书，第658页）；官方数字显示的这一净进口值甚至更小。进口粮食的大部分被运往城市，因为相对于中国广大农村来说，运到城市比运到农村要便利和便宜得多（帕金斯，1969年，第160页）。

表 5.4 1959—1962 年粮食进出口额

(1000 吨)						
	1959	1969	1980	1981	1962	1963
进口						
小麦	127.1	—	—	2622.6	4419.1	4394.0
稻米 ¹	11.7	—	28.3	62.4	4.7	97.1
大麦	—	—	—	1089.4	486.6	26.0
玉米	30.7	0.2	—	44.3	491.2	13.4
黑豆	—	—	—	100.1	246.9	—
燕麦	—	—	—	66.3	47.4	26.9
其他	—	—	—	—	23.5	—
面粉 ²	0.6	0.3	0.4	450.8	279.9	0.9
进口总计	160.1	0.6	28.7	4444.8	5999.3	4577.3
出口						
小麦	0.6	157.6	112.3	121.4	89.1	109.9
稻米	1286.1	1881.1	1153.3	445.9	573.2	637.6
玉米	15.7	92.4	70.9	30.3	0.8	109.8
出口总计 ³	1301.9	1967.4	1396.6	595.6	867.6	858.8
净值						
进口				3849.3	6381.6	3698.5
出口	1141.8	1966.9	1367.9			

续表

进口小麦 ⁴	127.0	9.0	—	4093.0	3957.0	5455.0
粗粒	31.0	—	—	1446.0	1100.0	65.0
稻米 ⁵	17.0	—	40.0	89.0	7.0	139.0
进口总计 ⁴	170.0	9.0	28.0	5801.0	5122.0	5817.0
出口						
稻米 ⁴	1265.0	1667.0	1174.4	440.0	578.0	640.0
粗粒	33.0	139.0	132.0	33.0	1.0	112.0
出口总计 ⁷						
净值						
进口				5008.0	4454.0	4755.0
出口	1129.0	1055.0	1450.0			

(C) 沃克 (1984年, 第163页) 估算

进口						
小麦	127.0	9.0	—	4093.0	3957.0	5455.0
粗粒	31.0	—	—	1446.0	1160.0	65.0
进口总计	175.0	9.0	40.0	5828.0	5124.0	5558.0
出口						
稻米 ⁴	1607.0	2239.0	1667.0	634.0	854.0	914.0
大豆 ⁴	961.0	343.0	1178.0	343.0	350.0	867.0
其他 ¹⁰	187.0	360.0	428.0	191.0	149.0	181.0
出口总计	2395.0	3962.0	3291.0	1168.0	1359.0	1462.0
净值						
进口				4450.0	3771.0	4207.0
出口	2760.0	3053.0	3241.0			

(4) 国家统计局 (1984年, 第422、434页)

进口						
谷类(全部)	223.5	2.0	65.3	5809.7	4928.0	6952.0
其中小 麦出口	148.3	—	38.7	3881.7	3535.6	5687.7
谷类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8	1490.1
净值						
进口				4454.7	3892.1	4451.9
出口	2658.8	4155.5	28654.1			

注释: 1. 脱皮的同类粮食

2. 小麦粉、其他谷类磨成的粉、可充作粮食的粉

3. 包括大麦、黑麦、燕麦和小麦粉

4. 包括掺有小麦粉的其他粮食粉

5. 包括小数目粗米进口

6. 脱皮净重

7. 包括小数目的小麦进口

8. 全部同类粮食

9. 包括与豆类等量的豆油

10. 粗粮和小麦

对人口的影响

1959年, 韩素音观察到了衰退的最早迹象。“我走在大街上, 隐约感觉到那场重压来临时的第一个兆头, 这就是人们的倦怠情绪。他们松松垮垮, 不再忙碌, 口粮配给额已经削减, 可供敞开供应的唯有大白菜而已。在一家饭馆里, 跑堂责备我不该碗底留下几粒剩米”(韩素音, 1980年, 第242页)。在大饥荒期间, 上海比其他大多数地区损失要小一些, 一则是由于工业化水平较高, 二则是由于郊区公社相对来说

洪灾不重，故在上海没发生明显的粮食短缺现象。“不过大街上出现了一些兜售蟹爪和虾米的商贩，政府官员对这种私人经营活动睁一眼闭一眼”（上引书，第 247 页）。但从总体上说，在食物不足的这个阶段，城市看来比农村承受的压力要大。“三哥来看我，他告诉我说，由于缺少吃的，那些不良分子，即在城市中没有工作的人，开始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农村定居。村民们吃得好多了，他们种什么吃什么，有了余粮才供给城市。‘这年头哪里会有余粮啊！’三哥对我说”（上引书，第 253 页）。只要听说某村有点余粮，那些由学校、工厂或其他单位人员组织起来的“运输大队”就会喧嚣而至抢购一空。有的单位甚至在乡下租了田，与公社直接订约，以让对方保证提供食物和养猪。官方对这种交易的态度是视而不见（上引书，第 288 页）。

城市居民急剧增加使向城市提供给养变得日益困难。1957 至 1961 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 3000 万，即增加 1/3。大幅度增加发生于 1958 年，当时是为满足大跃进中发展工业的需要。正如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一样，能在城市里留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民摆脱了饥荒。中共党内从事经济工作的最高层领导人陈云提议为城市剩余人口采办粮食。粮食只能购自高产地区，但他发现让这些地区的农民以 300 斤脱壳粮食维持一年左右的生活是可以做到的，但这种状况如长期持续下去，势必会挫伤当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高产地区转变成缺粮地区。陈云指出，这种情况黑龙江省已经发生过，在正处于紧张状态下的浙江和江苏某些地区，也开始出现类似苗头（伯恩斯坦，1984 年，第 352 页）。

一年后，当韩素音重返中国时，短缺现象已日趋明显。

“市场上，一排排的小店铺里冷清极了，只剩下无精打采闲坐

着的伙计和空空荡荡的货架。没有钉子，没有绳子，没有鞭子，没有眼镜，没有……无论哪里，人们总是耷拉着头，极少举足去逛一逛商店，没有扣儿，没有针，没有线，没有壶，没有锅，没有……”（韩素音，1980年，第286页）。

她写道，1960年的城市定量，根据工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高级知识分子能得到更多一些的糖、脂肪和肉，每天大约有2000多卡热量，一般知识分子，如学校教师等，脂肪摄入量少一些，平均每天有1800卡，从事重工业生产的工人平均约有2500卡，每月可得到17.5—20公斤大米，而一般工人能得到大约15公斤大米，学生们每天最高能得到2000卡的热量，所供食物中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较少。办公室职员大约1500—1800卡，每月13—15公斤大米，情况最差的是家庭主妇，除非她们是怀孕职工（可得到工人的定量）。普通家庭主妇每天可得到1200卡热量或者更少。确切的定量各地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在1960年，北方的情况最糟。“在北京、西安和太原的大街上，我开始发现患严重脚气病的人，他们排着长队等候在医院门口，浮肿的脸十分难看”（上引书，第287页）。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人们遭受的困苦起初尚不严重。汕头人告诉莫舍说，1960年他们的大米配给量减少了，“后来再度削减，到最后人们的伙食中就不再有米饭，只好靠红薯度日。但是没过多久连红薯也吃不上了，他们就只能加工农村的弃料充作食物，在1961年春天到来之前，不少家庭都在简陋的墓穴里安葬自己的老人或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埋掉自己的婴儿”（莫舍，1983年，第50页）。

埃德加·斯诺也在1960年重访了中国，他曾与一名老三轮车夫，即过去的人力车夫进行过交谈并作了描述（斯诺，1966年，第26页）。那位长者讲述说，他的生活情况“很一

般”。他现在已娶了妻（在解放前他是娶不起的），并且她也工作了。他们的女儿在一家托儿所工作（“‘旧社会谁听说过有托儿所！’”）。但是“……‘假如我们有更多的东西吃，帝国主义者——’他小声嘟囔了几句……”后来他也注意到乡下人比城里人吃得好，他们“除了基本粮食定量外，还有充足的蔬菜供应；另外根据其劳动表现还可得到奖励”（斯诺，1966年，第641页）。

然而他对饥荒严重程度的总体估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是过于乐观了。他写道，食物短缺是严重的，主食被严格规定按定量供应并大大低于西方人所认为的符合营养的标准。但是，并没有发现饥饿现象，人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工作条件也很舒适。

他持这种乐观态度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提及。他最后一次看到中国，正值中国陷入漫长而恐怖的内战之中，通货膨胀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政府处于瘫痪状态。这些现象原本可以提醒他情况正逐渐恶化，但1949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他来说是太耀眼了，以致于他难以承认这些不易觉察到的变化。然而对韩素音来说，每一变化都是那样的直观。斯诺与一名“相当高级的官员”的一段“破记录”的谈话，也可以为他作最好的总结。斯诺说，在他看来中国显然已不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你错了……确实，与蒋介石统治时期相比，中国现在条件要好得多，但对此不能强调过头。旧中国不是象现在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进步因素……’”（斯诺，1966年，第15页）。此外，自豪感和敌对心理使得中国人不会同外国人谈饥荒问题，尤其是同斯诺这种“帝国主义分子”。

他也许是对一些外国人有关中国灾难的危言耸听的言论

反应过烈。这些外国人在冷战的气氛中，将饥荒视为中国民众推翻其领袖（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的唯一机会。英国国会议员西里尔·奥斯本爵士 1960 年自中国带回消息说，中国人赖以维生的食物热量平均每日不足 600 卡。约瑟夫·艾尔索普以愉快的心情发表了据此得出的结论（1 年后）。据他计算，这意味着一个人每月体重要减少 20 镑。此时斯诺也以同样的兴致进行了推算：假如该结论正确，那么中国的全部人口早在艾尔索普先生的专栏文章发表前两三个月就已在地球上消失了（斯诺，1966 年，第 614 页）。

约瑟夫·艾尔索普应邀在《中国季刊》上撰文以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争辩说，自大跃进以来，中国已被无情地抛入螺旋下降的泥潭中。这种状况到 1962 年已接近灾难性的边缘，某种程度的崩溃显然已不可避免，因为一个政府强加给被统治者的苦难得有一定的限度。他认为，唯有一场特大丰收才能挽救中国政权（艾尔索普，1962 年，第 21—37 页）。一大批学者应邀对他的论点加以评论，其中有些人从流入香港的难民数量（主要来自广东）的角度来讨论饥荒的严重程度。据其中一些报告估计，1961 至 1962 年冬天日均消费在 1600—1800 卡之间（埃克斯坦，1962 年，第 21 页；罗伯逊，1962 年，第 43 页）。不过，正如一位学者所指明的，“抽象的数字即使正确也于事无补，因不加作料和食用油，一个人不可能一年到头天天吃自己所喜爱的同一种食物，无论是红薯抑或米饭……”（拉丹尼，1962 年，第 32 页）。有几位作者则从医学角度指出了饥荒的特征：

子宫下垂和月经不调在大陆妇女中是很常见的。对由饥饿引起的浮肿发病情况，则有不同估计。一些情报

分析表明，有些地区患病率仅为 20%，而在一些地区则达 60%。甚至有传闻称在中国一些地区，受肿胀这种可怕疾病折磨的人，其腹部隆起的饱和度竟达 90%。迅速传播的肝炎在医院里流行起来，以致于患病的医生不愿意去照料更重的病号（麦克利什，1962 年，第 40 页）。

另一份报告指明了危机在华南发生发展的时间过程。“在广东省，营养不足现象在 1960—1961 年冬天首次广泛而明显地暴露出来……到 1961 年春，有关该病所致浮肿的报道达到了顶峰。今春 [1962 年] 此病看来将比 1959 年更为流行”（罗伯逊，1962 年，第 44 页）。但罗伯逊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1962 年 5 月流入香港的难民并没有表现出临床意义上的营养不良迹象（上引书，第 43 页）。不过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由于难民大多是徒步长途跋涉逃难的，故是经过筛选的一部分人，他们的体力能够胜任这样的长途旅行。

最为有趣的是，斯诺自己对危机年代的粮食产量所作的估计非常接近于事实。他计算的 1958 年粮食产量为 2 亿吨——与现在中国已公布的数字相符（见表 5.3）——1960 年产量为 1.52 亿吨，只比官方数字略高 900 万吨。他认识到如此低的数字意味着人均定量也必然很低，但人们似乎更相信这个国家的分配能力而不打算去证实这个定量的具体数额。斯诺摘录了一位官员的一段报告，该官员称平均的最低粮食定量为 27.5 磅（约 1500 卡）。某些地区也许看重“平均”这个字眼儿（斯诺，1966 年，第 266 页）。他承认，随着原来种植经济作物的农田转为耕地以及自留地，自留禽、家庭养猪、为生产饲料和自己消费而开垦闲置地等的不断增加，这份定量已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弥补。

然而不幸的是，上述私人活动远远抵偿不了粮食损失，无情的洪水和旱灾还是对这些自留地和闲置地及其所产一视同仁。1957年前，自留地粮食产量一直呈增长趋势，到1957年前，达到农业总产量的4.5%。此后产量又有增长，1960年达7.7%，1961—1962年为7.3%。但这高确保人们得到足够的营养还差得远。

地区差异

准确地说，在“平均数”中到底隐藏着多少个可变量依然不得而知。不过，通过几点重要的暗示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之间粮食自给能力的不平衡性。50年代，按照经济学家陈云的说法，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歉收，有大约5000万人口粮不能自给（由于收入低，需要赡养老人等），平均约4000万人有暂时性缺粮现象。此外，有大约3000至4000万从事种植其他作物的人需长期购入口粮（拉迪，1983年，第32页）。这样一来，就有5000万人长期处于缺粮状态，另有3000至4000万人需要购粮以糊口，其中包括一旦粮食供应紧张就陷于饥荒、一旦其经济作物受损即无力承购所需口粮的那些人。这就提供了饥荒中“最需急救”的人的最低的数字：约占全国人口的1/8。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那些在灾害中直接遭受损失的人——正常年份是4000万。1959—1961年不是正常年份，故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最需急救”的人中有多少是新增加的，他们来自哪些阶层以及哪些省份。

关于50年代中国人口粮的采购与消费情况，沃克（1984年）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研究报告。1952—1957年间，经研究证实中国南北方粮食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恶化。华北地区（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潜在的粮食缺口进一步增大，而

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和西北地区（内蒙、甘肃、陕西、新疆和青海）潜在的粮食盈余却在减少。

50年代，山西、山东以及南方的广西、福建和广东等五省已不再对外输出粮食。1953—1957年，黑龙江和吉林将粮食输出减少了56%，使整个东北变为净缺粮地区。华北的粮食输入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57年输入额比1952年高出42%。从西北和东北调拨来的余粮已不能堵塞华北的缺口，因而不得不从西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湖南、江西、湖北越来越多的地区调配粮食，这不仅为有限的运输设施增添了沉重的额外负担，而且运输中的高额费用又使政府不得不提供大量补贴以确保粮价的合理。

按气候条件来说，1952—1957年这段时间可分为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以及两个平年，但依照各省数据所进行的分析却表明导致各省粮食产量波动的不利因素彼此有很大差异。在安徽和江苏，产量每年都有波动，而西南各省则保持了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个别年份较大范围的波动往往导致人均产量大大低于自给自足的水准。

华北地区粮食生产日趋下降和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的高度脆弱性，便于进一步确定“最需急救的”的省份。就50年代的粮食消费而言，与粮食生产相反，省一级的消费水平要高于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是由沃克经过分析24省中20个省的情况后认为适宜而确立的。不过，穷省也是有的，它们是河南、河北、山西及5年中有3年受穷的甘肃。在某些年份，粮食消费水平低并非由于产量下降，而是由于政府为其他地区征购粮食。河南、山西、内蒙、甘肃、贵州和四川均需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内承受高征购额所带来的困苦。

即使是省一级的资料，也掩盖了那些波及甚广的差别。沃



图 5.2 中国 1952—1957 的人均产量(公斤)、人均产量增长(%)和
 稳产情况

(图中 Kg 代表“公斤”，P.a. 代表“每年”——译者注)

克在 11 省的专区一级收集了不少有关 1957 年人均粮食产量不平衡的数据(沃克, 1984 年, 第 6—10 页)。1957 年, 全国共有 180 个专区, 平均每个有约 300 万农村居民, 有的专区人口仅 200 万, 也有的专区达 500—800 万。普遍贫穷最突出的省是河北省, 它的 10 个专区中有 8 个位于自给线以下,

涉及的人口几乎达 3200 万。比较而言，特别不平衡的省份是江苏和陕西。这两省中最富裕的专区的农村人均粮食产量比最穷专区高出近两倍。河北、四川和广东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最富的专区比最穷专区的产量高一倍。如根据沃克给“自给自足”下的定义，即农村人均粮食产量为 275 公斤，对它们加以分类，那么，就可以确定出相当一批特别贫穷的专区。它们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北、江苏以及四川。

在专区以下，沃克收集了有关山东和四川几个县的资料（上引书，第 10—21 页）。资料表明，在山东，虽然在平均水平徘徊的专区比较少，但在 8 个专区中，有 7 个区的 38 个县是缺粮县。这些县的大部分属于 4 个专区，主要生产棉花或花生。但是这种生产非粮食作物的专业化并不是解释粮食低产的唯一原因。在缺粮县，粮食单产也同样是低的。这些缺粮县的农村总人口为 1490 万。经分析，四川的缺粮县也同样反映出人均产量有较大波动的特点。四川的缺粮县为 45 个，涉及的农村人口为 1960 万，即超过全省农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仅在四川的三个专区，各县一年生产的余粮总计就达 100 万吨。

表 5.5 1952—1957 年中国 11 省
专区一级农村人均粮食产量的不平衡

省份	专区	农村常住人 口数 (百万)	农村人均 粮食产量 (公斤)	全省农村人 均粮食产量 (公斤)
甘肃	粮川	0.70	465	340
	张掖	2.08	400	
	平凉	2.05	302	

续表

省份	专区	农村常住人 口数 (百万)	农村人均 粮食产量 (公斤)	全省农村人 均粮食产量 (公斤)
陕西	定西	2.21	364	327
	武都	0.89	341	
	甘南	0.30	240	
	汉中	2.12	363	
	延安	0.79	270	
河北	榆林	1.45	122	245
	唐山	4.28	407	
	承德	1.92	342	
	沧州	4.60	269	
	衡水	3.01	266	
	天津	3.21	266	
	张家口	3.15	256	
	保定	5.65	226	
	邯郸	3.32	212	
	石家庄	6.80	207	
	邢台	3.05	175	
山西	长治	2.51	440	320
	晋南	3.45	298	
	雁北	1.60	273	
	榆次	3.10	262	
山东	莱阳	7.40	356	272
	昌潍	7.61	332	

续表

省份	专区	农村常住人口数 (百万)	农村人均 粮食产量 (公斤)	全省农村人 均粮食产量 (公斤)
湖南	济宁	4.68	331	334
	泰安	4.79	303	
	惠民	6.23	286	
	聊城	6.71	279	
	菏泽	4.83	278	
	临沂	6.33	267*	
	常德	6.14	392	
	湘潭	6.81	379	
	湘南	7.82	333	
	黔阳	2.34	309	
	湘西	1.59	281	
安徽	邵阳	5.73	263*	348
	芜湖	5.0	500	
	安庆	4.58	568	
江苏	阜阳	7.60	257*	314
	苏州	5.11	486	
	松江	2.30	468	
	扬州	6.58	296	
	盐城	3.99	286	
	徐州	4.65	254*	
	南通	5.32	206*	
	淮阴	5.23	183*	

续表

省份	专区	农村常住人 口数 (百万)	农村人均 粮食产量 (公斤)	全省农村人 均粮食产量 (公斤)
四川	涪江	4.68	436	320
	江津	6.02	373	
	内江	5.32	337	
	遂宁	6.75	266	
	雅安	0.69	242	
	西昌	1.29	203	
	南充	6.10	181	
福建	南平	1.63	551	356
	龙溪(音)	150	529	
	福安	105	338	
	闽侯	1.76	321	
	晋江	4.37	300	
	龙岩	2.04	282	
	广东	佛山	4.18	
	化州	6.10	3.84	
	海南	2.50	284	
	广北及韶关	3.50	226	

注释：沃克对专区名称的拼法

• 粮食不能自给的专区

资料来源：沃克，1984年

拉迪在70年代后期对中国常年贫困地区所作的一份分析(1983年,第172—185页)表明,常年贫困地区通常存在地域性分布。1977—1979年,65%的穷县集中于5个省。更

具体一点说，农村贫困集中于四个地理区域——华北平原（71县），西南的云南和贵州（66县），西北黄土高原（48县），以及东南沿海的福建（11县）。上述地区几乎占全部贫困县的90%。当然，70年代末的情况与50年代末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也不能设想现在的常年贫困县名单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拉迪将这些地区的贫困现状主要归咎于农业管理不善——特别是饥荒过后只强调粮食生产而忽视种植更适宜当地条件的作物这种做法——由此可以明白那些历来穷困或以购粮维生的地区的人民之所以过艰苦日子的原因了。

华北平原西北部的贫困地位看来是在大饥荒时期确立的。在50年代，该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不少县以高收入而闻名。但在饥荒时期，棉产量急剧下降——在某些县，竟不足原来产量的10%——因为土地被转用来生产农民不易购买的粮食。“为数众多的农民在60年代初就是靠到黄河以南地区用旧衣服换回粮食才得以活下来的”（拉迪，1983年，第177页）。

作为华北平原另一部分的淮北地区，也历来是一个贫穷地区，而且看来还会继续穷下去。淮北几乎常年受洪涝和干旱的轮番浩劫，总体上的落后性阻碍了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为政府最雄心勃勃的规划之一的水利工程即以淮河为重心，但是该地区的水浇地面积仅从1952年的不到1%增加到1957年的大约3%。相比之下，全国水浇地面积从1952年的20%上升到1957年的31%。饥荒对安徽省人口的影响将在下章讨论。可以有把握地说，安徽死于饥荒的人大部分分布在淮北平原，活着的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地为糊口而挣扎。

在安徽，经济作物是如何让位于粮食作物的，伯恩斯坦举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从当地两个县——一个产茶，一个产棉——征购的粮食异乎寻常地增加了，竟大大超过1958年所要求的增长额度。这一方面说明国家急于增加粮食储备，另一方面也表明两县加强了粮食生产，而不再全力发展经济作物。不过，对下面将涉及到的具体数字不应过份强调或认真对待，因为在这两年间，两个县对经济作物和所产粮食的全部征购额被规定得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它们当初是否向上级申报了大大超出其生产极限的产量。

表 5.6 1957—1958 年安徽征购额增长百分比

	1957	1958
安徽农业产量	21.6	18.5
安徽征购额	17.0	16.5
蕪县征购额		
棉花	120.5	29.5
粮食	21.5	61.0
祁门县征购额		
茶叶	41.6	12.5
粮食	12.5	20.8

资料来源：伯恩斯坦，1984年

黄土高原历来受降雨量无常和不足之苦，不过在50年代，生产油茶籽，发展畜牧业和造林使当地人心安理得地获得了高收入。在公社化过程中，一些家畜被摧残殆尽，剩下的一些在困难年代里因饲养不起而只好杀掉。当粮食日趋紧张时，那些饱受洪涝和干旱折磨的土地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

粮食生产。不过这时已有不少人饿死。一些人就死在救济粮分发过程中。拉迪指出，在一个1960年粮食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里，挨饿现象十分普遍。在固原县，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还有所下降（拉迪，1983年，第182—183页）。对牲畜的屠宰也加剧了救济粮分发的困难。

西南的情况较为复杂。该地存在着诸如极端的环境差异、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以及交通和运输条件极为恶劣等诸多问题。此外，云南人均耕地数在全国是最低的（费孝通、张之毅，1949年，第11页）。50年代，云南南部的多山地区，如位于中老和中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仅能生产所需粮食的1/3，其余均需依靠卖菜叶、热带水果以及中草药来赚钱购买。到饥荒年代，这些特产的销路几乎断绝，因而在1962年，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尚不及1957年的一半（拉迪，1983年，第185页）。1959—1961年间，这个偏僻省份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还意味着现成的粮食根本运不到最急需的地区。

上述分析证实，居住在极端贫困地区（气候条件不适除外）的人，以及居住在以经济作物换取口粮的地区的人最易受到1959—1961年饥荒的影响。由于这些地区分布比较集中，故这种情况又可表明尽管饥荒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均意味着缺粮，但赤贫和死亡往往只发生于相对小的几块地理区域内。用森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在征集足够的粮食以进行分配和运输方面的种种困难，使那些最需救济的人所享受的公共保障权利受到忽视；使那些靠经济作物维持生计的人，由于其产品价格低于粮价而蒙受损失。与此同时，那些直接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的农民无论是生产经济作物抑或生产粮食，均受到直接的权利损害，因为他们不是减产就是颗粒无收。

然而，这场饥荒并不仅限于上述那些贫穷、偏僻或是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正如先前我们已提到的，中国一位官员曾引用黑龙江省的情况说，在国家征购政策的压力下，那里已由高产粮区变成了缺粮区。60年代初一份对黑龙江12个县24个生产大队所作的调查表明，这种征购额非常之高，一般达产量的80%，有一个大队甚至达83%。牲口死了，人变弱了，下一步就是死人。最后，国家不得不再向农民提供返销粮，但这又造成了商品流通的混乱、运输困难以及浪费现象。对许多村庄来说，“返销粮来得并不及时”（伯恩斯坦，1984年，第377页）。在接受返销粮的地区，农民所需的口粮常被官方配给制度所削减。

地方报刊也是借以了解饥荒地区情况的资料来源。山东的报刊尤其忙于介绍采取“一些措施如收集‘一切在当地可以找到的可食或可用的东西’”（伯恩斯坦，1984年，第357页）。河南和湖南的报刊在1959—1960年间，虽然经常声称本省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面前取得了创纪录的大丰收，但也牵涉到饥荒问题（上引书，第356页）。报刊发表的关于饥荒的报道，有些旨在劝说境况较好地区的农民充分认识征购政策的必要性，并开导他们应满足于国家为他们保留的为数不多的口粮，因为其他地区的同胞有更迫切、更大量的需要。

还有一个有关饥荒地区情况的线索是分析1957年至饥荒发生这段时间内每年的挽畜数目。所有大型畜类和挽畜的数量在1961都达到最低点，挽畜数下降近30%，相比之下，大型畜类和挽畜的总数下降率仅为17%。这主要是由于该年度耕牛及水牛的数目减少15%所引起的——很不幸，在大型畜类和挽畜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为这两种动物为当时国家大型畜类中最大的品种。马匹的数目也下降15%，到

1961年降到最低点。驴骡的数目每年都有下降，1962年骡子数目下降23%，驴子下降40%。相比之下，骆驼数量在整个时期却有缓慢平稳的增加（国家统计局，1983年，第176页）。以上情况表明，在华南、西部和大西北经常使用水牛、马匹及骆驼的地区，受灾程度比其他地区要轻微一些。这里所谓的其他地区，也正是饥荒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

总而言之，将饥荒时期安徽、甘肃、贵州、河南、湖南、山东、山西、陕西、云南以及四川和黑龙江部分受灾最重地区的情况集中起来作一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地区所遭遇的最大困难大体上是一致的。如果各地区的人口数字、特别是关于各地区年龄结构的统计数字得以发表，人们面前就会展现出一幅详尽的各省饥荒状况图。尽管并非任何一省的所有地区都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事实却越来越表明这场饥荒远远超出了某个地方甚或某个地区力所能及的范围。

饥荒持续的时间

城市首先感觉到粮食短缺是在1958年冬。是年，冬季正常的物资短缺与大白菜供应不足以及1958年收获后对城市的供应被延迟等交织在一起。通常，向城市提供大白菜的是郊区农村，但时下它们正忙于大炼钢铁以及其他与大跃进相关的活动。外地劳工大规模涌入使城市原本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粮食短缺则令大跃进陷入了瘫痪。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将全国比作“一盘棋”，强调有必要在全国重新确立粮食调配的集中领导体制（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55页）。

国家仍然确信，只要它打算征购，农村就总是会有买不尽的粮食。城市的处境在1959—1960年间得到一些改善，该年度平均每个居民的粮食征购额为约353公斤，而1958—

1959年的相应数字为228公斤。毛泽东后来承认，1959—1960年的征购是“竭泽而渔”。意识到1960年产量又有下降之后，他接下去解释了1960—1961年城镇人口均净征购额降为283公斤的原因。于是1961年政府只好重新大量进口粮食，并初次做出努力以减少那些蜂拥进入城市的过剩人口。进口来的粮食约占全部城市人口所需量的近14%，但这些并不能应付1961—1962年总产量的二番下降。该年度人均征购额变为238公斤。甚至在第二年，每个城镇人口的粮食征购额也只有255公斤，低于1959—1961年的水平。

在农村地区确定饥荒的持续时间是非常复杂的。位于小麦产区的辽宁、山东、河北和安徽，在1958年间土豆产量猛增，对粮食总产量的估计于是就有了“水份”，实际上掩盖了“真正的”粮食增长很少的事实，且在某些情况下，“真正的”粮食产量甚至是下降的。这种作法的结果是进一步拉大了南北方粮食产量的差距。

1958年冬和1959年春，不仅北方小麦产区，而且华中和华南的许多省份也开始接二连三地遭到旱灾的侵袭。根据粮食播种面积所估计的14省的粮食产量表明，山西、河南、陕西和山东正在归入粮食不再出口的省份。可归入这一名单的还有四川，它的境况最糟。华北地区受灾极重（上引书，第147—149页），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1958—1959年农民的粮食拥有量比起城里人来要少得多的事实，如表5.7中所示。

1959年的挫折给一个地方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影响，这就是山西省的长弓村。在经历了一次加入一项大型农业联合计划的灾难性冒险之后，尽管存在着半信半疑地试图采用无肥栽培法（该项联合计划要求贯彻此法）、四处蔓延的旱灾以及大跃进后农民心灰意冷的精神状态等诸多不利因素，长弓人

表 5.7 中国 1958—1959 年到 1960—1963 年人均粮食拥有量

年份	产量 (百万吨)	净征购 比率 (%)	农村人均 占有粮食 (公斤)		城市人均 净征购额 (公斤)	
平均						
1953—57	181.6	15.3	290		300	
1958—59	200.0	19.8	311		228	
1959—60	170.0	28.0	223	219	360	353.4
1960—61	143.5	28.0	191	188	308	283.5
1961—62	147.5	17.5	225		274	238.4
1962—63	160.0	18.1	234		288	254.5

• 沃克 (1984 年), 第 142 页

从沃克的书里整理所得。他的人口数字是基于对这些年中人口的估计数。我在官方公布的有关这些年的人口总数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计算。城市人均净征购额也即出口净余额。

还是赢得了远远超过以往、或者多干几年才能得到的高工分收入。联合计划失败后，为捞回些损失，公社决定让该村生产蔬菜（该村已有几眼井和几顷水浇菜园）和用现成的土窑烧砖。到 1959 年，仍处于发展中的新企业烧制的砖供不应求，长弓人因而从生产和运输两方面得益。在蔬菜经营上，由于整个晋东南地区蔬菜短缺，故他们的买卖甚为红火：

通常，茄子在城里要卖到 1 角 2 分 1 斤，在菜地里却卖到 5 角 1 斤。大白菜和水萝卜也可卖到同样高价。个人将分配给他们的小堆蔬菜以更高价售出……菜贩们往往称一下菜的重量。但在 1959 年，无论卖主还是买主

均无闲暇顾及于此。于是，长弓人就将萝卜，白菜和茄子等在地上随便堆成堆儿，按堆儿的大小估计重量。“这堆儿一万斤，那堆儿6000斤”。即使他们高估了菜的重量，买主也会立即付钱拉菜而不讨价还价。时常有买主在村子里四处转悠以图发现能吃的东西。有些人通过“走后门”来到村里并付出远高于公价的黑市价（欣顿，1983年，第249—250页）。

由以上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晋东南地区在1959年极端缺粮，但人们仍然能够用一些积蓄去购买市场上可以提供的东西。正因如此，长弓人得以继续用卖蔬菜赚得的钱换取粮食，当第二年来临时，上述情景就大变了样子。遍及整个地区的严重干旱使长弓人只生产出“比土改前略多一点”的粮食（上引书，第249页），因而不得不减少对市场的蔬菜供应量。不过，到了这步田地后，即便让村民们自己主动去叫卖蔬菜，当地恐怕也不会有付得起钱的人。

尽管如此，如前所述，为城市进行的征购工作正在抓紧实施中。如表5.7所示，为城市提供的粮食数额大大超出留给农民的口粮。在可提供数字的16省中，1959—1960年的粮食征购额高于以往任何年份。

应当牢记的是，粮食占农民全部摄入热量的90%以上。即使忽略掉家禽、家畜所耗费的粮食，只当——没有全部加以调查——真正缺粮食的日子到来时不再喂养它们，事实也会昭然若揭，即在山西、青海、河南、陕西和四川，人们的摄入量肯定低于——通常是大大低于——斯诺的1500卡的“平均水平”。山东省的平均水准实际上掩盖了那些摄入量不足1500卡的地区的存在。其他一些省份也同样留有可供

怀疑的“余地”，实际上各省存在着许多未经申明但却急需粮食的地区。

1959年末，许多农村大概与上面欣顿叙述的那个山西省的故事一样，口粮的减少或是由于在1958年丰收面前懈怠大意，或是由于1959年歉收，或是由于过高征购。但农民们仍然可以保留下一些积累和积蓄用以至少购买一点必需品，或至少向他周围大多数人看齐——尽管有人担心居住在长期缺粮地区的5000万人和在特殊年份（包括1959年）缺粮的4000万人可能不易克服当地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困难。1961年和1962的情况似乎应验了人们的预料，当大旱和大涝相继到来时，什么积蓄都留不下，人们体验到的只是饥荒的肆虐。

的确，到60年代初，中国仍有相当广阔的地区没有感受到危机。河北省的杨仪公社就属于这样的地区。该公社1959年的产量比1958年有大幅度增长。直到1960年春滴雨未下时，才真正感受到危机的来临。于是，各村开始拼命地打井，受灾最重的村甚至打到了300英尺的深度。如果不是一位曾在这里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专区领导设法劝说省里将该地纳入有限的几个用机器打深井的投资项目中去，这个公社的打井计划也许早就泡汤了。县里的头头们在向老牧羊人多方讨教后，就带上地质勘探队去数英里外的山里寻找泉眼了。农民们早已建成过一座水库，只是几乎无水可蓄。因此他们只好奋战20个昼夜，逐棵将庄稼浇上了水。“浇水用的器皿五花八门，从水桶到炒锅应有尽有，甚至连夜壶都用上了”（克鲁克，1966年，第89页）。

表 5.8 中国 1959—1960 年 16 个省份的粮食征购与消费

省份	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 估计 (卡/每天)		
	1959 年征购总额 (百万吨)	除去留种和家 庭饲养后净值	除去留种 后净值
东北			
黑龙江	C. 4. 480	4111	4485
吉林	2. 573	1977	2180
西北			
内蒙古	1. 745	1601	1770
甘肃	1. 269	1552	1871
陕西	1. 246	1179	1304
新疆	0. 962	1751	2486
青海	0. 250	1192	1287
华北			
河南	C. 4. 129	1192	1290
山西	1. 274	936	1035
山东	3. 080	1458	1523
华中			
湖南	3. 685	1904	1994
湖北	2. 813	1864	1930
华东			
安徽	3. 749	1574	1635
江苏	C. 3. 529	1544	1636
西南			
四川	7. 187	1380	1457
华南			
广东	C. 3. 224	1551	1635

资料来源：沃克，1984年，第152页

“C”表示“城市征购额”——译者

到这年初夏，地里的作物似乎终于可以存活了，但很快下起了冰雹砸烂了棉花和玉米幼苗。鉴于再重播玉米已为时

太晚，农民们只好重新将玉米苗逐棵扶起，浇上水并施上肥。正当新苗刚刚萌出时，大雨又不期而至。“刚刚遵照党中央关于办好食堂的指示栽种的蔬菜籽全被大雨冲掉了”（上引书，第91页）。新筑成的大坝也决了口。在急需农业劳动力的高峰时刻重新筑坝的工作占去了好几位干部、130名村民以及附近进修学校180名教师共计4个昼夜的时间。克鲁克夫妇在结束有关这场人与天斗的描述后，接下去说，尽管从劳动力支出的角度看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收获，公社领导还是声称他们保住了去年的产量水平。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也无从证明杨仪公社所公布的产量是否与全国各地一样名不副实。

1960—1961年农村人口可得到的粮食数额降到了最低点。1961—1962年稍有起色。在这两个年度里，农村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被分配给了城市（见表5.7）。直到后来才允许农民多留一点给自己，尽管其时的产量并不算多。仍然缺乏1960—1962年间反映地方粮食产量的数字，不过对几省的大概估计数现已整理出来（沃克，1984年，第159页）。在1961和1962年间，甚至连黑龙江也成为粮食进口省；四川，中国的另一大粮仓，在同期则一直依赖粮食进口。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1961年是严重营养不良和浮肿病的高峰年——至少在南方是如此，直到第二年患病率始终居高不下，对挽畜的屠杀和买卖持续到1962年，尽管在这最后一年里其数量下降要比前两年慢得多。与50年代的平均水平相比，1959年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1/4。到1960年，该比重又下降1/3。从1961年开始，其比重又有缓慢回升。正如我们所见，家畜往往在粮食短缺的初期即成为牺牲品。1959年的渔业产量与作为高峰年的上一年相比增加了近一半，1960年这个产量又增加2/3以上。1961—

1962年间，渔业产量又恢复到1959年的水平。这表明试图对粮食替代产品进行的投资在饥荒开始的最初阶段达到了最高值，此后不断的投资贯穿了整个饥荒时期。林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在形式上略有不同。1960年林业生产增长极为迅猛，竟两倍于1956—1957年的水平。但从此以后又回落到饥荒以前的比重。与我们先前给出的饥荒时期造林面积的减少数相比较，可以看出，饥荒初期对木材的大规模商业性开发是用以购买粮食的一条途径。此后，木材的粮—木交换价值大概就下跌了。在下一章里，我们将看看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概况是如何使我们进一步修正和确认我们在本章中已经勾勒出来的那些饥荒肆虐的模型的。

表 5.9 中国 1960—1962 年 12 省份全部人口人均
粮食产量估计

省份	1952—1957 平均每年 (公斤)	1960 (公斤)	1961 (公斤)	1962 (公斤)
中国全国	203	217	227	230
东北				
黑龙江	598	366	335	199
辽宁	282	—	183	—
西北				
青海	276	180	—	—
华北				
河南	257	145	—	—
河北	244	186	—	—
山东	254	161	—	—

续表

省份	1952—1957 平均每年 (公斤)	1960 (公斤)	1961 (公斤)	1962 (公斤)
华中				
湖南	304	—	220	—
华东				
江苏	271	176	214	220
西南				
贵州	260	—	—	209
四川	293	181	192	191
华南				
广西	299		227	
(城市平均)				
广东	306	236	247	265

资料来源：沃克，1984年

第六章 饥荒期的死亡人数

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已有人做过许多估计，但这些估计大相径庭。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估计的基础设想和统计的年代不同，部分原因是他们进行估计时使用的数据不同。例如：科尔（1981年，第89页）估计1958至1961年间有1650万过量死亡；艾尔德（1982年，第277—278页）则认为在1960至1961年共死亡2300万；莫舍（1983年，第264页）估计1960年的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李成瑞（1982年，第29页）认为1960年的死亡人数是1000万。这些早期的分析都是以户籍系统的年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估计的人口总数为根据的。

近年来的分析是把这些数据与1964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作对比，也与“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得出的人口出生率作对比（后者的可靠性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对比的结果发现，在户籍系统中，相当多的出生人口从未报户口。可是，历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人口总数大体和户籍系统的出生和死亡数一致；同时，人口总数又和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增长率相吻合。可以推论，相当数量的死亡人口也没有注销户口。这两种情况很可能是相互联系的，即：当一个婴儿出生而另一个婴儿死亡时，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登记。

正因为这种情况，人们便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计算。科尔（第68—70页）认为在整个饥荒期间，官方的死亡登记完

全呈上升趋势，而在饥荒期的前后，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他的结论是：1958—1963年的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1984年，第833—834页）使用了由金坎农和班尼斯特整理后的人口数字，他认为：如果没有灾害，1953—1957年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那么，在1958—1963年，出生率应达39.7‰，而死亡率应从1958年的17.3‰降到1963年的13.3‰。基于这样的估算，他认为在1958—1963年，有3200万婴儿没有出生，有2800万人过量死亡。他又指出，1962—1963年出生数字恢复，同时，死亡人数也有所减少，不过，这一减少的原因是饥荒造成人口数目减少所致。由此算来，上面的统计数字也应减少，为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他用新的方法重新修正了那个基于不真实的户口登记得出的出生和死亡的估计数字，他得出结论：在1960年，死亡人数为4090万。他也认为这个数字不大可靠（卡罗特，1985年，第119—124页）。

希尔（未注明页码）在饥荒对出生及死亡的影响上做了最充分的研究，他的论文收入艾什顿（1984年，第613—645页）等人的著作。希尔提出：饥荒期间出生率下降会导致死亡率也下降，但科尔的分析却没有算进这一因素。科尔的重新计算基于一个高度完备的死亡登记系统，例如，1960年，死亡人数的注册率占死亡总数的66%，1961年为80%左右，尔后达到90%。然而事实远非如此。1955年，内务部才建立非常重要的户口登记制度，1958年它被转到公安部。那是在大跃进时期，统计系统已开始崩溃，加上饥荒年间的混乱、难民流动等，不可能有那样完备的登记工作。更何况，尽管官方一直努力改善这方面的工作，可是直到80年代，出生和死

亡都不报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

科尔的计算得出这样一个人口统计模式：1958—1959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了约15%，婴儿死亡率上升了60%；1959—1960年，人口出生率又下降了15%，婴儿死亡率略有下降，而成年人，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在1960—1961年，出生率再次下降了20%以上，婴儿死亡率降到饥荒前的水平，而成人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在最后一年，即1961—1962年度，出生率恢复到饥荒前的75%，而婴儿死亡率明显上升，成人死亡率却降到接近正常。从他的模式来看，1959—1960年和1961—1962年，婴儿和成年人的死亡率完全呈相反的发展趋势。这一结果不仅不符合人们通常认定的饥荒模式，而且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数据的有效性，但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的结论站不住脚。希尔估计1958—1962年的死亡总数是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了出生。

班尼斯特（1985年，第241—271页）也用1982年的“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来重新对出生率进行统计。她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上，而不着重考虑饥荒年的特殊情况。她用出生率和人口增长数来确定两次普查之间的死亡总数，用官方的死亡率趋势来估计死亡率的模式。通过分析两次普查之间生存者的年龄及性别情况得出结论，特定年龄的死亡率模式。这个模式估计了在那特定的11年中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和人口死亡率。

班尼斯特的计算方法的优点是基本上依靠已有数据，而不是对这些数据进行许多未必有益的整理。她的分析还得出一系列较可靠的比率，这些比率说明在发生重大事件期间，人

口情况报告的完整性是波动的。如在大跃进期间，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出生和死亡的注册数下降，这种情况在1960年又一次出现。显然是饥荒的巨大干扰所致。

本章尽可能使用官方的一系列户籍系统数字和人口普查的数字，也使用班尼斯特重新计算的数字。因此，可以对未经整理的资料和根据“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进行比较。

表 6.1 中国官方和班尼斯特估计的中国
1953—1965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份	死亡率 (%)		出生率 (%)		PRC 和 JB 的百分比	
	PRC	JB	RBC	JB	死亡率*	出生率*
1953	14.0	25.0	37.0	42.2	64.3	87.7
1954	13.2	24.2	38.0	43.4	54.6	87.8
1955	12.3	22.3	32.6	43.0	55.2	75.8
1956	11.4	20.1	31.9	39.9	58.7	79.9
1957	10.8	18.1	34.3	43.3	59.7	78.2
1958	12.0	20.7	29.2	37.8	58.0	77.2
1959	14.5	22.1	24.8	28.5	55.8	87.0
1960	25.4	44.6	20.9	26.8	57.0	78.0
1961	14.4	23.0	18.1	22.4	62.6	80.8
1962	10.1	14.0	37.2	41.0	72.1	80.7
1963	10.1	13.8	43.6	49.8	73.2	87.6
1964	11.8	12.5	39.3	40.3	92.8	97.6
1965	9.6	11.6	38.1	39.0	82.8	97.7

注：PRC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数字

JB 代表班尼斯特重新计算的数字

* 代表 $PRC/JB \times 100\%$

资料来源：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的数据和班尼斯特1985年重新计算的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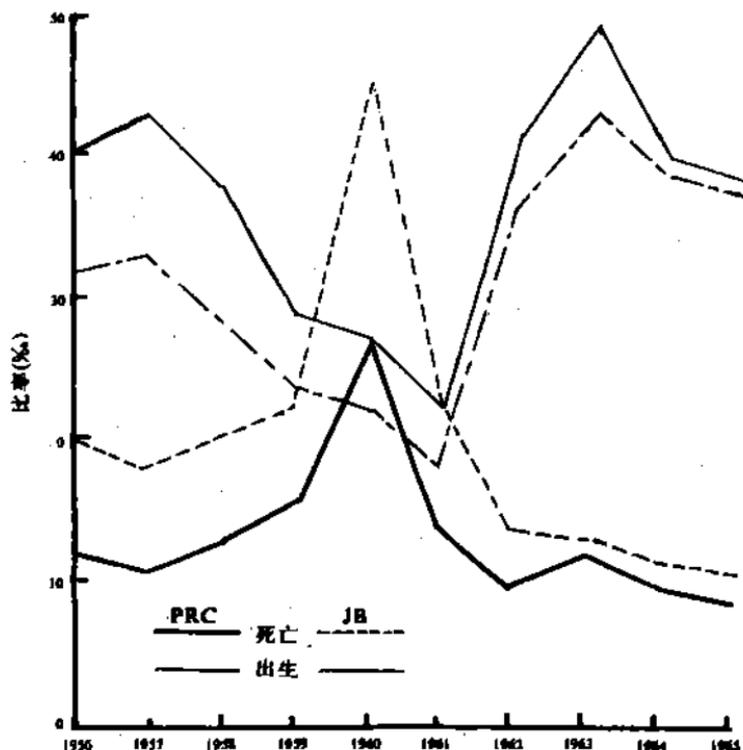


图 6.1 中国 1956—1965 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饥荒中的人口死亡率

饥荒对于人口的影响可以从表 6.1 的出生率中看出来。不论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班尼斯特重新计算的数字均证明：在 50 年代，死亡率持续下降，1958—1960 年间，死亡率突然翻了一番。以后的几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成为负数，中国官方的数字为 -4.6%，班尼斯特的数字为 -17.8%。

对 1961 年的数字的重新计算结果显示：人口增长率为 -0.6%。两组数字均显示，1960—1961 年的人口总数下降了。班尼斯特的结果显示，直到 1962 年底，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恢复。

表 6.2 中国 1953—1965 年的人口总数和增长率

年份	人口总数 (百万)*		增长率 (%)	
	PRC	JB	PRC	JB
1953	588.0	584.2	23.0	16.5
1954	602.7	594.7	24.8	19.2
1955	614.2	606.5	20.3	20.7
1956	628.3	618.1	20.5	19.8
1957	646.5	533.2	23.2	25.1
1958	669.9	646.7	17.2	17.1
1959	672.1	654.3	10.1	6.5
1960	662.1	650.7	-4.6	-17.8
1961	658.6	644.8	3.8	-0.6
1962	673.0	553.3	27.1	27.0
1963	691.7	674.2	33.5	35.9
1964	705.0	696.1	27.8	27.8
1965	725.4	715.5	28.5	27.4

注：* 年底的人口数目

资料来源：1962 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数字和班尼斯特 1985 年的数字

根据人口总数及出生率，并把 1956—1958 年和 1962—1964 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估计”死亡人数的参照物，可以估计出饥荒年间的过量死亡数目。

表 6.3 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年份	人口总数 (单位: 千)		死亡人口 (单位: 千)	
		实际*	估计†	差额
PRC				
1959	686005	9657	7326	2361
1960	667070	16944	7336	9608
1961	660350	9509	7284	2246
				14182
JB				
1958	654300	14460	10816	3644
1960	650700	28022	10756	18266
1961	644900	14830	10559	4171
				26081

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生登记和班尼斯特 1982 年重新计算的结果
†基于 1956—1958 年和 1962—1964 年的平均死亡率

资料来源: 1982 年官方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和班尼斯特 1985 年的数字

在饥荒年间, 年老和体弱者最容易死亡。因此, 饥荒年一过, 死亡率会比平常下降, 那些年的平均死亡数将比“估计”死亡数低, 这会使实际死亡数和估计死亡数的差距加大。由于在饥荒年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 故与分娩及婴儿相关的实际死亡数也比正常情况降低, 结果是在此期间的估计死亡总数也相应降低,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估计的过量死亡数。另一方面, 似乎在灾年之后, 死亡的注册工作有所改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可能有些夸大, 因为它来自一个因增加注册而夸大的死亡率。这一过高估计

“正常”死亡人口的弊病反过来又减少了先前过高估计的由饥荒造成的人口超常死亡数。根据官方数字，1959—1961年估计有1400万的过量死亡，占总人口的2%，这个数字很小。

经班尼斯特重新计算后估计的过量死亡数为2600万，几乎是官方数字的两倍。这种估计也有夸大的倾向，因为她使用了包括灾年后的平均数，而没有考虑饥荒年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再有，当不注册死亡的情况被纠正之后，就不应使用这个改进的注册系统来计算了。这个与科尔（1984年）和卡罗特（1984年）的结果很接近的估计表明：尽管各人的设想和计算方法略有不同，但过量死亡数的计算体系是有一定道理的。也可以说，估算饥荒对人口死亡的影响的上限是可能的。

饥荒对城乡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农村人口的死亡数比城市多，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生活水平低，二是城市储备粮的分配比农村稍宽松或有粮食进口。尽管如此，城市人口在饥荒年间的死亡率也翻了一倍。另外，城市死亡率的明显上升要比农村早些，这说明在饥荒早期，城市较农村要遭受更多的不幸。

饥荒中不同年龄的死亡人数

饥荒对年长者和年幼者危险性最大，中国的饥荒情况也是如此。王维志的表格说明了1957、1963、1975、1978年特定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化以及1981年45岁到81岁的人口死亡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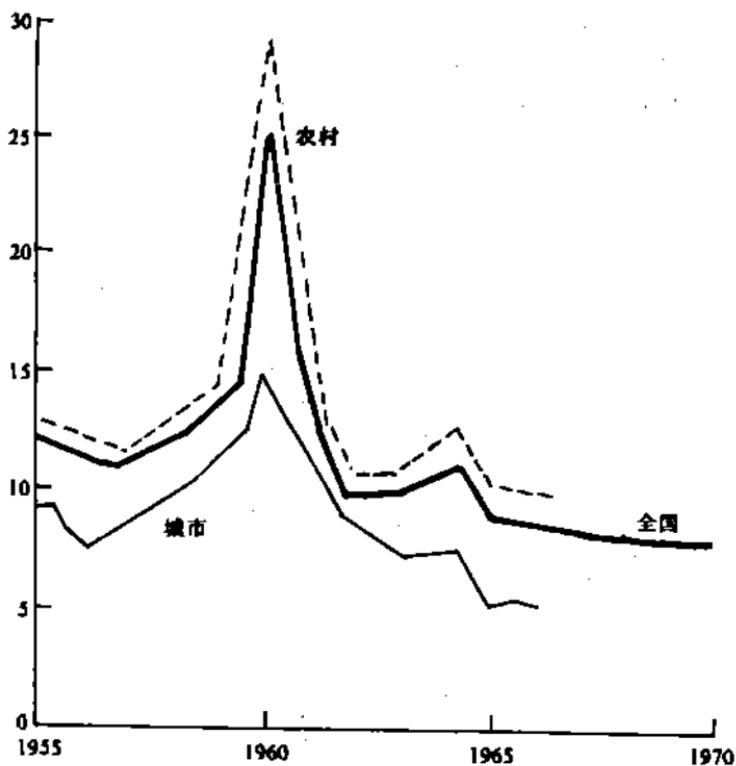


图 6.2 中国 1955—1965 年全国及城乡人口死亡率

资料来源：王维志，1984 年

蒋正华等人于 1981 年统计的节略人口死亡率可以用于估计有关年代的特定年龄段的人口死亡率。

表 6.4 从中国 1981 年统计数字中整理出的
特定年龄段的死亡率的百分比变化

变化的百分比				
年龄段	1967	1963	1975	1978
45	-46.85	-26.23	-5.81	-12.90
55	-23.21	-1.81	-18.33	-11.52
65	-11.46	+59.45	-18.23	-15.14
75	+10.51	+137.52	-14.89	+2.00
85	+18.38	+213.87	-16.85	+6.19

资料来源：王维志，1984 年

表 6.5 估计的中国 1957—1978 年的特定年龄段的死亡率

年龄	1957	1963	1975	1978	1981
45	7	6	5	5	4.8
55	15	13	15	14	12.4
65	36	13	39	38	32.8
75	73	31	94	80	82.0
85	152	87	218	177	188.3

注：* 根据蒋正华等人 1984 年绘制的节略人口死亡率表和表 6.4 而制作

尽管 60 年代以来人口总死亡率明显下降，但如表 6.4 所示，1981 年，55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比 1963 年下降了近 2%；1981 年 65、75、85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均高于 1963 年。其中 65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是 1963 年的 60%；75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则是 1963 年的 1.4 倍；而 85 岁年龄段的死亡率则是 1963 年的两倍。

王维志用“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老年人的死亡率在

1963年明显下降的现象。1963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3年饥荒期间，很多体弱的老年人死了，这使得在灾年后老年人的死亡率下降。而且，1963年老年人的死亡率如此之低也说明：行政机构的工作恢复得很慢，又出现了老年人死亡之后不注销户口的情况。

通过对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的研究，可以估计饥荒对年幼者的影响。1964年3—5岁年龄段为饥荒期（1959—1961年）出生的幸存者；6—8岁年龄段为饥荒前（1956—1958年）出生的幸存者，由于在饥荒中，儿童死亡率不合比例地高，这两个年龄段的儿童数量比“正常”情况下预计的数量要少。1964年，0—2岁年龄段代表1962—1964年出生的幸存者，这包括在灾年后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故可能比预计的数字大。从1964年人口普查时0—2岁和6—8岁人口的平均数，可粗略得出1959—1961年出生的人的估计数字，而实际数字和估计数字的差额就反映出饥荒期孩子出生减少和超常死亡数的情况。

鉴于在正常情况下，3—5岁，6—8岁年龄段人口数应是比率相同，饥荒期出生人口的减少和婴儿死亡数的增多便会明显地降低3—5/0—2年龄段的比率，而增大6—8/3—5年龄段的比率。

从班尼斯特对婴儿死亡率的计算中，可以发现婴儿死亡率使受饥荒影响的各年龄段的数目减少。两次普查之间的人口性别比率说明：婴儿死亡率在1958年之前持续下降，之后略有上升，1959年进一步上升，1960年大幅度上升。1961年婴儿死亡率开始下降，再以后是大幅度的下降。

表 6.6 中国 1964 年 0—2、3—5 和 6—8 岁年龄段的情况

1964 年的年龄段	人口总数 (单位: 千)		比率	
	实际	预计	实际*	预计**
0—2	74301.2	74301.2	—	—
3—5	40724.2	66545.9	0.548	0.896
6—8	58790.7	58790.7	1.444	0.883

注: *3—5 岁人口总数/0—2 岁人口总数

**6—8 岁人口总数/3—5 岁人口总数

资料来源: 人口普查办公室, 1983 年

遗憾的是, 没有 1 岁以内婴儿死亡率增长的资料。人们只能设想: 由于母亲在孕期营养不良, 使初生婴儿或因体重太轻而无力吮奶, 或因母亲无奶而在出生几天后夭折, 断奶期的孩子则因断奶后无足够的替代食品或食品过于粗糙、难以消化而丧生。

表 6.7 1953—1982 年中国婴儿死亡率

年份	婴儿死亡率 (每千出生婴儿)	年份	婴儿死亡率 (每千出生婴儿)
1953	175	1960	284
1954	164	1961	183
1955	154	1962	89
1956	143	1963	87
1957	132	1964	86
1958	146	1965	84
1959	160		

资料来源: 威尼斯特, 1985 年

饥荒对各省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某些省的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那场遍及全国的饥荒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在1961年说：山东、河南和甘肃三省的情况是严重的。他把情况严重的原因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政治骚乱，一是食品危机（伯恩斯坦，1984年，第344页）。将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与各省人口增长率进行比较，可以推测出安徽、贵州、四川、甘肃四省饥荒时期的“大量死亡人数对人口增长的影响一定是相当大的”（袁进，1985年，第120页）。同时，山东和河南人口增长比率之低表明两省在饥荒年间有大量人口迁移到东北地区；当然，人口的低增长率也显示了这两个地区人口死亡率的超常情况。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知全国各地逐年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迁移的情况，也就不能清楚地把握饥荒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表 6.8 中国 1953—1964 年及 1964—1982 年各省人口增长情况

省份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 (%)	
	1953—1964	1964—1982
东北		
黑龙江	7.24	2.33
吉林	5.32	1.45
辽宁	3.96	1.17
华北		
河北	1.29	1.08
山西	2.48	2.16
北京	5.90	1.22
天津	3.21	1.35

续表

省份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	
	1953—1954	1964—1962
山东	0.96	1.89
河南	1.33	2.67
华东		
安徽	0.17	3.28
江苏	1.46	2.00
上海	2.07	0.55
浙江	2.16	2.07
华中		
湖北	1.94	2.32
湖南	1.08	2.52
江西	2.33	3.19
华南		
福建	2.50	3.02
广东	2.10	2.14
广西	0.59	2.14
西南		
贵州	1.27	3.70
四川	0.32	2.50
云南	3.79	3.26
西藏	-0.15	2.84
西北		
内蒙古	5.79	3.06
陕西	2.80	2.17

续表

省份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 (%)	
	1953—1964	1984—1982
宁夏	2.88	4.48
甘肃	1.09	3.04
青海	2.49	4.57
新疆	4.48	4.44
全国	1.76	2.33

资料来源：袁进，1985年

从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我们得知河北、河南、浙江三省人口年龄和性别的构成情况。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有众所周知的饥荒重灾区——安徽的1964年分类表，这一材料也可用于了解饥荒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河北、河南、浙江、安徽历来是经常发生旱灾和水灾的地区。根据1955—1957年各地人均粮食产量而划定的诸省类别中，河北的人均产量是197公斤，为四个省中较低的一个；浙江的人均产量是307公斤，处于“温饱型”省份的顶端；安徽省的人均产量是341公斤，刚刚勉强进入“粮食富裕”省的行列；没有河南省的资料（沃克，1981年，第233页）。相比之下，河北、浙江、安徽在1978—1980年均属粮食富裕省份。

河北、河南、浙江、安徽四省的人口死亡率和全国人口死亡率不同。1973—1975年全国24个省人口死亡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全国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而河北男性在那时的平均寿命为67.1岁，浙江为66.4岁，河南为65.1岁，安徽为64.5岁，均高于当时全国男性的平均寿命（龙·肖尔德等，1981年，第54页）。以前也曾用这一方法估计饥荒对人

口死亡率的影响。受饥荒影响的年龄段的人数缺额不仅可说明各省的饥荒程度，也可反映各省的人口死亡率。

与全国数字相比，安徽省饥荒时期出生人口的实际数目与估计数目有明显的差距。在1964年时，安徽1959—1961的实际出生人口略少于估计数目的1/3。

表 8.9 1964年安徽省0—2、3—5、6—8岁年龄段的人口数

1964年时的年龄	人口数(单位:千)		比率	
	实际	估计	实际	估计
0—2	3756.0	3756.9		
3—5	943.8	3039.4	0.251	0.809
6—8	2321.0	2321.9	2.480	0.764

资料来源：1964年安徽省的人口普查数据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比较河北、河南、浙江的情况。1982年，生于饥荒前的年龄段为24—26岁，生于饥荒期的年龄组为21—23岁，生于饥荒后的年龄段为18—20岁。在这三个省份中，这三个年龄段的“正常死亡率”，即排除饥荒影响的情况下的死亡率应基本一致。因此，虽然在1982年这三个年龄段的人数较少，但从1956—1958年、1962—1964年出生人口的幸存者的平均人数中应显示饥荒年间出生人口中幸存者的估计数。

1982年，各时期出生的各年龄段的人口数字不仅要包括幸存者，也要包括那几年迁出或迁入的移民。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可靠的资料来说明移民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后面做结论时应特别谨慎。还有一个情况也要注意：在人口普查时，军队和地方的统计是分别进行的，各省的年龄和性别分类统计表均不包括现役军人。因此，我们谈到的年龄段人数不包括

那些 1982 年时是 20 岁的青年军人。

将河北、河南、浙江受饥荒影响的年龄段分别与全国情况比较（见表 6.10），我们发现对河北、浙江的估计与全国

表 6.10 1982 年中国及部分省份
18—20、21—23 和 24—26 岁年龄段情况

1982 年时的年龄	人口总数（单位：千）		比率	
	实际	估计	实际	估计
全国+				
18—20	88080	88080		
21—23*	39270	82170	0.577	0.913
24—26	56250	56260	1.433	0.904
河北				
18—20	3420.5	3420.5		
21—23*	2356.5	3349.1	0.889	0.797
24—26	2418.5 注	2418.5	1.721	0.867
河南				
18—20	5166.5	5186.5		
21—23*	2272.7	4514.6	0.444	0.882
24—26	3912.7	3912.7	1.721	0.887
浙江				
18—20	2798.6	2798.5		
21—23*	1792.1	2807.5	0.841	0.932
24—26	2418.5	2418.5	1.370	0.928

注释：+中国以 10% 抽样调查数字分析为基础的数字

*1959—1961 年出生的幸存者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1983 年（河北 24—26 岁人口数为 3277 千人，与原文差距较大——译者）

在饥荒期的情况十分接近。与全国情况相比，河北、浙江的 21—23、18—20 岁的实际人口和估计人口更为一致。这是由

于在 1982 年，河北、浙江两省 20 岁的人口数明显少于 18、19 岁的人口数。可以推论，和全国相比，这两个省在饥荒后的恢复期比较长。河南 21—23 岁的人口比率是 3 个省中最低的，这显然也是因饥荒所致。

我们把四川省什邡县南泉公社 1981 年的人口调查资料（拉夫利，1984 年，第 367—368 页）与河南省 1982 年的人口调查资料做一比较（因这些资料没有人口年龄分类，故不能象以前那样来计算）。以 1981 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为基础的南泉公社人口状况呈金字塔状，从中可以看出，该公社 19—23 岁的人口大大少于河南。

南泉公社人口年龄的结构显示：饥荒第二年，人口减少情况最严重。河南省在饥荒第三年人口减少最多。南泉人口金字塔还表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男性人数极少。但作者未对这一现象加以说明。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饥荒造成的各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差异因缺乏人口迁移的资料而显得不甚清晰，因此，本文的结论仅供参考。

饥荒对少数民族人口死亡率的影响

资料证明：饥荒中不同民族人口死亡率的差异是极小的。从 1953 年到 1964 年人口普查之前，少数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1%，而汉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则为 15.9%。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少数民族的卫生和居住条件极为落后，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举例来说，直到 1984 年，青海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州和县的婴儿死亡率还在 100% 以上（《北京周报》第 28 卷，第 33 期，1985 年，第 9 页）。一位中国人口统计学家指出：造成少数民族人口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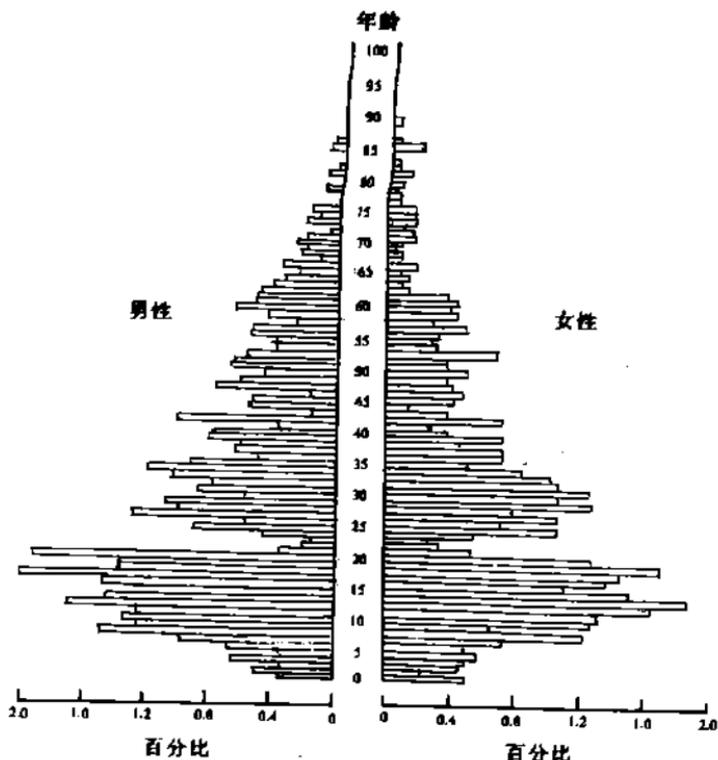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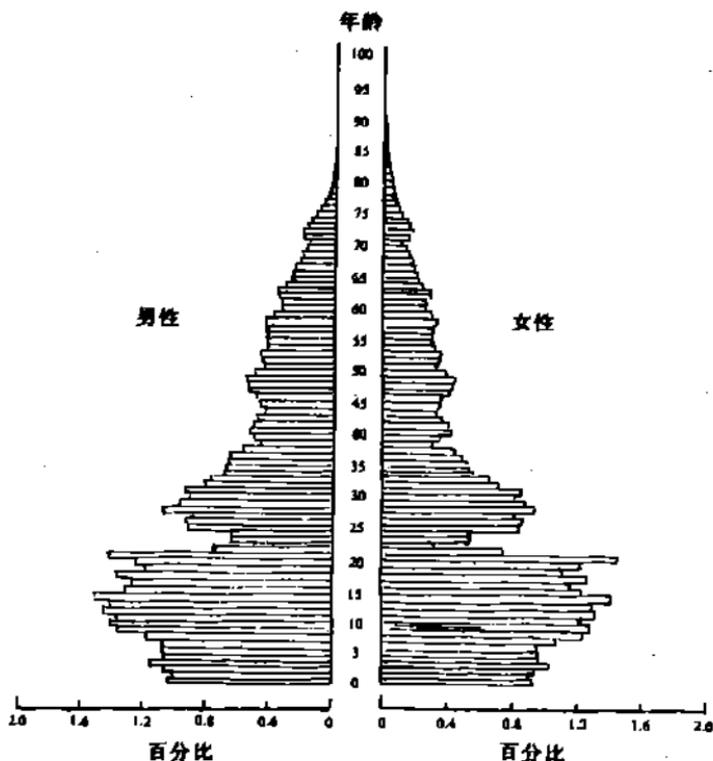


图 6.3 南泉公社 1981 年人口年龄金字塔

亡率和低出生率的原因之一是“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刘铮，1985 年，第 9 页）。以前的章节中提到，中国西南部西双版纳自治州的许多少数民族是以易物方式换取粮食来维持生活的，在饥荒时期他们的粮食来源便成了问题。在各种调查中发现，有人数不等的少数民族自称是汉族人，这一情况在 1964 年特别流行（皮尔斯伯里，1981 年，第 35—38 页；刘铮，1985 年，第 3 页）。这种情况使得对少数民族



河南省 1982 年人口年龄金字塔

群体人口增长率的考察变得更为复杂了。

饥荒中不同性别的人口死亡率

关于出生婴儿性别和儿童性别比率的调查可以说明性别人口死亡率的差异。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全部人口的出生性别比率是十分稳定的，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 105~107 : 100。由于男性幼儿死亡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一年龄

段的人口性别比率逐渐下降。在一些地区，女性在食品分配和卫生保健方面常常受歧视，造成女性死亡人数增加，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这种情况也发生在重男轻女的地区。由于重男轻女，当女婴出生时，人们常常不去报户口；在人口普查中，也常常不登记女孩。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中国也是如此。在中国国家统计局李成瑞的讲话中，涉及1982年人口普查和历次普查以及各种调查的可靠性时指出：看来出生人口数字的统计比生存人口数字的调查更困难。与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例相比，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可靠性较差。（李成瑞，1985年第434页）

表 6.11 中国 1959—1964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率(女=100)

出生年	1964 年普查的性别比率
1963—64	103.8
1962—63	105.3
1961—62	106.4
1960—61	107.0
1959—60	108.7

资料来源：约翰森，1984年

1964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64年，1周岁以下婴儿的男女比率为103.8。自1963年至1964年出生的年龄段性别比向后推至1959年至1960年出生的年龄段，男女比率不断提高。在正常情况下，人口性别比率略高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刚生下来的几年中男孩的死亡数较女孩多。根据这一规律，1964年人口普查的性别比率表明，饥荒造成了女孩子的过量死亡。但是，1982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中的同一年龄段人口性别比率并不一致。根据1982年人口性别比率的调

查，1959—1964年出生的女孩数大于1964年的调查结果。1964—1982年女性人口减少的总数尚不到男性人口减少总数的一半（女性减少4.8%，男性减少9.3%）（见表6.12）。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在1964年人口普查时，相当数量的儿童没有参加登记，而女性最有可性被排除在外。当然，在考察1982年人口普查的人口群性别比率结果时，我们也应考虑那些未记录的年青现役军人。表6.12表明：人口普查中有谎报年龄的现象，这些因素使得分析工作更为困难。

表 6.12 中国 1959—1964 年出生的年龄段的性别
（根据 1964 及 1982 年中国人口普查的资料）

出生年	男性 1984年的人数 (单位：千)	1982年的 生存人口 百分比	女生 1984年的人数 (单位：千)	1982年的 生存人口 百分比
1963—64	14610	87.6	13874	88.7
1962—63	15515	88.0	14733	93.2
1961—62	8026	95.8	7544	104.8
1960—62	5981	89.1	5674	96.2
1959—60	7450	98.3	6855	101.6
1958—64	51462	90.7	48680	95.2

资料来源：约翰森，1984年

1980年制订的婚姻法可用来说明饥荒期的性别死亡率。这个婚姻法于1981年开始实施，它规定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为20周岁。新婚姻法的实施直接影响了1982年的人口普查。一部分女孩担心她们自己的年龄在新婚姻法实施时被误认为已经到了20岁，而另一部分女孩则因想在1982年结婚而急

于成为 20 岁 (李成瑞, 1985 年, 第 438 页)。综合所有的因素来看, 尽管 1964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过高地估计了女性的死亡率, 但饥荒期少年儿童中女性死亡率仍超出了正常水平。

根据 1964 年人口普查结果, 我们发现少年中女性在饥荒期的死亡率过高。1964 年, 出生于 1945—1953 年的女性减少了 10.8%, 而同期出生的男性仅减少 8.7%。遗憾的是, 我们无法估计饥荒期女性过量死亡的比率, 无法与那一时期的其它年份比较。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有三个省的年度人口性别数字, 生于饥荒期前后的人口性别比率应与 1982 年的年轻成人的情况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从 1982 年的人数中, 可以了解饥荒期出生人口自出生到 1982 年普查之前不同的人口死亡率, 死亡率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过去的人口迁移也影响了饥荒期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 且人口迁移对这些年龄段的人群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如若排除这些因素, 就难以对受饥荒影响的人口性别的不同死亡率做出结论。

表 6.13 安徽 1952—1964 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率
(根据 1964 年人口普查结果) (女=100)

年龄段	性别比率	年龄段	性别比率
1963—64	105.4	1967—68	120.8
1962—63	105.5	1956—57	118.8
1961—62	107.6	1955—56	116.4
1960—61	107.8	1954—55	115.5
1959—60	116.3	1953—54	111.5
1968—69	120.7	1952—53	110.7

资料来源: 1964 年安徽人口普查数据

我们有 1964 年普查时安徽省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率资料，这次人口普查和饥荒年的情况十分接近，与全国的数字相比，安徽的人口性别比率一直非常高。尽管 50 年代全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但安徽省 1955—1960 年出生的女孩人数在 1964 年大幅度地减少。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那些 5 岁以下，已经断奶的女孩在饥荒期特别难以生存。韩素音的一位海外华人朋友曾说：在饥荒期安徽“农民回到了旧社会，女婴被杀死……”（韩素音，1980 年，第 293 页）。

结论

从这里列举的材料看，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 1960 年达到了顶峰。1960 年后，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这种下降可以用邦加茨和凯恩提出的模式（已在第二章讨论过）来解释。根据这一模式，饥荒之后一段时间内，额外的死亡会继续影响已减少的人口。1958 年婴儿死亡率开始上升，这也许是由于这一年初出生的婴儿断奶所致，因为在当时，某些地区的食品开始短缺。婴儿死亡率普遍上升是由于城市婴儿死亡率同农村地区一样也在上升。女孩死亡率超过正常水平，甚至出现杀婴现象。

在饥荒中，老人和孩子是最不幸的受害者。因为在城市，是根据人的生产能力和不同工种的不同体力消耗来配给不同数量的粮食；在农村也是一样，尽管食不饱腹的家庭可获得借贷或捐赠，但生产大队的各种粮食基本是按人们的工分分配的。像其它饥荒文献中显示的一样，家庭中任何可吃的食物首先分给青壮年，因为他们是维持家庭人口生存的主要劳动力。

资料证明：我们在以前章节中提到的那些粮食严重短缺

的省份，人口死亡率较高，少数民族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七章 求存机制

人口机制

挨饿的中国人用以缓解饥荒冲击的人口机制，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以往饥荒中盛行的大略相同，与第二章讨论的其他饥荒笼罩时的情形也相类似。饥荒对婚姻和生育产生的影响，每千名育龄妇女生育率的统计调查提供了大量例证。

婚姻

饥荒初期，婚姻似乎都被延搁了。15—49岁育龄妇女中初婚者占有一定比例，1957—1960年间其数目大为降低（赵旋，1983年，第103页），这在城乡都是如此（卡罗特，1984年，第1053—1054页）。实际上，与乡村相比，城镇初婚妇女人数减少的情况发生得更早，持续得更久。

即使在二三十年代，雇佣于工厂或就业于其他企事业的城镇妇女，往往推迟婚期多年（凯恩，1985年）。将饥荒时期粮食差异配给制度视为一种制约因素，这种假设看来是有道理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根据这种配给制度，不工作的妇女只能得到最低的粮食定量。饥荒过后以及后来的十年（文革大动乱时期除外），城镇初婚妇女人数仍相对较少，由此可见政府提倡晚婚的影响。然而，不管怎样，晚婚趋势恰是由大饥荒发端的。

1961年乡村结婚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1962年又有相

当高的增长。1957—1958年，因妇女不断卷入劳动力大军，又因大跃进期间强调粮食产量，一些人的婚姻因而推迟。但其后两年，则应归因于饥荒的阻抑。在物质匮乏的年月，造成婚姻推迟的原因通常是无力筹措嫁妆和操办费用；男方家庭不愿多添一张吃饭的嘴，也是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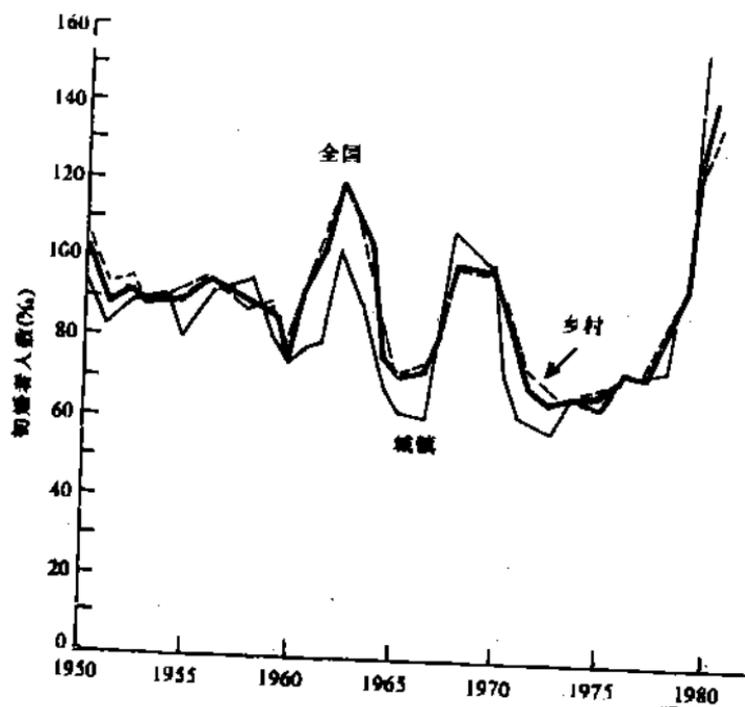


图 7.1 中国 1950—1958 年每千名妇女中初婚者人数

资料来源：卡罗特，1984 年

南泉公社 1960 年妇女婚龄高峰值为 21 岁，其后直至文革再未达到这一高峰（拉夫利，1984 年，第 373 页）。年度统计难免会出现很大波动，但与 1958 年和 1959 年相比，初婚年龄陡增两岁之多，这是自 1935 年出现的最大一次飞跃。拉夫利认为，1940—1944 年出生的育龄妇女年龄段，按常情本该在饥荒期间成婚，对于她们成婚年龄增长不能完全归因于饥荒，因为其后继年龄段的初婚年龄仍居高不下。但不管怎样，饥荒至少开始了晚婚的进程，尔后则被制度化了（拉夫利，1984 年，第 376 页）。1962 年，标志饥荒结束的信号是那些推迟婚姻的人纷纷结为伉俪，新婚人数失衡（拉夫利，1984 年，第 380 页）。

类似这样引发晚婚过程的现象亦见于安徽淮北平原，对此有人曾做过详尽的出生率统计分析（杨泉河，1985 年）。淮北平原属洪泛区，出产多种谷物。1938—1942 年出生的妇女到 1959 年已是 17—21 岁。其中 17 岁结婚的占这一年龄段总数的 13%，而先前各年龄段中大致占 1/5。19 岁结婚的占 40%，先前各年龄段中则超过半数以上。不过，到 25 岁，已婚比例达 99% 以上，与传统的情况相同（同上，第 51 页）。

单身也好，嫁人也好，饥荒对妇女施加的压力更是不堪承受，家庭内部分配食物，女人总是排在最后。开弦弓村 1981 年接受调查的 35 名离婚男性，其中 23 人是在饥荒期间失去妻子的，因为妻子“外出讨饭去了”（费孝通，1983 年，第 251 页）。

生育

纵使婚姻未曾推迟，资料表明，生育头胎的母亲的年龄无疑是增长了，尽管难以区分大龄生育头胎是由于晚育还是

由于晚婚。全国范围新婚与头胎生育平均时间间隔的统计数字，仅可得到1957、1970和1977这几年的（冉云刚和谢秋宾（音），1983年，第67页）。

图7.2呈现出1957年与1970年两种生育模式之间的演变，平均婚龄有所提高，结果导致与早婚而迟育的传统习俗相脱离。不过，1957年成婚而等到4年以上才生第一胎的妇女占有很高的比例，这表明饥荒至少有增加晚育率的作用。这种观点得到某些佐证，至少对农村来说是这样。卡罗特曾对育龄进行核查（卡罗特，1984年，第1050页），其研究表明1958—1960年间，育龄略有上升。1961—1963年间，不论城镇还是乡村，平均育龄明显下降，这也许是新婚与头胎生育间隔缩短的反映，这一间隔留待下面讨论（城镇妇女育龄持续趋前，与采用避孕措施和缩小家庭规模有关）。

安徽淮北平原妇女按年龄分组的平均婚龄与头胎育龄的图表，同样表明1982年统计调查时年龄为40—44岁的妇女，不论与先前的还是继后的育龄段相比，其结婚到生育的间隔都算是较长的（杨泉河，1985年，第57页）。

1959—1961年的出生率，进一步证明了饥荒期间生育推迟的判断。如同对待死亡率那样，我们一方面可以核查以十分重要的户口登记为基础的官方统计数字，另一方面还可以核查班尼斯特从生育抽样调查中计算出的死亡率。不论选择哪种方法，结果都是近似的，只不过，生育抽样调查须对妇女进行详尽的盘问，有时还需询问其家人和邻居，以求得到双重确认，由此得出的出生比例可能大大高于户口登记的数目。如前所述，50年代出生登记很不完善（参见表6.1）。登记峰值出现于1959年，也许早期的食物短缺促使人们进行出生登记并凭人口多少申报粮食定量。1960年登记出现滑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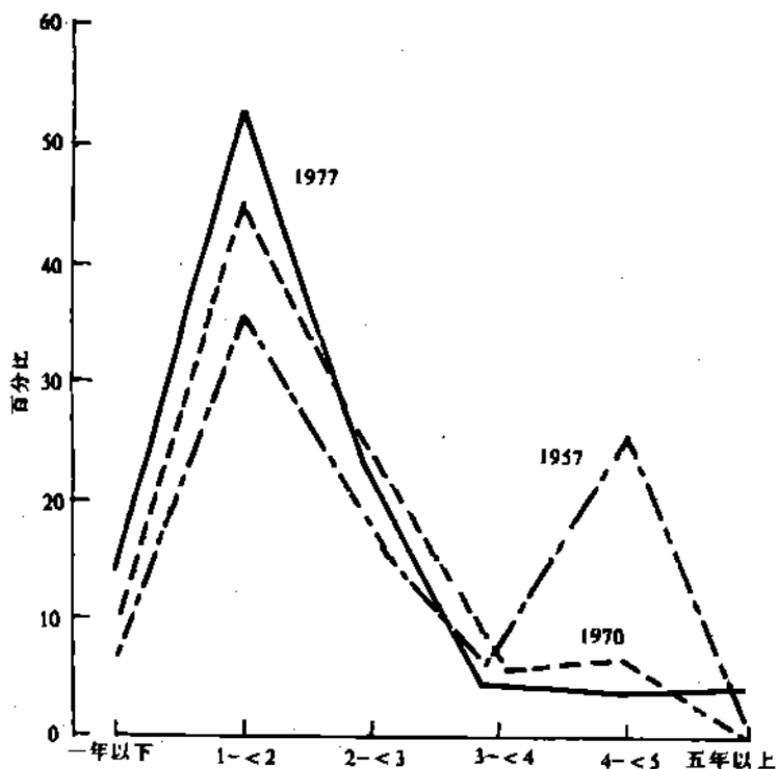


图 7.2 中国 1957、1970、1977 年成婚与头胎生育时间间隔

资料来源：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 年

与此同时，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达到最高水平，过后情况稳步趋于好转。

以上两种方法得出的出生率都显示出 50 年代初期生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般战后恢复时期常见这种高增长现象。1959 年，出生率出现戏剧性的跌宕，到 1961 年生育水平仅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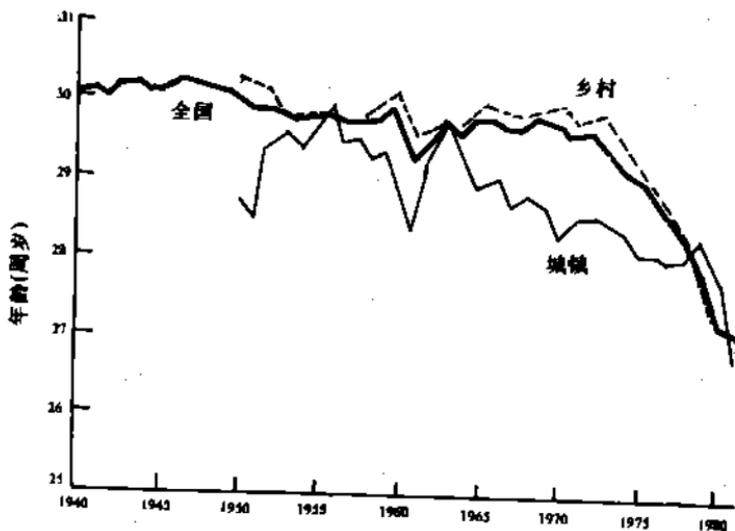


图 7.3 中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及城乡差别

资料来源：卡罗特，1984年

当于1954年的一半。若以此作为显示饥荒严重程度的标志，那么中国大饥荒将介于1974年孟加拉大饥荒和1944—1945年荷兰大饥荒之间。孟加拉重灾区马特拉布，出生率下降三分之一。荷兰饥荒期间，出生率下降超过半数。与之相反，列宁格勒大饥荒期间，出生率减少几乎为零（邦加茨与凯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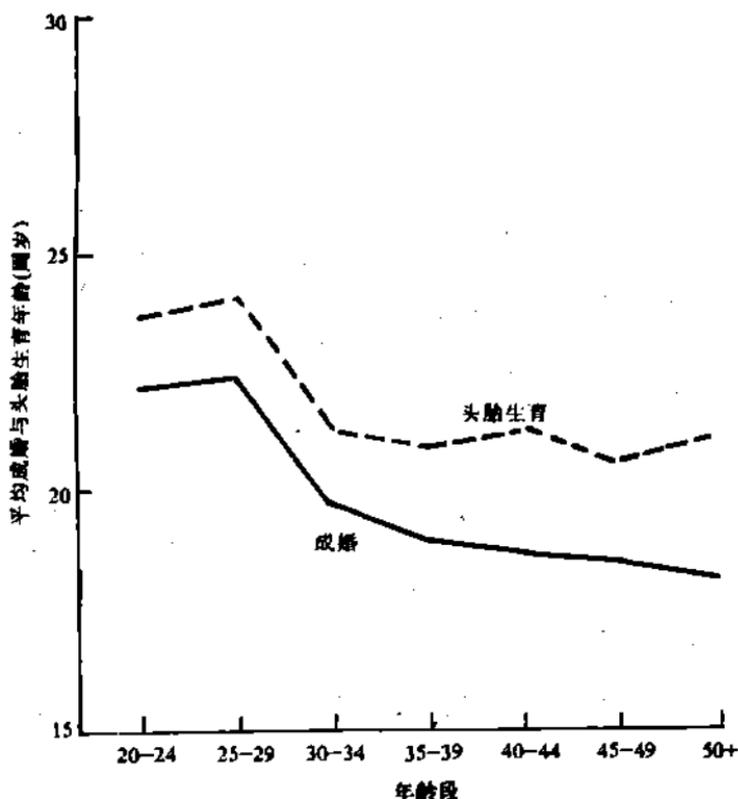


图 7.4 安徽淮北平原妇女各年龄段平均成婚与头胎生育年龄

资料来源：杨泉河，1985年

1982年，第48页)。

若将1956—1958年的平均出生率视为“正常值”，那么对1959—1961年的期待数值便可做出估测(1961年后的出生率可作为解除饥荒对婚姻的制约后出现的膨胀，故此不作亏额加以计算)。

表 7.1 中国 1953—1965 年的出生率

年份	出生率 (每千名妇女)	
	PRC	JB
1953	37	42.2
1954	38.4	43.4
1955	32.8	43.0
1956	31.9	39.9
1957	34.3	43.3
1958	29.2	37.8
1959	24.6	28.5
1960	20.9	26.8
1961	18.1	22.4
1962	37.2	41.0
1963	43.5	48.8
1964	39.3	40.3
1965	38.1	38.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2年；班尼斯特根据抽样调查统计的数字，1985年

估测结果亏缺出生人数 3400 万，也许是过高了。特别是，假若生育调查未能使被调查妇女吐露实情，就会遗漏在困难时期生育和婴幼儿夭折后再生育的情况。显然，调查的确遗漏了大量从未进行出生登记的出生人数。鉴于此，必须假设在调查统计数字基础上的估测要比在官方出生率统计数字基础上的估测更接近事实。卡罗特（1984 年）和希尔（艾什顿等，1984 年）所做的估测，因方法稍异，结果也是大同小异。

若非生产队保证人均分得一份口粮，出生率恐怕还会进

一步下降。1961年，四川农村流行的歌谣中唱道：“养个小肉墩儿，赛过挣工分儿”（韩素音，1980年，第303页）。所谓小肉墩儿指的是婴儿，婴儿自出世之日便可获得整整一份口粮。但这种办法，唯有在粮食充裕、定量可以保证供给的地区才能奏效，南泉公社并未实行过。

表 7.2 1959—1961年中国饥荒对生育的影响

年份	年中人口 (千人)	实际*	出生人口 (千人)	
			估计†	亏额
PRC				
1959	666005	16517	21179	4662
1960	667070	13042	21213	7271
1961	660350	11952	20998	9047
		42411	63390	20980
JH				
1959	651300	19902	28566	9264
1960	650700	17439	28410	10791
1961	644800	14444	28151	19707
		51185	85127	33842

说明：* 根据中国出生登记和班尼斯特的生育史调查

† 根据 1958~1958 年的平均生育率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1982年；班尼斯特根据抽样调查统计的数字

什邡县位处四川成都平原，土地肥沃，灌溉充足，盛产水稻、小麦、油菜籽和烟草。当地 1940—1944 年龄段生育头胎的母亲平均年龄达 22.2 岁，而 1930—1934 年龄段和 1935—1939 年龄段分别为 20.9 岁和 20.6 岁。尽管如此，从结婚

到生育的间隔皆为两年，村里人不觉得有何异祥（拉夫利，1984年，第377—378页）。由此看来，在南泉，饥荒推迟婚姻的作用比淮北平原要大得多，但就头胎生育时间而言，并无相应差异。

头胎与第二胎，第二胎与第三胎之间的间隔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先前和后继的年龄段相比，生育间隔大大缩短，意味着头胎或第二胎不幸夭折，因而缺乏在哺乳期避孕的防范。在南泉，1948—1957年新生儿死亡率在150%左右，饥荒期间则在220%和400%上下浮动（拉夫利，1984年，第370页）。南泉1957年的新生儿死亡率远高于全国58%的平均死亡率（刘铮，1985年，第7页）。官方数字因基于不完善的新生儿死亡登记，估算上可能偏低。这且不管它，总之南泉婴幼儿死亡率仍在全国的平均线之上。纵使新生儿存活下来，母亲仍有可能因营养严重不足而无法哺育，为再孕提供可乘之机。饥荒期间，人工避孕方法尚未传播到南泉。1961年，曾用过避孕工具的已婚妇女不足百分之一，且不论当年还是第二年，用之不懈的无一例（拉夫利，1984年，第372—374页）。尽管缺少避孕手段，1959—1961年间每名妇女生育率只有2.31，而1962—1964恢复时期，每名妇女生育率猛增到7.43，这既是新婚延迟的后果，同时也是针对前几年减少生育而进行人口增殖补偿的结果（拉夫利，1984年，第379页）。

杰勒德·卡罗特根据生育调查资料用图表说明了生育率在所有各年龄段妇女中均呈减少的情况（卡罗特，1984年，第1048页）。每年龄段的总生育率在饥荒笼罩的年月里均呈明显的降势，甚至1918—1919年龄段当时都已40挂零了，生育也明显下降。受冲击最大的要数1922—1923年龄段和其后

各段，换句话说，要数饥荒时期二三十岁的妇女。上述观点，也许在其分龄别总生育率图表中表述得更为清晰（卡罗特，1984年，第10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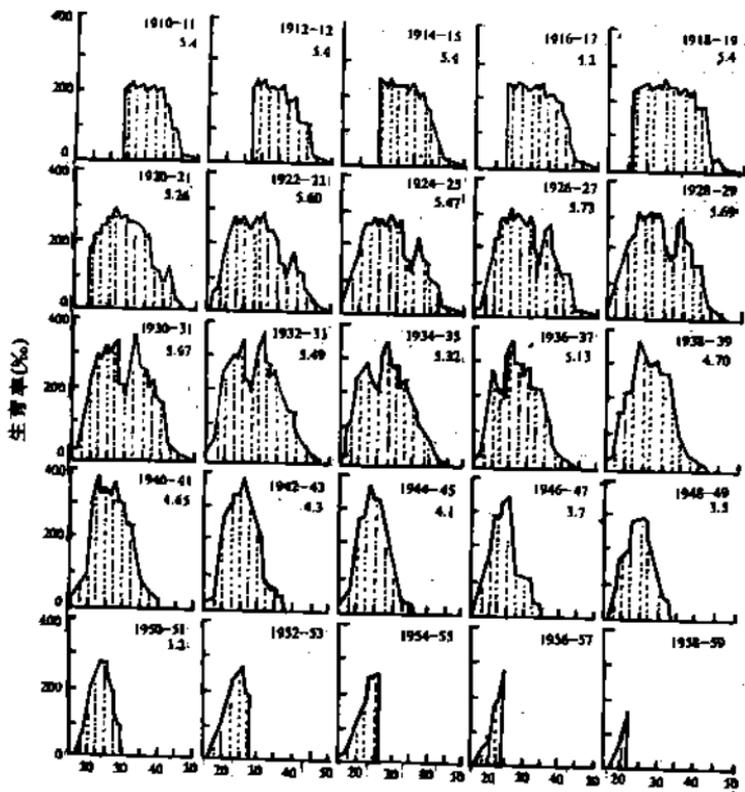
表 7.3 中国四川南泉公社各育龄段的平均生育间隔

育龄段	人数	成婚至 头胎	头胎至 第二胎	第二胎至 第三胎	第三胎至 第四胎	段平均 数*
1910-19	23	35	23	29	31	30
1920-24	23	32	23	30	29	29
1925-29	30	28	23	34	35	30
1930-34	37	31	31	39	38	35
1935-39	35	25	37	36	38	34
1940-44	28	24	24	27	33	27
1945-49	46	19	31	33	—	27
1960-64	54	15	37	—	—	26

说明：表中间隔为均一等分间隔。

资料来源：拉夫利，198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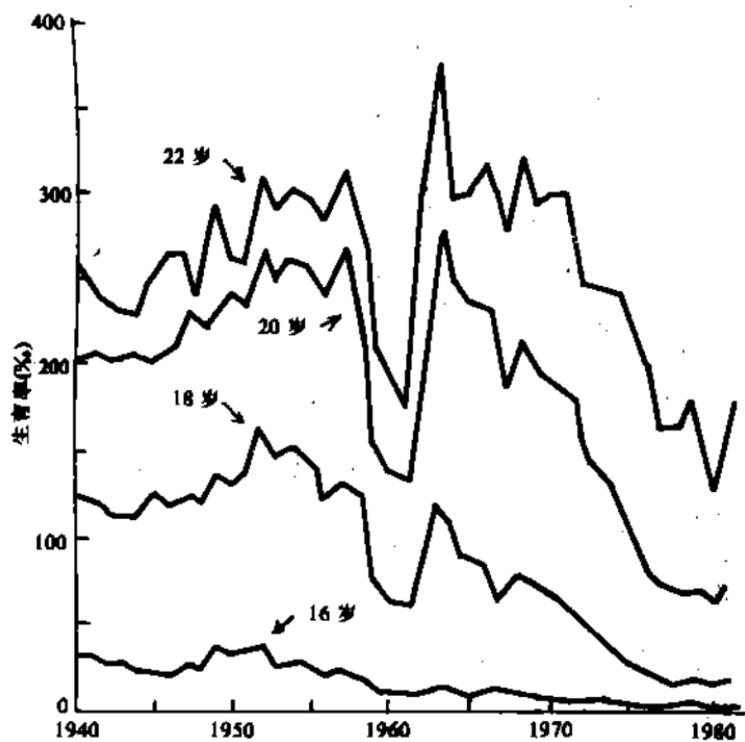
淮北平原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生育率下降（杨泉河，1985年，第41—45页）。为理解其下降情况，须对表7.4b中饥荒时期各种年龄段的划分及其年龄段与育龄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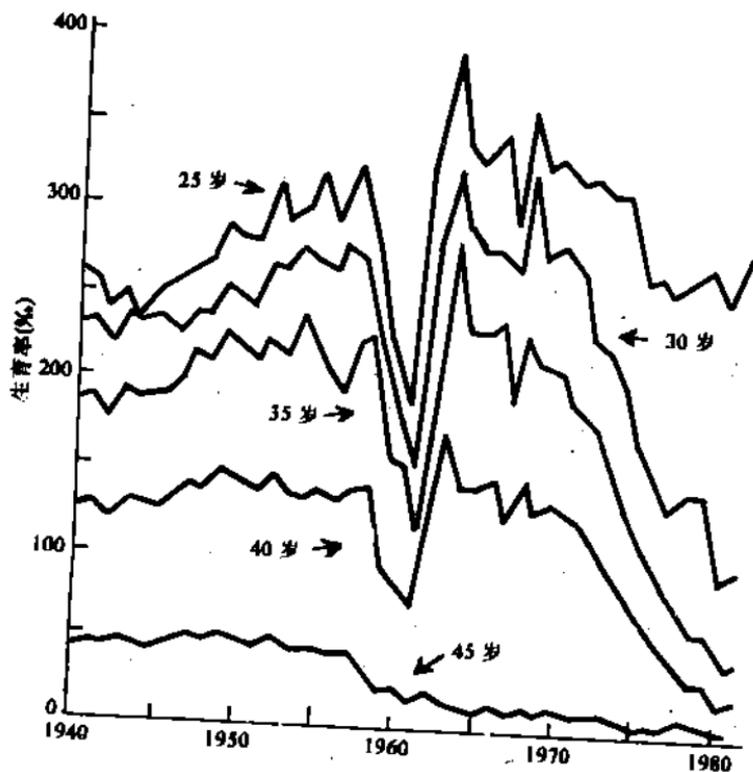


说明：每组标出的数字为总生育率

资料来源：卡罗特，1984年

图 7.5 中国 1910—1959 各年出生妇女的总生育率





资料来源，卡罗特，1984年

图 7.6 中国 1950—1981 年每千名妇女特定年龄段生育率

限于追溯性调查资料的裁夺，只得将受影响的各年龄段同其前后诸段相比较。饥荒期间 15—19 岁和 20—24 岁育龄妇女与以往同龄妇女相比，生育明显减少。20~24、25~29 岁和 30—34 岁各育龄段与其后继年龄段相比，同龄生育水平也相差甚远。饥荒过后的几年，各年龄段都有比预期值高得多的生育。遗憾的是，欠缺 35 岁以上育龄妇女饥荒期间的统

计资料, 不过, 所有较年轻的各年龄段都明明白白地显示: 饥荒期间生育锐减, 饥荒过后猛增。

表 7. 4a 1982 年对饥荒期间年龄段及其生育年龄的调查

按出生年份分段	1959—1962 年 饥荒期间年龄	相关生育年龄
1962—67	—	—
1957—62	—	—
1952—57	2—10	—
1947—52	7—15	—
1942—47	12—20	15—19
1937—42	17—25	15—24
1932—37	22—30	20—29
1927—32	27—36	30—34

表 7. 4b 安徽淮北平原各年龄段生育率 (每千名妇女)

调查时 年龄	生育年龄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15—19	4.5						
20—24	14.5	111.4					
25—29	12.5	174.3	268.3				
30—34	23.2	238.3	274.0	131.8			
35—39	34.5	278.3	291.0	158.8	44.5		
40—44	36.4	230.1	326.0	245.1	69.0	3.5	
45—49	69.7	234.3	253.4	283.7	171.3	36.5	3.5
50—54	83.1	247.4	198.4	229.2	211.9	75.1	8.3

资料来源: 杨泉河, 1986 年

饥荒期间, 城乡生育模式有所差异 (刘铮, 1985 年, 第

6 页)。

表 7.5 中国 1957—1965 年城乡生育率对比

年份	城镇	乡村	乡村与城镇之比
1957	5.943	6.504	1.094397
1958	5.253	5.775	1.099372
1959	4.172	4.323	1.036194
1960	4.057	3.995	0.984954
1961	2.982	3.349	1.123072
1962	4.789	6.303	1.316141
1963	6.207	7.784	1.254069
1964	4.395	6.567	1.494198
1965	3.749	6.597	1.759669

资料来源：刘铮，1985年

从表 7.5 可看出，城镇生育率的降低始于 1959 年，并自 1964 年起持续降低，仿佛绘出一种全面缩小家庭规模和广泛使用避孕药具的趋势。1960 年，降势有所加剧，但真正戏剧性地跌落发生在 1961 年。据韩素音讲，北京妇产医院 1959 年还是人满为患，1960 年则几乎空空荡荡。一位妇科医生告诉她，孕妇大都要求做人工流产。大量妇女闭经，其中多数是家庭妇女和女工，同时，有些妇女大出血或月经不调（韩素音，1980 年，第 293 页）。在农村地区，无任何迹象说明饥荒中断过全面改革家庭规模的趋势。1959 年，饥荒的影响已十分明显，1960 年进一步强化，1961 年达到顶峰。1962 年，城乡生育率都回升到灾前水平，且都于 1963 年达到顶峰。由此可见，城镇地区遭到饥荒全面袭击的时间是 1960—1961 年，

而在乡村，至少对部分乡村地区来说，1959年饥荒的冲击已十分严重。

迁移

假如中国50年代就强化控制人口迁移的制度，那么因循旧习选择流亡的饥民人数将大大减少。然而，内务部1957年春季的一份报告中说，前些年约有50万灾区农民离家出走，渴望在城镇谋取一个工作机会（拉迪，1983年，第37页）。可见对于由农村到城镇人口迁移的控制远不完善，尤其在出现食物严重短缺的地区。50年代，山西、河南、河北、贵州等省份的城乡差别——消费不足与高消费的差别——刺激着农民向城镇迁移，他们的动机不过是想混饱肚子（沃克，1984年，第124页）。尽管缺少确实可信的移民统计数字，但1962年中国官方公报中列明调整经济的十大任务，其中第四项说，“有必要将城镇人口以及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人数适度缩减。首先，劝告来自农村的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重返农村生产小组，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罗伯逊，1962年，第44页）。苏联断绝援助，造成许多工人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乡（顾顿，1983年，第303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曾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毛曾援引一个实例，说有个公社原有劳动力2—3万，猪和家禽收归公社所有后，有一万多劳动力离乡离土（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4页）。城镇人口1957年为9950万，1960年达到13070万，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20%，这一比例是1980年以前最高的。减少城镇人口的努力始于1961年，到1962年，净减人数为1600万（王思军和韩常先，1985年，第30页）。

1962年初发生的边境危机至今仍是谜。当时约63000

难民显然在受到鼓励的情况下离开中国，遭到香港政府拘押。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官方也承认，大批遣返城镇移民回乡困难重重（沃克，1962年，第51页）。但是，绝大多数越境者来自具有移民传统的广东省。1949年后，逃离人口众多的广东去往国外繁华之地的路线受到严密封锁。成千上万，主要来自印尼的海外华侨回乡定居，更使得人口增加。广东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2年春又遇到严重水灾。而来自英国移民局的理查德·休斯等新闻记者的报告说，大多数中国难民决非没有饭吃，甚至算不上营养不良（斯诺，1966年，第497—498页）。诚如索里罗金所言，质量和数量的不足都是相对的。尽管承受着人口压力，广东始终是富庶之地，收入很高（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侨眷的汇款），期望值也很高。当地居民自认为一贫如洗，而客观地讲，他们的情形远比其他各省要好，例如与安徽相比。

广东人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一心要移居国外，更不要说中国其他各地的人了。政府的控制固然使得移居有困难，但据一些70年代的移民讲，“我们早些年就可以合法移居海外。1959—1961年，大跃进让我们吃足了苦头，吃顿饱饭的时候都很少，可那会儿仍是傻干，从未想过出走。因为当时有种感受，自己正投身于建设新国家的共同事业”（帕里什，1984年，第114页）。考虑中国潜在的移民问题，对这种以中国为世界轴心的世界观和信仰，切不可低估。

据传闻，大批乡村居民，城里既没有亲戚，也无望获得其他援助，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漫无目标地寻觅食物。某些省份，整村整村被遗弃，侥幸活下来的人都逃光了。前面已提到开弦弓村的妇女弃夫出外乞讨，还提到过北方产棉区的人跑到南方，指望用布匹换取粮食。

人口调节

从人口统计资料看，人们用以缓解饥荒冲击的人口调节机制，包括通过晚婚或晚育避免增加吃饭的人口，将营养集中供给身强力壮和最有生产能力的家庭成员，争取进入食物较充足的城镇或另寻开辟更肥沃的土地。如果第五章所列举的某些地区 1958 年年底食物严重短缺的证据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出生率的降低于 1959 年首先发生在农村，倒与邦加茨和凯恩的模式相符。

早期食品危机对城镇的影响，也许尚未到足以造成出生率显著下降的程度，但 1960—1961 年，城镇和乡村出生率普遍下降则是严重危机的反映，1959 年进行出生登记的比例增长，说明在实行配给的情况下食物还是可以获得的，而 1960 年，出生登记比例再度减少，同样也勾画出灾难深重的图景，迁入城镇的人口同年也达到了最高峰值。

社会生存机制

没有人真正知晓何为对付饥荒的社会机制，以下所述，主要基于人们的见闻。从前是较富有的村民（大概因为家里壮劳力多一些）帮助缺衣少食的穷亲戚。土地改革和财产再分配后，结束了宗族占有财产的历史，较富有村民可拿出援助他人的东西数量有限。生产队取代地主富农，成为贫苦农民的靠山。生产队保证对其成员一视同仁。1958 年，互助组和生产队曾千方百计囤粮，这种作法根源于备荒的传统。他们争辩说，农民恪守的基本信条是生存必需的粮食不能调出县外（撒克斯顿，1983 年，第 100 页）。前一章已指出，农民为防止粮食从他们手中拿走所采取的作法，包括谎报人数，隐

瞒到手的粮食数量，藏匿粮食，甚至诉诸暴力手段。1958年，这些作法越演越烈。虽没有官方文件说明1959—1962年间各地瞒产拒交变得多么坚决，多么狡猾，多么不顾死活，但韩素音前往西安途中，亲眼目睹了二十多个农民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走，有的脚上带着镣铐。但她确信，他们无非是因饥荒铤而走险（韩素音，1980年，第288页）。

贮存粮食是为了确保向贫穷的农民和生产队提供口粮。地方干部对左邻右舍和亲戚们瞒产私分的要求通常抱着同情的态度，较高级别的公社和县一级干部同样企图将粮食储备在本地区合理分配，外调的粮食越少越好。

不过，并非总是上下协调一致。有部中国小说描述了关系紧张时的情况（张宜公，1981年，第534—586页）。主人公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铜钟，1960年春他用尽各种官方渠道来拯救村民。明明前一年粮食歉收，而野心勃勃的公社党委书记却虚报粮食产量。公社书记既怕讲出农民挨饿的真象被扣上右派帽子，又怕其谎言被揭穿。虚报产量的后果是多缴公粮，村民们只好饿肚皮。当李合法交涉无效后，带领全村从公社粮仓盗走粮食，为给保管员开脱，留下一张借条。事后，李立即主动投案，但甚至他在跨进法庭大门时，仍吁请县委书记设法救救一群在冰冷的火车站候车逃荒的人们。县委书记最终搞清了问题，打开县粮库分发口粮，结果被上级撤了职。李因心力交瘁，忍饥受寒而亡，死后仍被判犯下叛国重罪。直到19年后，李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部小说有几处描写很值得玩味。作者笔下的公社自1957—1958年成立之后，合作精神实际并没有形成。生产大队，即从前的自然村，实际具备强烈的集体意识，并决心保障每个队员的利益。盗取粮食原非他们的本意，故此留下

“借条”。县一级也有粮食储备，但那是上缴国家并准备运往外地的，县委书记对当地实情缺乏了解，而公社书记又能闭塞其视听。弄虚作假是大跃进的一大恶果。小说结尾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农民们纷纷到外县乞讨，指望着别的地方不会那么糟。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83年，第210页）中列举的一些证据则表明，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公社将收益转化为集体共渡难关的重要保障。自1961年始，国家才大幅度减少农业税收。而1960年与前一年相比，集体留存部分下降了三分之二，而且还要直接分配给翌年达到人口高峰的社员，此后各年直至1964年，社员收入分配始终保持高水平。尽管公社留存部分不多，但留做公益金的部分在1961年达到空前的高度。辅之以其他措施，公益金保障了鳏寡孤独者起码的生活水准，否则他们将很悲惨。对公社来说，最困难的是1960年，当时税收仍很高，没有什么可留作福利开销或储备金，还要考虑社员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受灾较轻的地区，前来投亲靠友的迁居者绝无可能从当地公社获得口粮，只有靠接收他们的亲友周济，迁居者如有可能将从事副业生产或帮助耕种自留地。

1962年春，政府计划派遣大批城镇居民去农村地区。韩素音的二哥告诉她，46%的北京干部要到农村帮助春耕，为的是保证有个好收成。韩说：“这也是让城里人体验农村生活的好办法。”二哥像从前一样纵声大笑（韩素音，1980年，第295页）。

较富裕的或城里的亲戚寄来的汇款对于缓解饥荒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原因有二，其一是可供出售的食物相对很少，不论自留地产品还是集市上出售的，且很难见到谷物。物以

表 7.6 中国 1958—1965 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
(人民公社) 的收入分配 (总收入=100)

年份	总支出	其中生产成本	净收入
1958	26.64	25.94	73.36
1959	26.77	24.89	73.23
1960	28.96	27.01	71.04
1961	28.70	24.48	73.30
1962	28.25	25.90	71.76
1963	28.31	26.25	71.69
1964	28.88	27.23	71.12
1965	28.18	25.05	71.82

净收入的分配

	国家税收	集体留成	其中： 公积金	公益金	社员收入 分配
1958	8.51	11.56	8.8	1.52	52.28
1959	10.00	12.35	10.32	1.79	60.70
1960	9.90	4.41	3.00	1.00	56.73
1961	6.41	8.79	4.20	1.98	60.10
1962	8.50	6.52	4.41	1.44	58.73
1963	6.54	7.01	5.15	1.52	58.14
1964	8.78	9.33	7.15	1.69	55.01
1965	6.60	8.93	6.68	1.43	57.2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3年

稀为贵，情况越糟，价格越高得吓人。再就是，饥荒持久不退，遭灾地区不断蔓延，方圆可到之处，无一村庄可提供余

粮给断粮的灾民。灾民在尚未遭受连年歉收饥荒初期，耗尽全部余粮的绝望时灾民才能用私人财产换到食物。

相反，城里少数富有家庭不仅确有能力和援助其亲友，而且几乎从未尝到困苦滋味。少数古老的在国际上享有声望的富有家族，共产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剥夺他们的。据香港报纸报道：“他们驾驶的是美国1961年生产的别克轿车，或中国制造的东风轿车，穿的是上等英国西装，抽的是英国‘富豪’牌香烟（毛泽东也喜欢抽这个牌子的烟），不惜花大价钱让太太小姐们做头发”（怀特，1984年，第160页）。

当部分农村地区粮食供应断绝时，农民改吃野生植物，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咱们以前不也挨过饿”，他们相互告慰。像过去那样，他们挖野菜，吃野果，勉强维生（赛珍珠，1984年，第246页）。中国农业属精耕细作型，土地又长期开垦，也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野生植物来满足规模营养的需要。鉴于以往的经验，于是又吃树皮。更有甚者，“将死人的骨头烤了吃”，极度绝望的人则干脆吃死尸（撒克斯顿，1983年，第181页）。

不过，大多数人对饥荒做出的反应并非那么戏剧化。工厂实行半日工作，以保存工人的体力（韩素音，1980年，第290页）。家庭自养鸡兔，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刘少奇的秘书们在办公室旁种上蔬菜，刘本人也与警卫员一道种菜豆。朱德元帅和夫人“别的不说，种南瓜是很出名的”（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304页）。由于食物短缺，食物被当作礼物送给领导人。例如，周恩来曾收到一些别人送来的鱼，但他命令手下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那些热心的官员，批评他们的举动。周认为，“这种举动无非是要像我这样地位的人享受特殊待遇和特殊权力”。有时送礼纯是出于慷慨之心。彭德怀元帅由于批

评大跃进，免职后还遭囚禁；而他将许多匿名送来的食品分发给当地农民和警卫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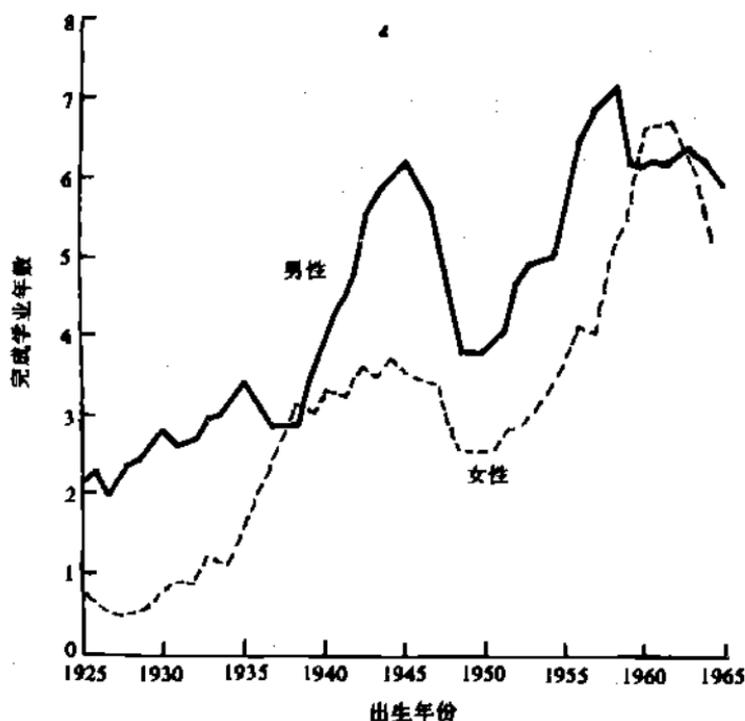
为了节省儿童摄自低限度的饮食的能量，尤其在冬季，营养值为提供热量而消耗的情况下，学校长期停课，再开学时也不强迫学生非上学不可。虽说免交学费，校方还是希望家长能交书本费和校餐费，并要求学生穿暖和些。随着饥荒进程，教育费用无疑是增加了。关于饥荒对教育的冲击，四川南泉的一份研究报告提供了难得的证据（拉夫利，1984年，第370—371页）。

从这个公社40年代后期出生段受教育情况的图示看，波谷表明男孩显然有两三年学业受到干扰，女孩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时间只有一年。事实上，女孩平时所受的教育也较少。

对饥荒应变机制的评估

若用雨果划分的饥荒应变类型（参见第二章）来验证，中国应付饥荒的实际情况与之基本相符。“缩减饮食”，“死亡率增加”，“生育率降低”等各项下的短期原位调节，恰是对中国经验的合理归纳。“工作”项下似乎可增加“缩短工时”，看来还可另辟“压缩教育”一栏，包括减少课时和入学人数。至于“外界援助”项下应添加几项，涵盖以生产队或公社为单位分享资源，分配福利基金等因素。短期高位调节的情况似乎与雨果模式不大相符，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迁移的实情不为人知，无论在总体规模上还是单就大饥荒期间而言。相互流动和限制迁移似乎都不够确切，“盲流”倒显得更贴切。关于长期调节，留待最后一章讨论，那是属于饥荒期间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以上分析，一方面确实显示中国人对饥荒的反应带有普



资料来源：拉夫利，1984年

图 7.7 南泉公社各男女出生段完成学业情况抽样调查

遍性，过去在中国也常见。另一方面，中国 1959—1961 年的经验确有显著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是由社会主义组织所决定的。50 年代，中国社会变革了某些传统关系。村社组织，而不再是血亲和宗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生产队或公社成为对抗饥荒的第一道屏障，且是食物短缺时期的首要救援基

地。地方福利基金则是赈济最贫困户的另一个公共保障。这种新型的组织在遏制逃荒方面所起的作用，不逊于官方制定的限制政策。最后，饥荒对城镇人口的影响表明，中央集权制经济体制在饥荒期间确实创造了一种没有经济差别和阶级差别的环境，这与其他社会制度下常见的情形截然不同。

第八章 饥荒的后果

政府与粮食短缺

1949年共产党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和根本问题，就是为全体中国人保证供应充足的粮食。为了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必须对农业生产进行某种形式的控制。有人指出，如果要缩短各省之间的差距，由国内生产粮食供应城市人口，消灭产量波动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政府就得调拨和控制大量的粮食（沃克，1984年，第41页）。50年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直接的有形的控制措施，是一项庞大的事业，在经济和物资方面出现了许多失误。然而，直到1958年，这些措施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政府获得了足够的粮食，进行再分配，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后，每年还剩余100多万吨粮食用于出口。此外，在整个50年代，粮食的转移意味着只上报了一次严重的地方性饥荒：1956年春天，有报告说广西饿死了550个农民，另有14500人逃荒他乡，乞讨活命。这一成就应该放到华北和西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生产急剧变化的宏观背景中进行考察。1954年，湖北、湖南和安徽遭灾，减产460万吨；1957年收成不错，江苏、河北、湖南、安徽和广西仍然一共损失了400万吨（同上书，第78页）。

不过，如果说政府确实防止了地方上的饥荒，却没有必要完全弥补损失。出现灾害时，政府减少农业税，不过看来减免程度往往低于减产。举例说，1954年，安徽还有湖南、河

北，遭到水灾，减产14%，但粮食税收仅减少4%（同上书，第48页）。50年代的生产发展减少了各省产量的差距，但政府的粮食收购政策似乎并未带来个人消费不平等的降低。

政府出现了许多的错误估计，看来是在走钢丝。每年的粮食总产量、收购总量、农村的粮食销售和净收购额都变化很大，极不稳定。沃克进行了详细分析（1984年，第45—57页），并“注意到政府确定‘合适’的收购水平是多么困难：必须高到满足国家的需要，但又不能激怒农民使其产生一种粮食补偿出售的强大压力，甚至毁灭整个粮食收购制度”。考虑到每年仅有总产量0.5%左右的余粮，交通运输体系又同样受到限制，政府能设法防止各地发生大饥荒，已殊为不易。然而，象1959—1961年那样规模的自然灾害和大饥荒，政府是很难加以控制的。

直到1958年，这个制度确实正常运转且行之有效。如前所述，那年这个制度的崩溃归结于大跃进旗帜下的政治混乱（拉迪，1982年），粮食收购政策的突然失衡（伯恩斯坦，1984年），或者因自然灾害农业大减产（艾什顿等，1984年）。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这场大饥荒的解释包含了上面的所有内容。

这份文件力图对中共党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尤其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权威性的评价。文件指出，1957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正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结果——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表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决议》得出结论，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委员会，1981年，第28—29页）。

笔者在研究中还注意到某些破坏政府本已十分脆弱的平衡的因素，包括农民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消费水平，农民毫不怀疑，生活会越过越红火，即便不是这样，政府也会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了深入理解1959—1961年大饥荒错综复杂的背景，有必要仔细研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危机——为什么政府的反应如此迟钝——以及政府所采取的遏制饥荒或防止类似灾荒在将来再度出现的措施。

对饥荒的最初反应

在我们的考察中，发现毛泽东所担任的角色并不与国家的角色完全一致。事实上，内部权力斗争是导致领导人迟迟认识不到1959—1961年饥荒的严重性的重要因素。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在苏联统治集团内开始实行集体领导以后，就有人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毛以前身兼数职，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现在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但在他之下有以刘少奇为首的四个副主席。控制书记处的党的总书记是邓小平。毛、邓和四个副主席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和邓小平对群众运动、大跃进和一轰而上搞人民公社不以为然，主张循序渐

进稳步推进、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工业基础。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初反应，集中体现在1958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在短短数年内向共产主义全面过渡，还是已经走过了头。如前所述，最后决定从全面共产主义化后退，开始“纠正”运动中的过激措施，抑制地方干部的热情。虽然毛提到了目前存在的“浮夸风”，显然，他和全会上的其他人依然相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宣称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翻了一番，达3.75亿吨，而最初他建议保守一点，宣布增产90%。当新的浮夸数字源源涌进时，毛决定发表3.75亿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大大低于最新的统计数字4.3亿吨，后者是根据各省上报的材料总计而成的（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21—122页）。

如果说六中全会致力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过激行为，那么，粮食问题已在其他地方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寄到海外亲戚的信详细谈到了1958—1959年冬天的城市粮食短缺。“猪肉一块钱一斤，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鱼。在黑市上鱼一块三到一块四一斤。”有人写道。另外一个人抱怨说，“有工作的人得到两个配给单位的副食品，可实际上根本买不到副食品……象虾仁这样的东西市面没有卖的”（同上书，第138—139页）。连蔬菜都没有，只有病人凭票能得到蔬菜供应。

广东（接到这些抱怨的华侨的老家）省委第一书记到一个公社进行调查，想弄清楚究竟是否真的获得好收成。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人们吃不饱。他发现确实有许多粮食，但是贮藏起来了。一个生产大队因加入公社而蒙受损失，大队干部承认隐瞒了粮食、钱和副食品，发现了本应上交公社的5588吨粮食和12000元钱。另一个大队贮藏粮食，以防止一

且公社垮台以后自己不饿肚皮，同时还有节余以便集中生产有利可图的副食品。在一阵阵强大的压力和威胁以后，“挖出”了越来越多的粮食，尽管其中有些粮食并不是真正的余粮。在全省电话会议上，他讲了自己的发现，估计全省隐瞒了三百多万吨粮食（同上书，第138—142页）。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这些活动和其他人类似的活动，更使领导人认为，问题在于如何向城市分配粮食。尽管个别地区因自然灾害歉收，1958—1959年冬天，这个看法从整体上看很可能是正确的。然则，不幸的是，这个看法与另外一个相关的假设密不可分，这就是：1958年收成特别好，所有的庄稼都收割回了仓库，农民隐瞒贮藏了大量的粮食。毛估计隐瞒的粮食达总产量的15%，宣称农民甚至隐藏了大量的粮食，进行武装守护（同上书，第152页）。

毛十分清楚，农民不如实上报他们的全部粮食产量的决心是根深蒂固的。大跃进期间和闹饥荒的时候，这种隐瞒进一步加剧，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隐瞒做法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直到1959—1961年以后还是如此，今天也没有改变。1971年欣顿报告说，农民几乎总是低估他们的实际粮食产量。“他们上报的产量越高，税收就越重，他们以公粮的形式卖给国家的粮食就越多”（欣顿，1983年，第739页）。他以山西的库伊（音）大队为例，它有一年少上报了5万多斤小麦。这个大队的一个妇女嫁了出去，但拒绝迁走，所以只得到官方公开的口粮，但大队隐瞒的余粮没她的份儿。她气冲冲地跑到公社告状。公社党委书记设下鸿门宴，邀大队干部一起喝酒吃饭。酒过三巡，大队干部就话多漏嘴，吹嘘他们大队如何增产。结果，大队不得不如数上缴，但没有其他惩罚措施。

最近的空中测量表明，农民为减少税收和公粮继续虚报粮食产量，而且，至少在中国部分地区，实际耕种面积大于上报数字（唐尼索恩，1984年，第60页）。

在准备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只利用了关于粮食生产的官方报告。这些报告已经过中国人或其他人的重新分析，以剔除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成份。这些经过修正的报告，无论是公社一级的、省一级或国家级的，几乎总是低估粮食产量；不幸的是，这是我们唯一能利用的数据。毛估计少报了15%，这个百分比可能太高了一点，但如果我们假定饥荒期间上报的粮食数字就是农民实际所能搞到手的一切粮食，则又是失之偏颇。

毛本人似乎同情那些“本位主义者”——试图守护自己生产的粮食的生产大队，同竭力要挖出隐瞒的粮食的省级官员发生冲突。他在一系列演讲中，警告过分平均主义的危险，反对过分削减富裕大队的口粮以运往贫穷大队（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47页）。毛的这种观点是出于现实的政治考虑，即直接向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发出挑战是愚蠢透顶的，同时也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即贫穷一点的大队和公社也有足够的口粮。结果，他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粮食再分配的“一盘棋”理论失去热情，“一盘棋”理论意味着更高的粮食收购水平和大规模的粮食调度。

显然，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对粮食大丰收和农村地区留下来的粮食数量没有把握，指示新华社搜集有关公社问题的资料。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1983年，第162页），邓认为必须通过其他渠道来补充党的信息来源，以便了解基层情况究竟怎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迹象，表明最高领导人对接到的报告持怀疑态度。以书记处会议上少得可

怜的资料看，党的领导人现在似乎对粮食生产问题和夸大产量感到不安”。

1958年晚些时候的几个月到1959年初，领导集团不得不为其他问题所困扰。为建立一个在毛去世后继续运转的新领导班子，刘少奇升为国家主席，1958年12月六中全会上予以批准。尽管毛事后抱怨说，他受到一个象“在自己葬礼上的死人”一样的对待，这在当时很可能是他为自己的未来所耍的手段。尽管如此，这使毛对自己余下的权力范围和他的影响有点神经过敏。

1959年3月西藏暴动，“这是1949年以后所发生的中国人在沿亚洲边境地区控制非汉族的长期战斗中最重要的事件”（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73页）。资金、物资、交通运输和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国内问题转到这个新问题上。由于来自毛的更稳重的同事的压力和日益增长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在庐山八中全会以前，到1958年7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他已不得不放弃前一年所持的大部分观点。人们强烈批评那些搞浮夸风的人或藐视法制法规的人，对平均主义也展开了进一步的批评。在许多地方，由于中央权力的恢复，因中下层干部的过热而产生的“半无政府状态”即将得到抑制。事到如今，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进行重新估计，表明早些时候宣布的数字纯属无稽之谈。同样明显的是，1959年也不会大丰收。西北地区持续干旱，损害了夏粮，并使后面庄稼的播种成为问题。另有若干省份遭到洪水袭击，尤以广东为甚。军队不得不将军事运输转向用船装运粮食，影响在西藏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最高当局似乎不相信一场严峻的危机就在眼前，或真正意识到局势是多么迅速地急转直下。

最后，彭德怀元帅对这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发出了挑战。彭出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一个哥哥活活饿死，家里的其他人被迫去讨饭。他在投身军伍以前在一家煤矿当童工。在部队，他初露锋芒，步步擢升。本世纪2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和军阀割据使他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部队加入红五军，在湘赣边界与毛会合。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副司令官，解放中国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最后又在朝鲜战场上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斯诺，1958年，第33—34页）。他生性耿直，从不拐弯抹角。在朝鲜战争中，有一次他被接到的命令所激怒，马不停蹄地赶回中国，不顾卫兵的阻挠，直奔毛的卧室，滔滔不绝地大发牢骚。最后，毛做了让步，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95页）。

在庐山会议前的几个月，彭德怀到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正如前文所述，他对自己的耳闻目睹感到震惊。中央不务实的气氛更使他感到恐慌。他决定给毛写一封长信，汇报他所发现的一切：用土办法炼出来的毫无用处的钢铁，做饭用的锅及其他家具和农用工具的毁坏，还有更要命的正在出现的严重的粮食短缺。他同时与中共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交换了意见，其中有些人开始公开发表批评意见。有人暗示说，彭德怀元帅发起挑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支持朱德元帅而不是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176—177页）。

毛认识到“有的同志已经动摇”，反对派将形成一股强大势力以后，立即在一次演讲中发动反攻，给反对派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标签。他承认犯了不少错误，但拒绝单独对这些错误负责，从而使其他高级干部只有招架之功。他坚持

认为，尽管出现了失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他明确表示，他的战友们必须在这个观点和彭德怀的已导致一场灾难性运动的看法之间作出选择，并威胁说，一旦他得不到全力支持，他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222页）。面对这样的选择，反对势力土崩瓦解。在八中全会上，毛继续发起进攻，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进攻和破坏总路线的人。彭不得不低头，在中央委员会进行全面的自我批评。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认定他领导了一个反党集团。他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送到北京郊区一所破破烂烂的房子里，实际上被隔离起来了。在那里，他潜心研究，着手建立了一个微型实验农场。直到1965年中央才考虑让他复职，把他派到四川，以大三线建委副主任身份，指导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第二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召回北京。从此，直到1974年他终于去世，经受了130次以上的审讯，备受折磨。

彭德怀的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领导集团迟迟没有发现中国粮食储备水平的真实情况，以及在1959年秋天再度歉收的情况下出现大规模粮食短缺的可能性。彭的挑战或许时机不对，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必须立刻改变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批评是多余的，而他关于即将来临的饥饿的警告，则淹没在范围更大的问题中，然而，他的挑战迫使毛发动反击，从而使任何进一步的批评都被看作是背叛革命的反党行为。

此外，领导人再一次全力以赴，处理外交问题。同苏联人的争吵愈演愈烈。就在庐山会议前夕，苏联人背信弃义，撕毁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技术的协议。他们已经在私下里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当毛要对彭发起反击的时候，接到

了赫鲁晓夫的一次公开演讲的正式文本。赫鲁晓夫说，本世纪 20 年代苏联那些对搞集体农庄想入非非的人，根本不懂共产主义，更不知道怎样建设共产主义（麦克法夸尔，1983 年，第 226 页）。两天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抵达莫斯科，为美国在那儿举行的一次博览会剪彩。随后不久宣布赫鲁晓夫将对美国进行回访。苏联与西方搞缓和及中苏关系的破裂，都是严重问题。再者，1959 年早些时候彭对苏联的友好访问，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动机的怀疑。

因此，1959 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跃进下人们养成的欺上瞒下的习惯积习难改，一些地方遭受水灾旱灾，却仍然宣称获得了大丰收。所以政府认为庄稼几乎没有遭灾。领导人仍然相信，农村地区贮藏了大量的粮食，可以挖掘出来支援那些被认为遭灾歉收的地区。为了填补这些地区的粮食缺口和供应城镇居民，1959 年的粮食收购水平，只以对该年的粮食生产估算为依据，是定得最高的，其完成情况也是创纪录的（伯恩斯坦，1984 年，第 355 页），这一年粮食大减产。为度过这艰难的一年，农民大多吃光了他们 1958 年留下来的储备粮（这些储备粮比领导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国家收购粮食以后，有的地方农民食不果腹。这一真实情况当时并没有暴露出来。1959 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承认发生了影响粮食产量的自然灾害，但继续谈论 1960 年新的跃进，需要继续发动群众运动，同右倾主义作斗争。

1959 年，外忧并没有结束，而是进一步恶化，延缓了人们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由于西藏暴乱，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加强了军事力量，最后竟在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建立哨所，边界争端逐渐升级为战争，苏联人一面关注西

方舆论，力图保持中立，从而证实了中国人他们已被莫斯科卑鄙地出卖的怀疑。随后的几个月，中苏争吵更加尖酸刻薄，针锋相对。1960年7月苏联人作出从中国立即撤走所有顾问的灾难性决定，使中苏争吵达到顶峰。“显而易见，苏联撤走顾问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坚定了毛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邓小平把苏联的立场描述为完全否认中国的国内政策。没有几个反对大跃进的中国人会接受如此羞辱的条件”（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282页）。

外交事务是1960年中央委员会先后召开的六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很可能是其他几次中央会议的主要议题”（同上书，第293页）。从6月到12月，党的书记处的两位主要官员多半出席国际会议，可以假定，其余的时间用于就这些国际会议征询同事们的意见。政治局四分之一的成员在莫斯科出席长达一个月的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毛承认，1961年外交事务处于优先考虑位置，使中国领导人对国内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苏联撤走近1400名专家，撕毁343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放弃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此外，1960年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耗尽了农村地区余粮储备，而1959年因粮食征购水平大大超过实际情况，农村储备粮已消耗殆尽。

或许已经稍有保留的乐观情绪，经受不了旱灾的炙烤和洪水的冲击。1960年3月下旬开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呼吁为粮棉增产10%，生猪出栏率增长35%而奋斗。整个50年代，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是很低的，尽管在大饥荒发生以前对农业的援助和投资都稍有增加，但1958—1959年这个趋势又急剧逆转。1960年，国家进行了新的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努

力，以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1959—1960年，国家对农业的支援为50亿元，同时银行对农业的贷款达67亿元，这是自革命以来最高的农业投入（许，1982年，第110页）。

表 8.1 国家 1953—1964 年对农业的支援

年份	对农业的支援占 国家总支出的 %	对农业的投资占 国家总投资的 %
1953	6.5	13.8
1954	5.6	11.1
1955	5.6	10.9
1956	7.5	14.4
1957	8.1	
1958		10.5
1959	4.1	19.5
1960	4.1	18.0
1963	16.0-18.0	
1964	16.0-18.0	

资料来源：许，1982年

在中国领导人的夏季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提出了“调整”、“巩固”、“提高”的新政策。显然，他的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8月份再次向周恩来提出，周末作大改便批准了这个政策。计划官员向毛递交了一揽子紧缩措施，重新获得了对经济运行的控制；毛别无选择，只得批准实行这些措施。麦克法夸尔（1983年，第324页）指出，毛随后发出的指示敦促放弃一些工业项目，让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岗位，与其说是一道指示，倒不如说是对一些省份已

经开始主动采取的措施予以事后认可。

工厂关闭了，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重新肯定了生产大队作为拥有所有权和核算权的基本单位的地位。集体收入的更高部分由农民分配，鼓励农民耕种自留地和从事副业生产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农村市场恢复了，人们休假的权利重又得到保障。在终于认识到中国没有更多的粮食以后，便大量从国外进口。

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要求外援，或至少应该接受国际红十字会主动提供的救灾援助（艾什顿等，1984年，第631页）。这种观点忽视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当时中国还不是象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有效动员起来，提供援助。除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外，没几个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共产党人把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人驱逐出大陆以后，美中便已交恶。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中美关系更趋紧张。西藏暴动，中印边境日渐升温的紧张局势以及与苏联人的裂痕日益扩大，使中国人脆弱到了危险的顶点。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外面的世界知道发生了饥荒，但对其严重性则各持己见。要求援助就得提供全部实情。在当时的形势下，相对而言，其他国家不失时机利用如此规模的大饥荒给中国政府造成的致命弱点敲竹杠的可能性，比提供救灾援助要大得多，因此中国领导人很难改弦更张寻求外援。另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感到很难对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承认饿肚皮，那怎么可能向美国或其他国家“点头哈腰要吃的”呢？外交部长陈毅如是说（同上书，第631页）。

对饥荒的长期反应

6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再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支持闹革命。“显然，政府担心以前的贫下中农对共产党的感恩热情正在急剧下降。同感恩密切相联系的中国人的另一个观念……是忠诚”（昂格尔，1984年，第129页）。毛1962年早些时候的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试图提醒农民注意，现在的生活比土改前还是要好的。尽管最近发生了一些危机，革命的果实是主要的。除了意识形态的说教外，还必须立即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恢复农业生产。

到1961年，重建了近4万个地方市场。一年后，所有农村地区四分之一的商品交换通过市场进行。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县级以下的生产计划被取消。谷物的收购价上升了25%，但各种经济作物，如花生、油菜籽和烟草，价格涨幅更大。相对谷物而言，这些经济作物的产量也增长得更快。由于农副产品涨价，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和市场的繁荣，农业得到较快恢复（拉迪，1983年，第44—45页）。

“农业第一”的政策最初是1959年制定的。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直接投入，但调整了工业内部各部门的优先发展顺序，如增加了对化肥厂和农业机械厂的投资。这个政策还鼓励农村各自上一些小项目，促进了“五类小工业”即水泥、煤炭、钢铁、化肥和农业机械的发展。这些项目的上马，不象大跃进时那样一窝蜂上，而是量力而行，大力提高小规模生产的技术水平，提出适当的设计蓝图，制定产品质量标准（王，1982年版，第140页）。

在大跃进运动的积极结果中，有一项现在往往被人忽视，就是在教育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威恩斯，1982年，第108页）。大量的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走出实验室，在农村蹲点进行试验，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人们达成共识，首

要问题是以多学科方法指导一切研究项目，重点研究如何全面改进现行农业生产制度，对低产地区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总而言之，到大跃进结束时，农业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

结果，一旦饥荒造成的混乱结束以后，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就涌现出来。例如，不同品种的矮秆高产水稻的推广，各种品种的新的杂交玉米的引进，全国性的分工合作的良种培育体系，造价低廉的打井技术和大批量的抽水机的广泛使用及机械作动力的饲料粉碎机的大量生产。60年代，从这些技术发明中获益最多的是华南地区，因此经常扩大各地经济增长的差距。尽管如此，技术革新为粮食增产创造了美好前景。

1960年以后，一方面某些领域的计划权恢复集中管理（包括粮食限额的收购），同时鼓励发展地方工业、副业生产和种自留地，恢复更多的农贸市场，从而使可供利用的粮食日益增加。不幸的是，60年代人口增长很快，从1962年到1972年人口净增1.99亿。毫不夸张地说，增产的粮食全部让新增加的嘴巴吃下去了。

人们似乎是从饥荒中得出的教训是，政府通过再分配对付大规模自然灾害，仍然困难重重。相反，提出实行各地粮食自给政策。“深挖洞，广积粮”成为大饥荒后毛最持久的口号之一。这样一种政策对于前游击队领导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也被看作任何持久战中最重要的防御措施。“地方自给的概念是分散各地、自给独立的地方武装开展消耗战所要求的军事战略的元素之一”（拉迪，1983年，第50页）。另外，这同中国人的自豪和其他的在一切领域中独立自主的告诫非常合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如此。

各地自己生产和储存粮食的政策，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即降低政府必需的收购水平，消除农民的怨恨情绪，使农民不

再偷偷摸摸地私藏粮食。大跃进的后果之一，是政府对统计资料变得毫不信任。尽管没有取消逐级上报制度，政府官员却以将信将疑的态度对待这些统计数据。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许多高级政府机关被冲垮了，许多必需的统计审计部门遭到清洗。直到70年代中期，才做出真正努力，培养训练统计分析员，系统搜集资料并切实分析下面送上来的报告。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为依据，要实行“一盘棋”战略所必需的复杂的粮食收购制度，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对农业的投资日益集中在所谓的“高产稳产”的种植谷物的地区，甚至那些不适宜于种植谷物的地区也有一部分耕地作出牺牲改种谷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后果之一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赚钱越来越少，导致农业内部分配效率的下降和许多非谷物食品人均消费水平的下降。用产量控制来代替粮价控制，把达到自给的负担从国家转嫁到农民身上。说得简单些，粮食自给的代价就是“强加在粮食生产者头上的一种税赋”（拉迪，1983年，第29页）。产量控制还掩盖了企图实现自给的高昂代价，即领导人根本就不知道农民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而通过价格刺激来提高产量就得大量增加政府的财政补贴。决心为城市工人提供农副产品物价补贴就意味着粮价涨幅大受限制，不足以鼓励额外生产或销售，或者既不能刺激生产也不能促进流通。长期以来，政府重点扶持重工业基地的发展，耐用消费品不足，抑制了农民消费水平的较快提高，这也挫伤了农民增加生产的积极性。

1957年粮食耕种面积达到顶点。实际上，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耕地面积下降约10%，同一时期谷物耕种面积在耕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也略有下降。尽管总产量增加了，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人均粮食供应水平还稍低于1957年

(国家统计局, 1982年, 第154, 184页)。其他类型的食物(主要是肉类、水果和食糖)的生产有所发展, 但同食用植物油和豆腐的产量降低相比较, 拉迪认为, 70年代中期中国人从食物中摄取的平均热量似乎并不高于1957年的水平。

不同地区为粮食自给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有大有小。同相对而言谷物种植条件优越地区农民的收入相比较, 谷物生产不能自给的地区农民的收入下降了。1957年以后, 各人民公社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了(弗米尔, 1982年; 格里芬, 1982年; 弗米尔, 1982年)。由于实行一种主要是由各公社自己负责动员需要的财政节余来发展农业的政策, 有余粮的地区因粮价上升和农产品增产而获益匪浅, 从而开发自己的财源投资农业, 改进农业技术, 发展有利可图的副业和小工业。这些公社被人们描述成进入了“良性循环”(佩因, 1981年, 第159页)。另一方面, 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公社获益甚少, 拼命提高产量以赶上他们行将面临的人口增长速度, 正是经济落后导致了人口的高速增长。

收入差距并不能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的差距。政府作出努力保证最低消费水平, 实行生活必需品配给供应, “提倡节俭, 反对铺张浪费, 鼓励使用集体所有的耐用消费品蔚然成风”(佩因, 1981年, 第162页), 对医疗卫生教育事业进行补贴或实行免费的卫生教育制度。然而, 1980年有报告说, 大约一亿农民的粮食配给量不到150公斤(佩因, 1981年, 第164-165页)。兰普顿注意到(1978年, 第531页), 农民仍然易于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害。他发现1972年旱灾以后, 一些地区的公社合作医疗福利降低了。

一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以后, 农民的利益就越来越为人忽视, 因为毛越来越担心, 新的自鸣得意的官僚主义阻碍了

继续革命的发展，从而必须采取行动消灭阻碍进步的新官僚主义。文化大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动荡比在城市要小得多，对农民造成的冲击比对干部要轻得多。当然，这个概括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欣顿（1983年）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村庄及其公社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和四川的动荡不安，正是动乱使这个省直到70年代末才对外国人开放并毁灭了它的农业经济（唐尼索恩，1984年）。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文化大革命并不象大跃进运动那样，让农民卷入激烈的漩涡之中，农民的组织形式或经济活动从来没有象50年代那样面临如此急剧的变革。一直到70年代晚期，只是略有变动（佩恩，1981年第175页）。

甚至70年代初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的运动，包括企图重新把生产队的权力交回大队和最终交回公社，废除农民自留地这样一些措施，也是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在执行的时间上也很有弹性，而不象1958年的“定指标”运动。这是一场“学大寨”——模范大队——运动。1976年后，大寨大队就因虚报数字而遭到抨击。甚至在大寨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很明显，许多公社对于学大寨不过是口头说得热闹而已。有关地方干部和农民在实际执行上面的政策时如何钻政策的空子的证据，还是相互矛盾的：看来，一些地区之所以发生许多变化，是由于热心的干部忠实地执行政策，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这些政策则非常策略地被人忽视了。

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大饥荒的一个严重后果，如果说不完全令人吃惊的话，就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烟消云散。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在中国众说纷纭，争执不休，涉及到爱国主义问题、保卫祖国

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至少 50 年代晚期对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进行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凯恩，1987 年）。1957 年，由于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马寅初加入讨论，这场大辩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还有其他人，都主张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三年后，1960 年，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他原先提出来的观点突然变得不能接受了。他被指责为“马尔萨斯主义”，蒙受耻辱。此时，中国政府远不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而是面临死亡率直线上升的严峻形势。在随后的十多年中，由于马寅初的失败，再加上缺少人口方面的统计分析资料，许多计划人员没有认识到人口增长的严峻形势，使所有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都不能接受了。当然，与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相一致，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和解放妇女，政府鼓励人们采取避孕措施，实行有计划的生育，少生孩子。

饥荒人口学理论表明，饥荒之后出生率便立即上升。正是由于人们担心再次发生饥荒，所以多生孩子，人口增长居高不下，有人指出，当死亡的危机威胁着生存的时候，人们就倾向于多生孩子，希望他们的孩子中有些能够劫后余生，在大自然的灾祸中幸存下来传宗接代。1959—1961 年中国的大饥荒表明，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在城市地区，饥荒之后人口增长的高峰持续时间极短，紧接着便是持续下降。甚至更让人信服的是，饥荒以后的十年内农村地区人口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这种下降同样是戏剧性的。

从 5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在城市和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另外，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妇女走上工作岗位和参与决策，这一切似乎足以导致出生率的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又反过来为日益明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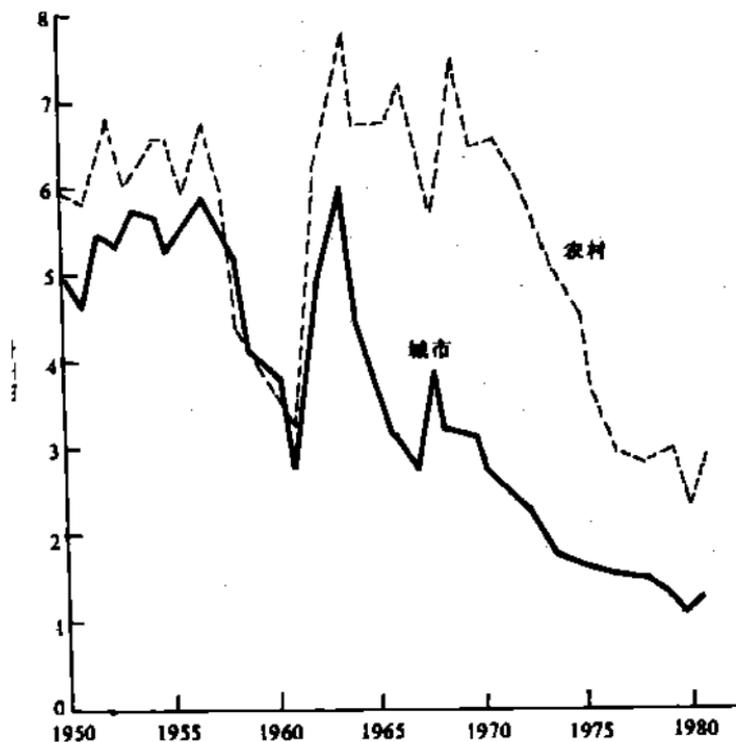


图 8.1 中国 1950—1981 年城乡出生率

资料来源：凯恩，1985 年

提倡小家庭的政策所强化。1971 年前后，政府大声疾呼减少家庭人口，缩小家庭规模。这一模式甚至在那些由于大饥荒人口惨重伤亡的地区也能发现，如四川的什邡县（拉夫利，1984 年，第 371 页），淮北平原和安徽（杨泉河，1985 年，第 77 页）。这样，一方面，持续的高出生率理论在那些没有多少

社会变革而又面临饥荒的地区或农村地区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很明显，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变，这种行为模式（即多生孩子）迅速改变。所谓生活环境的变化，甚至还包括食物供应的急剧变化或个体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两点在中国农村都没有发生。

尽管农民仍然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伤害，农村的生育行为模式还是可能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原因我们可以从考察 1980—1981 年河北和湖北遭到严峻的旱灾和水灾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得到启发（联合国救灾处，1982 年）。

1980—1981 年：防止饥荒

据估计，1980—1981 年湖北的水灾使 1840 万人的年收入损失了 30—80%，而在河北，由于天旱，1370 万人的年人均收入损失了大约 40%。在湖北，21 万所屋房被毁，另有 30 万所房屋遭到损坏，15 万个蓄水工程被冲毁或部分被毁，2 万亩木材被冲毁，30 万亩鱼场被毁，许多牲畜被洪水冲走。

救灾工作的行政机制是生产队上报所受损失，包括受灾人口、庄稼损失的初步估计，预计短缺多少粮食，以及其中有多少能从地方上的储备粮中拨出救济。这些资料整理上报民政部。省、市、地及县各级临时建立特别救济小组，由有关各部和各局的代表组成，以协调各方的救灾工作。救济粮的配额逐级决定，一直到生产队。生产队干部拟定各家各户需要分到多少救济粮的初步计划，然后组织社员集体讨论后决定，由所在的生产大队出具书面证明，最后由公社批准。在政府批准的人均每天八两粮食，或大约 1400 卡路里的范围内，每个人的配给量是根据需要和他对生产所做的贡献的大小来确定的。所以，老人和孩子的配给量比成人农业劳动力

要少。配给粮一般只有谷物。配给卡或食品券发放到遭灾的各家各户，各家各户凭券到商店和粮店领取配给粮。商店保留一份详细准确的记录，在每个人的配给粮单上，领取配给粮的人必须签字。

1981年，中国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请求联合国救灾专员对湖北和河北两省的受灾损失作出评估，并表示希望得到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家的帮助。该年3月，捐献的救灾物资和款项开始到达中国，分批送往灾区。那些既得到政府救济又得到国际援助的地区，根据救济物资的来源，印制和散发了各自的配给单，看来救灾官员和农民都非常清楚救济物资来自何处。尽管中国人对国际援助十分珍惜，但只占政府自己的救济供应的很少一部分。不过，得到国际粮食供应的保障，使中国人能够从现存的储备粮中拨出粮食，因为这些储备仓库能够重新得到补充。

1954年大水灾后，用了三年时间来修复房屋和安置灾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0—1981年湖北发大洪水以后，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灾民的重新安置工作，这主要归功于“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互助”（同上书，第18页）和军队的支援。在河北滴雨不下遭旱灾的地区，也动员群众抢险救灾。除用车运水外，还安装新水泵，挖新井或提高现有水井的出水量，但战胜这里的旱灾更费时日。

1982年，联合国救灾处考察团对湖北和河北两省受灾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进行了调查。湖北荆州地区（总人口1060万）的两个县是遭洪水袭击的重灾区，流行血吸虫病，1980年前每年有案可查的血吸虫病例达10万例。水灾对四十多万人进行体检，发现20万人染上了血吸虫病，其中有17万人立即得到治疗，恢复了健康。几种疾病的发病

率在水灾期间明显上升，第二年又降了下来。

考察团还发现，有人因得了B型脑炎和重肝炎而死亡。在因妇科病接受治疗的妇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月经不调。据信，这是由于在水中浸泡时间太长，惊恐和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不足引起的。

表 8.2 湖北荆州地区 7 种常见病的发病率 (1979—1981 年)

病 名	1979	1980	1981
痢 疾 22170	44351	20000	
肠道寄生虫病	77514	22380	178569
伤 寒	1095	1368	约 1300
疟 疾	56319	112182	60000
佝偻病	2381	28571	19841
营养不良	1198	42857	21825
沙 眼	15665	104761	82340N

* 表内数字为报告的病例

资料来源：联合国救灾处，1982 年

灾荒期间，与营养有关的疾病发病率，以及营养不良本身，都明显上升。上表中有关儿童的营养不良和佝偻病的数字，其营养不良的水平是根据一些人体测量方法主要是年龄一体重比来确定的。洪水消退后立即对总人口中的 22.12 万多人进行检查，诊断出甲种营养不良（不超过平均水平以下的 10%）和乙种营养不良（在平均水平以下的 10% 到 40% 之间）。领到食品救济的人中也有人有营养方面的危险：由于对牛奶不熟悉，在里面加入了一些其他东西后引起腹泻和其他并发症。不过，卫生部门迅速行动，告诉人们如何吃东西，这

个问题便解决了。

这些数字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国农民处于营养不良的边缘。人们并没有为灾荒规定一个基本的进食量。象佝偻病那样的病发病率上升表明，即使在水灾以前，许多儿童也没有营养平衡的饮食表。

洪灾之后为数甚巨的人遭受传染病之苦，正如联合国救灾处考察团指出的，这些病人构成一个“已经膨胀的传染病人集团，并进一步传染这些疾病”（同上书，第26页）。然而，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行病，发病率的上升也得到了控制。政府的卫生防疫计划安然无恙，象平时一样发挥作用。“很明显，尽管该地区的医疗卫生部门遭到严重冲击，如医院和医疗设施毁于洪水，病人急剧增加，但仍能有效运转，成功地使人民的健康状况维持在平时的水平。这是自该制度建立起来所受到的最高赞赏……”。

河北生活水平比较低，水的供应本来就紧张，只有一半人口的饮用水符合健康标准。天旱使许多水源变得“不能令人满意”。谷秆和其他用作燃料的作物秆大量减少——有一个地区燃料短缺总量相当于16万吨煤——甚至烧开水都十分艰难。旱灾期间得肝炎的人翻了一番。在河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的衡水地区，得肝炎的人中80%以上是年龄不到15岁的孩子。这个地区患伤寒的病例从1979年的34例上升到1980年的251例，但令人惊诧的是，痢疾发病率下降了。

在河北省，人民的营养状况总的来说是很低的，甚至在收成最好的年景，饭桌上也很少有肉。在丰收年景，夏天有新鲜蔬菜吃（同上书，第30页）。大旱期间，有的人家卖掉一点可怜的家当（如家具）来买些粮食，人们剥树皮吃树叶。天旱使许多孩子没有吃的，营养不良，染上了佝偻病和贫血

病，还有，由于缺少维生素C牙床出血，缺乏维生素B引起的口腔炎，等等。1981—1982年冬天又发生冬旱，大大阻碍了河北省的抗灾恢复工作。

在衡水地区，由于庄稼被毁，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再也无力付钱来支撑合作医疗，为社员治病。即便在正常年景，这个地区的医院也由于有些病人付不起钱而负债1.5万元。这笔钱由政府补贴。1980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三分之一。医务人员注意到，到医院看医生的病人病情很严重，但病人所在的单位则越来越出不起钱为他们治病。虽说如此，河北省的公共防疫计划仍然发挥了作用，严重的旱灾并没有带来象诸如可防疫的牛痘苗一样的传染病在儿童中广泛泛滥。

联合国救灾处考察团指出，1949年以前，这样规模的自然灾害会造成人口的大面积死亡。粮食救济和重新安置计划的成功，以及国际援助的有效分配，应归功于（见上书，第35页）：

第一，长期建立起来的包括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组织机构，迅速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参加救灾工作；

第二，临时建立的特别救灾小组；

第三，各级领导、干部、军队同人民一起，积极参与建设和重建工作；

第四，党政领导干部的日常督促；

第五，国家提供贷款和其他方便，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如蔬菜生产，捕鱼，手工编织及运输等，从而帮助农民获得额外收入；

第六，从邻近的地区动员大量的机械设备来抽出积水，打井和犁田种地；

第七，从邻近的地区、厂矿企业和邻居那儿得到许多捐款捐物，如现金、衣服和粮食等；

第八，县、省和中央各级政府及时提供现金、财政和物资援助。

结论

联合国救灾处考察团对中国 1980—1981 年水灾和旱灾以后救灾组织工作的评估，我们对 1959—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考察，为笔者在本书导论中提出来的剩下的问题，至少提供了部分答案，这就是：现存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在多大程度上给人们的交换权利带来变化。当然，1959—1961 年的情形同 20 年后的形势大不一样。1980—1981 年的自然灾害要轻得多。由于各国的承认，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得到改善，到那时这个国家已是联合国成员国。中国可以对外呼吁援助，部署军队救灾抢险。统计资料得到搜集和分析，政府据此采取行动。医疗卫生福利制度在 30 年的风吹浪打中愈益巩固完善。国家的组织体系也巩固完善起来，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在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形成一股凝聚力，紧密团结起来。

尽管如此，在这两起紧急情况中，也有一些共同的模式。政府通过粮食配给制度，努力在社区内公平分配食物。基层组织，即生产队和大队管理所能弄到的一切食品，并且公平分配，各家各户指望从生产队和大队而不是从亲朋好友那儿得到帮助。高一级的组织，公社、县或许还有地区，动员人力和物资投入救灾工作。由于中国的结构，这种动员迅速有效。在这两次自然灾害中，由于提供了救济的物资并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生产，灾区得以迅速恢复。

所有这些模式都证明了协调的集体努力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即大家面临共同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致行动，共同分享可资利用的资源。即便在1959—1961年的饥荒中，这样的集体努力和态度，也很可能保护了那些最脆弱的地区或个人免受不相称的伤害。这些并不足以防止人口的大面积死亡。人们饿死路旁乃当时环境及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所致。1980—1981年有限的天灾，证明了上述措施所能取得的成就。

这些因素的一部分，是由于现存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比混合经济或自由市场经济能更有效地控制粮价和分配粮食，也能更迅捷地把资源转到受灾区域，无论是机械设备的动员、额外商品的运送、人力的支援还是金融投资，都帮助灾区创造新的收入。不过，这种制度的潜在弱点是比其他制度更依赖单纯的统计资料。一旦统计体系崩溃，就象大跃进期间中国所发生的那样，就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市场报告，来证明据以决策的信息是否被扭曲或者甚至毫无价值。

我们发现的在1959—1961年和1980—1981年两次自然灾害中共同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似乎更受制于社会内部高水平的组织机构的存在，一个尤其复杂和有效的管理体系。这样的组织机构并不必然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经济的显著优点。举例说，如果英国面临深重的自然灾害，他的组织和行政机构能否迅速地鉴别出人们的需求，保证公众的口粮供应，采取措施防止流行病的广泛泛滥，并管理好给灾区的捐款捐物？这是有争议的。

或许，人们更加争论不休的是，在英国——我们仍然沿用上面那个例子——人们是否对当地情况如此了如指掌，并就每个家庭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进行讨论，或者是否忠于

当地、对共同的目标产生认同感。这些使当地的自救努力发挥了最大作用，把腐败和投机牟利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说森在使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这个词组时将它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他偶尔有这个意思，那么，我认为，在这两次自然灾害中，中国人的某些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于这个制度特有的特征上。

第一个这样的特征就是组织和组织内的信息交流能一杆子插到底，一直贯彻到最底层，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简单的官僚和民众。确实不错，中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也是最复杂而且常常是最庞大的官僚机构，包括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但是，我们能够每个村庄发现超越这种官僚政治之外的职能，对村庄生活的某些明确界定的方面负责的干部，如医疗卫生或生产活动。这些干部对他们的邻居很熟悉，而他们的邻居也非常了解他们，这样，发生饥荒时他们很容易了解左邻右舍各家各户的需要，贪污腐化或偏心眼儿的事情也相应减少了。他们帮助当地社区形成共同的目标。1959—1961年，尽管政府大大提高了粮食的收购的水平，他们肯定组织村民或至少默许村民私自隐瞒粮食。1980—1981年整个救济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控制流行病，持续开展疾病预防工作，就是由于这些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干部的辛勤工作。

其他重要特征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即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为人民的未来生活创造了美好的前景或前途。尽管中国过去的30年让人有一种幻灭感——社会动荡不安，政策左右摇摆，大清洗以及农民自己做出的太大的牺牲，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饥荒造成的“士气衰落”并没有导致农民暴动和政府垮台，对此，我们这些事后知道当时饿死了多少人的，或许比当时的评论家更为惊讶！

何以如此，我们只能略加推测。或许，象过去一样，看到那些奸商巨贾或地主恶霸吃得肥头大耳，而穷苦百姓面有菜色食不果腹，农民并没有怒不可遏揭竿而起。如今人人平等的感觉——人民“站起来了”，可能给每一个人——无论活下来的人还是倒毙路边的死者——一种解放前闹饥荒时陈尸野外别人连姓甚名谁都不晓得的人所没有的尊严。整个社区都惨遭不幸的感觉，使人们更容易忍受。当然，人们认识到社区提供了尽可能公正的帮助，福利基金用于保护那些受灾最重的人，肯定巩固了这种新制度的理论基础。1980—1981年，河北和湖北证明了这些现在“建立已久”的包括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组织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1959—1961年闹饥荒的时候，农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把新形成的兄弟般互助友爱的感情扩大到大队或公社的范围以外，未能意识到其他地方同样的乃至有的情况下其他省更为急迫的需要，或者把中国看成一个大家庭，那么，这一切并没有阻碍这种感情在当地的发展。

从根本上说，森的问题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能否防止饥荒发生；是否粮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消灭，收成不好时农村人均收入减少物价上涨，农民买不起吃的，能够使自然界发生的灾祸得到控制。我们这里进行的研究并没有找到证据，让我们在回答这个根本问题时能毫不含糊地做出肯定回答。确实，1980—1981年的救灾工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怎样防止总人口超过一亿的中国两个省的人——除少数几个国家外，比别国的总人口还多——免遭饥荒的典型例子。无论用哪一个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它向我们表明，当我们无法向灾区大量捐钱捐物时，还能做些什么。

然而，它并没有向我们表明，足够规模的自然灾害不会再度在中国引起饥荒。如上所述，粮食产量的增长仅能勉强跟上中国的人口增长的步伐，使80年代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仍然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只略高于50年代。同过去一样，这个人均数量还掩盖了各省之间以及各省内部的极大差距。中国农民再没有让洪水淹到脖子上，不过洪水也没有消退得太多。中国政府从1971年开始努力降低人口增长速度，从1978年开始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在当时甚至是罕见的运动，旨在从长远来看减少总人口。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由于认识到了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的艰难。现在中国人口超过了10亿，尽管计划生育政策获得成功，但由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偏低，到本世纪末将增长到12亿到13亿。如果出现了1959—1961年时的情况，粮食减产四分之一，许多省遭到天灾的袭击，那么，毫无疑问，肯定会再度出现严重的饥荒。

现在有效率的统计监督制度，能够在危机的早期阶段向政府发出警告，从而减轻饥荒。这样政府就能更现实地制定粮食收购水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使中国人有能力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更多的粮食，她与其他大国目前的关系，以及作为联合国的一员，意味着可以得到外援。但是，一旦发生象1959—1961年那样规模的自然灾害，所需要的数量确实非常可观：1982年粮食总量的25%就是9000万吨。为了说明中国的减产对世界其他地方将产生多大需求，我们来看看主要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的情况：1982年，澳大利亚小麦总产量才1640万吨。

运输救济物资的交通运输网络已经得到改善，并在继续发展，但最近的一份报告（德尔夫斯，1985，第51页）说，铁路运输能力已经饱和，主要是来自东北的煤，使铁路不堪

重负，占铁路运输总量的 38%，是中国工业的基础（主要是沿海和东部沿江省份）；与此同时，中国的公路里程比印度的还少三分之一，而 85% 以上的公路都够不上级，不宜通行重型卡车或全天候使用，大约 25% 的公路是土路。在城市之间或地区之间，没有修筑与铁路体系相应的公路网络，一旦发生大危机，迅速输送大批粮食的前景并不美妙。

如果出现了第二个 1959—1961 年，中国接到足够多的粮食，迅速分发到为数甚多的受灾省份尤其是边远地区，及时缓解人们的疾苦，防止没有吃的转变成闹饥荒和饿死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联合国救灾处所描述的 1980—1981 年采取的防止饥荒发生的措施，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死亡人数，但在这种环境下这些措施简直不足以防止饥荒发生。

如此说来，同人们在其他地方的经历相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能否以不同的更好的方式来防止或控制饥荒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个有保留的回答。在控制天灾的影响方面，计划经济确实比其他经济更具潜力；要控制潜在的饥荒，就必须有一个高效率的行政机制；这两个因素都是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中最常见的。社会主义还为人民共同利益承担了义务，帮助减轻人民的痛苦。这些因素可能消灭了由于阶级差别而引起的饥荒，或者那些规模较小的饥荒。然而，在任何大国，或者贫穷得只能勉强吃饱肚皮的交通落后的地区，要完全防止饿死人是不会可能的。所幸的是，规模很大的自然灾害不常发生。相反的假设是没有依据的，因为最近几十年很少发生，而我们这个世界也学会了如何对付自然灾害。

参 考 书 目

Aird, John S. (1982)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8, no. 2. pp, 267-97.

约翰·S·艾尔德：“中国的人口研究和人口政策”

Alamgir, Mohiuddin (1980) *Famine in South Asia* (Delgcschlager, Gunn and Hain, Cambridge, Mass.)

莫由津·阿拉姆格：《南亚的饥荒》

Alsop, Joseph (1962)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1, pp, 21-37.

约瑟夫·艾尔索普：“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Antonov, A. N. (1947) 'Children Born During the Siege of Leningrad in 1942', *Journal of Paediatrics*, vol. 30. no. 3, pp. 613-45.

A·N·安东诺夫：“1942年列宁格勒遭围困时期出生的儿童”

Ashton, Basil, Hill, Kenneth, Paizza, Alan and Zeitz, Robin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 pp. 614-45.

巴兹尔·艾什顿、肯尼思·希尔、艾伦·佩扎和罗宾·蔡茨：“中国的饥荒，1958—1961”

Aydrøyd, W. R. (1974) *The Conquest of Famine*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

W·R·艾克罗伊德：《被饥荒所俘获》

Bader, Hugh D. R. (1979)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Macmillan, London) .

休·D·R·贝克：《中国的家庭和宗族》

Banister, Judith (1985a) 'Surprises and Confirmations in the Results of China's 1982 Census',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vol. 4, pp. 456-78.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Florence, 5-12, June 1985.

朱迪思·班尼斯特：“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中的令人吃惊之处和确认”

Banister, Judith (1985b)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2, pp. 241-71.

朱迪思·班尼斯特：“中国人口近期数据分析”

Barker, Randolph, Sinha, Radha, and Rose, Beth (1982)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

伦道夫·巴克、拉德哈·辛哈和贝思·罗斯：《中国和农业经济》

Bernstein, Thomas P.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pp. 339—91.

托马斯·P·伯恩斯坦：“斯大林主义，饥荒和中国农民：大跃进时期的粮食征购”

Bhatia, B. M. (1967) *Famines in India, 1860—1965* (Asia Publishing House, Bombay) .

B·M·巴蒂亚：《印度的饥荒，1860—1965》

Bland, J. O. P. and Blackhouse, E. (1910)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 (Heinemann, London) .

J·O·P·布兰德和E·布莱克豪斯：《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Bohr, Paul Richard (1972)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 1876—1884',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vol. 48.

保罗·理查德·博尔：“中国的饥荒和传教士”

Bongaarts, John and Cain, Mead (1982) 'Demographic Responses

to Famine', in Cahill, Kevin M. (ed.) Famine (Orbis Books, New York) .

约翰·邦加茨和米德·凯恩：“人口统计对饥荒的反馈”

Boyle, Phelim P. and O' Grada, Cormac (1982) 'Fertility Trends, Excess Mortality a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费利姆·P·博伊尔和科马克·奥格拉达：“生育率趋势，过量死亡和爱尔兰的大饥荒”

Buck, Pearl S. (1969; reprint 1984) The Three Daughters of Madame Liang (Methuen, London) .

赛珍珠：《梁太太的三个女儿》

Cahill, Kevin M. (1982) Famine (Orbis Books, New York) .

凯文·M·卡希尔：《饥荒》

Caldwell, J. C. , Bracher, Michael, Santow, Gigi and Caldwell, Pat (1984) Population Trends in China—a Perspective Provided by the 1982 Censu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26—31 March 1984.

Caldwell, J. C. , Reddy, P. H. and Caldwell, Pat (1984) Periodic High Risk as a Cause of Fertility Decline, paper presented at an IUSSP/NIRA Seminar on Social and 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Mortality, Tokyo, 24—27 November

J·C·考德威尔、P·H·雷迪和帕特·考德威尔：《作为人口出生率下降一个原因的阶段性高风险》

Calot, Gerard, (1984a) 'Donnees nouvelles sur l'evolution demographique chinoise. I; Les recensements de 1953, 1964 et 1982', *Population*, vol. 39, nos 4-5, pp. 807-73.

杰勒德·卡罗特：“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材料。I：1953、1964、1982年……的人口统计”

Calot, Gerard (1984b) 'Donnees nouvelles sur l'evolution demographique chinoise. II; L'evolution de la fecondite et de la nuptialite.....', *Population*, vol. 39, no. 6, pp. 1054-63.

杰勒德·卡罗特：“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新材料。I：多胎和结婚率的演变”

Calot, Gerard (1985) 'Unenotlon interessante; l' effect moyen des generations soumises au risque II; quelques exemples d'application', *Population*, vol. 40, no. 1, pp. 103-30.

杰勒德·卡罗特：“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处于危机时期的数代人所起的作用，I：一些实例”

Cantillon, Richard (1755)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 Henry Higgs (trans) (Macmillan, London, 1931); reprinted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 pp. 725-31.

理查德·坎特隆：《商业本质概论》

Carlson, Dennis G. (1982) 'Famine in History: With a Comparison of Two Modern Ethiopian Disasters', in Cahill, Kevin M. (ed.)

Famine (ORBIS books, New York) .

丹尼斯·G·卡尔森：“历史上的饥荒：近代埃塞俄比亚两次灾难比较”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81) 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 1949—81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9—1981》

Cheen Da (Ta Chen) (1946)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2, no. 1 Part 2, PP. 1—126.

答陈：“近代中国的人口”

Chen, L. C. and Chowdhury, A. K. M. A. (1977) 'The Dynamics of Contemporary Famin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Conference, Mexico 1977, Ordina, Liege.

L·C·陈和 A·K·M·A·乔杜里：“当代饥荒的动力学”

Coale, Ansley J. (1981)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7, no. 1 (March) pp. 85—97.

安斯利·J·科尔：“中国的人口趋势、人口政策和人口研究”

Coale, Ansley J. (1984)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

— 82 Committee on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y, Report 27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

安斯利·J·科尔：《中国人口的快速变化，1952—1982》

Croll, Elizabeth J. (1983) *The Family Rice Bowl; Food and the Domestic Economy in China* (UNRISD with Zed Press, London) .

伊丽莎白·克罗尔、迪莉娅·达文和彭尼·凯恩：《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Crook, David and Crook, Isobel (1959)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

戴维·克鲁克和伊沙贝尔：《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变革》

Crook, David and Crook, Isobel (1955)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

大卫·克鲁克和伊沙贝尔：《杨仪人民公社的最初年月》

Currey, B. and Hugo, G. (1984) *Famine as a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Reidel, Dordrecht) .

B·柯里和G·雨果：《作为一种地理现象的饥荒》

Delfs, Robert (1985) 'On to the Fast Trac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9 August (reporting on a confidential World Bank Report) .

罗伯特·德尔夫斯：“开上快车道”

Denberger, Robert F. (1982) 'Agriculture in Communist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Barker, Randolph, Sinha, Radha and Rose, Beth (e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

罗伯特·F·德恩伯格：“共产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农业”

Donnithorne, Audrey (1970) *China's Grain: Output, Procurement and Trad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奥德丽·唐尼索恩：《中国的粮食：产量、征购和贸易》

Donnithorne, Audrey (1984) 'Sichuan's Agriculture, Depression and Reviva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12, pp. 59—85.

奥德丽·唐尼索恩：“四川的农业：萧条和恢复”

Eckstein, Alexander (1962) 'Comment—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2, pp. 19—25.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评‘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Eckstein, Alexander (1977)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

Fei Xiaoto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tze Valle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

费孝通：《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

调查》

Fei Xiaotong (1983) *Chinese Village Close — up* (New World Press, Beijing) .

费孝通：《中国农村特写》

Fei Xiaotong (Hsiao—tung Fei) and Chang Chihi (1949)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

费孝通和张之毅：《乡土中国》

Garcia, Rolando V. and Escudero, Jose C. (1982) *Drought and Man; The 1972 Case History. Volume 2: The Constant Catastrophe; Malnutrition, Famine and Drought* (Pergamon Press, Oxford) .

罗兰多·V·加西亚和乔斯·C·埃斯库德罗：《旱灾与人：1972年的事件》（第2卷）

Greenough, Paul R. (1982)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4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保罗·R·格里诺：《近代孟加拉的繁荣和苦难：1943—1944年的饥荒》

Griffin, Keith (1982)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Rural China; Comment on E. B. Vermeer', *China Quarterly*, vol. 92, pp. 706—11.

基思·格里芬：“中国农村的收入差别：评E·B·弗米尔”

Groen, Henry J. and Kilpatrick, James A. (1978)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Vol. 1.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SA, Washington DC.

亨利·J·格罗恩和詹姆斯·A·基尔帕特里克：“中国的农业生产”

Gu Xingyuan and Xie Mailing (1983) 'Vital Statis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72 (supplement).

顾兴远（音）和谢美玲（音）：“关键数字”

Han Suyin (1980) My House Has Two Doors (Jonathan Cape, London).

韩素音，《我的屋子有两扇门》

Hill, Kenneth (n. d.) 'Demographic Trends in China 1953—198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肯尼思·希尔，“1953—1982年中国的人口统计趋势”

Hinton, William (1966) Fanshe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威廉·欣顿：《翻身》

Hinton, William (1983) Shenfan (Pan with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

威廉·欣顿：《身翻》

Hoffman, Sandra L. (1985) 'Response to Determinants of Natural Fertility Reconsidered',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9, pp. 163-8.

桑德拉·L·霍夫曼：“对经过重新考虑的人口自然出生率的决定因素的反应”

Hsu, Immanuel C. (1975)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伊曼纽尔·C·许：《现代中国的兴起》

Hsu, Robert C. (1982) *Food for One Billion; China's Agriculture Since 1949*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

罗伯特·C·许：《十亿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

Hugo, Graeme J. (1984) 'The Demographic Impact of Famine: A Review', in Currey, B. and Hugo, G. (eds) *Famine as a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Reidel, Dordrecht) .

格雷姆·J·雨果：“饥荒对人口统计的影响”

Jiang Zhenghua, Zhang Weimin and Zhu Liwei (1984)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for China's Populat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26-31 March 1984.

蒋正华、张为民、朱力为：《中国人口生育期望值初析》

Johansson, Sten (1984) *A Swedish Perspective on Sex Ratios and*

Other Intriguing Aspects of China's Demography, paper presented at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26—31 March 1984.

斯坦·约翰森：《瑞典人对中国人口统计中男女比例和其它有意思的问题的看法》

Kane, Penny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USSP/NIRA Joint Seminar on Social and 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Mortality, Tokyo 24—27 November, 1984.

彭尼·凯恩：《中国大饥荒（1959—1961）》

Kane, Penny (1985) 'Patterns of Chinese Fertil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13, pp. 97—108.

彭尼·凯恩：“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格局”

Kane, Penny (1987) The Second Billi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Penguin Books, Melbourne).

彭尼·凯恩：《第二个十亿：中国的人口和家庭计划》

Kincannon, Louis and Banister, Judith (1984) Perspectives on China's 1982 Censu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26—31 March 1984.

露易斯·金坎农和朱迪斯·班尼斯特：《中国1982年人口统计面面观》

Kirkby, Richard (1985) 'Mao and the Peasants, Review of Rural

China Today, by Frank Lecming (Longman, 1985)', China Now, vol. 112, pp. 31-3

理查德·柯克比：“毛与农民：今日中国农村评论”

La Dany, L. (1962) 'Comment -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2, pp. 28-33.

L·拉丹尼：“评‘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Lampton, David M. (1976) 'Politics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Policy Outcome in China: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Health Polic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 no. 1, pp. 43-9.

戴维·M·兰普顿：“中国的政策与政策结果的决定因素：文革后的保健政策”

Lardy, Nicholas R. (1982) 'Food Consump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arker, Randolph, Sinha, Radha, and Rose, Beth (e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

尼古拉斯·R·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粮食消费”

Lardy, Nicholas R. (1983)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

Lavelly, W. R. (1984) The Rural Chinese Fertility Transition: A Report from Shifang Xian, Sichuan', Population Studies, vol. 38,

pp. 365—84.

W · R · 拉夫利：“中国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Li, Lillian M. (1982) 'Feeding China's One Billion; Perspectives from History, in Cahill, Kevin M. (ed.) *Famine* (Orbis Books, New York) .

莉莲 · M · 李：“养活中国十亿人：历史的观点”

Li Chengrui (1984) *An Analysis of China's Statistical Sources and The Reliability During the Decade of Turmoil (1967—76)*,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李成瑞：“十亿人口的普查”

Li Chengrui, (1985a) *The Reliability of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Florence, 5—12 June,

李成瑞：“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 1982 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

Li Chengrui (1985b) 'Economic Reform Brings Better Life', *Beijing Review*, 22 July, vol. 28, p. 29.

李成瑞：“经济改革带来好生活”

Liu Ts' ui—jung (1981) *The Demographic Dynamics of Some Clans in the Lower Yangtze Area, c. a. 1400—1900*,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vol. 9, no. 1, pp. 115—60.

刘翠荣：“公元1400—1900年长江下游某些家族的人口动力”

Liu Zheng (1985) 'Population Changes in China 1949—82',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2, no. 2, pp. 1—13.

刘铮：“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状况的变化”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罗德里德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大跃进，1958—1960》

Macleish, Roderick (1962) 'Comment—On China' a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2, pp. 38—42.

罗德里克·麦克利什：“评‘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Mallory, W. (1926) *China—Land of Famin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6*.

W·马洛里：《中国——饥荒的国度》

Malthus, Thomas Robert (1978)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thony Flew (ed.) (Pelican Classics, 1970) .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

Millis, Roger (1984) *Serpent's Tooth* (Penguin Books, Melbourne) .

罗杰·米利斯：《蛇的牙齿》

Mosher, Steven W. (1983) *Broken Earth: The Rural Chinese* (Free Press, New York) .

史蒂文·W·莫舍：《破碎的大地：农村里的中国人》

Mosley, W. Henry (1977) *Nutrition and Human Reproduct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

W·亨利·莫斯利：《营养与人的再生产》

Myers, Ramon H. (1970)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970—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的发展》

Paine, Suzanne (1981) 'Spatial Aspec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ssues, Outcomes and Policies, 1949—79',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7, no. 2, pp. 133—95.

苏珊娜·佩因：“中国发展的空间问题：问题，结果和政策（1949—1979）”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威廉·L·帕里什：“中国的大分层”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86—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86—1968）》

Pillsbury, Barbara L. K. (1981)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China: Clarifying the Questions of Siz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 no. 2, pp. 35—58.

巴巴拉·L·K·皮尔斯伯里：“中国的穆斯林人口”

Population Census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1982) *The 1982 Population Census of China (Major figures Information and Agency, Hong Kong)*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主要数字）

Population Census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1983) *Major Figures by 10 Percent Sampling Tabulation of the 1982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ment of Statistics,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Beijing*)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2 年人口普查百分之十抽样调查主要数字

Ran Yugang and Xie Quibin (1983)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in their First Marriage , and the First Birty in Connection with Women', in *An Analysis of a National One Per Thousand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in Birth Rat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special issue) . Beijing.

冉玉刚、谢秋宾（音）：《初婚和头胎妇女简析》

Razzaque, Abdur (1985) 'Effects of 1974—75 Faamine on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Rural Bangladesh', MA thesis,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阿布德·拉扎克：“1974—1975年的饥荒对孟加拉国人口统计的变量的影响”

Roberts, Rosemary A. (1985) 'Politics and Pathos, The Reappearance of Tragedy in Chinese Rural Litera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13, pp. 85—95.

罗斯马丽·A·罗伯茨：“政治和悲怆：中国农村文学中悲剧再现”

Robertson, Frank (1952) 'Comment—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2, pp. 42—5.

弗兰克·罗伯逊：“评‘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Rodzinski, Witold (1984)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 (Flamingo, Fontana, London).

威特尔德·罗德津斯基：《围墙中的王国：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中国史》

Rong Shoude et al. (198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 1973—75', Symposium of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 edited by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Beij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China Academic Pub-

lishers, Beijing) .

龙·肖尔德等：“对 1973—1975 年中国人口估计寿命的数字分析”

Ruzicka, Lado T. and Chowdhury, A. K. M. A. (1979) Demographic Surveillance System—Matlab Vol. 4: Vital Events and Migration, 1975 (Cholera Research Laboratory, Dacca, Bangladesh) .

拉多·T·鲁齐卡和 A·K·M·A·乔杜里：《人口统计的监督体制》

Sen, Amartya (1981)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阿马蒂亚·森：《贫穷与饥荒》

Shanor, Rick (1985) ‘Peng’ s Memoirs Chronicle His Rise, Fall; Review of Memoirs of a Chinese Marshal by Peng Dehuai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Beijing Review, June 10, vol. 23, pp. 33—4.

里克·沙诺：“《彭德怀自述》中对其兴衰史的回忆”

Silberman, Leo (1960) ‘Hung Liang—chi: a Chinese Malthu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3, no. 2, pp. 257—65.

利奥·西尔伯曼：“洪亮吉——中国的马尔萨斯”

Smedley, Agnes (1955) The Great Road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

艾格尼丝·史沫德莱：《伟大的道路》

Snow, Edgar (1966)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Gollancz, London) .

埃德加·斯诺：《大河彼岸》

Sorokin, Pitrim A. (1975) *Hunger as a Factor in Human Affairs* (University of Florida) .

皮特里姆·A·索罗金：《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因素的饥饿》

State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1983) *An Analysis of a National One Per Thousand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in the Birth Rat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special issue, Beijing.*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分析》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1983)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Economic Information and Agency, Hong Kong)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

Stavis, B. (1982) 'Ending Famines in China', in Garcia, Rolando V. and Escudero, Jose C. (eds) *Drought and Man, The 1972 Case History. Volume 2: The Constant Catastrophe* (Pergamon press, Oxford) .

B·斯塔维斯，“中国正在消灭的饥荒”

Stein, Zena and Susser, Mervyn (1977) 'Famine and Fertility', in Mosley, W. Henry (ed.) Nutrition and Human Reproduction (Plenum Press, New York).

曾纳·斯坦和默文·萨塞尔：“饥荒和人口出生率”

Stone, Bruce (1982)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ome National Aggregate Examples 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Art', in Barker, Randolph, Singh, Radha and Rose, Beth,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布鲁斯·斯通：“农业统计数字的用途”

Suris, Frederic M. (1978) 'China's Grain Trade' China's Economy Post-Mao. Vol. 1,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弗雷德里克·M·萨尔斯：“中国的粮食贸易”

Tawney, R. H. (1932) and Labour in China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R·H·托尼：《中国的国土和劳动力》

Thaxton, Ralph (1983) China Turned Right 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拉尔夫·撒克斯顿：《中国向右转，农民世界的革命合法性》

Tien, H. Yuan (1985) 'Provincial Fertility Trends and

Patterns' in Croll, Elisabeth. Davin, Delia and Kane, Penny (eds)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Macmillan, London)

H·袁进：“省级的人口出生率趋势和格局”

Undro (1982) *China Case Report; Drought and Flood in Hebei/Hubei Provinces 1980-81*, Case Report no. 011 (Office of the UN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or, Geneva) .

联合国救灾处：《中国灾情报告，1980—1981年河北省的旱涝灾害》

Ungar, Jonathan (1984) *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in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乔纳森·昂加尔：“中国农村的阶级体系：个案研究”

Vermeer, E. B. (1982a)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Rural China', *Quarterly*, vol. 89, pp. 1-31.

E·B·弗米尔：“答基思·格里芬”

Walder, Kenneth R. (1962) 'Comment—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China Quarterly*, vol. 12, pp. 45-51

肯尼思·R·沃克：《评—‘论中国正在衰落的士气’》

Wang Sijuan and Han Changxian (1985) *The Problem of China's Rate of Urbanisation and its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Population Research*, vol. 2, no. 2, pp. 29-36.

王思军（音）、韩常先：《中国城市化速度问题和近期城

市人口分布》

Wang Weizhe (1984)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Population Death Rate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na's 1982 Population Census, Beijing 26—31 March 1984.

王维志：“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析”

White, Lynn T., III (1984) 'Bourgeois Radicalism in the "New Class" of Shanghai, 1949—69', in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林恩·T·怀特第三：“上海‘新阶级’中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Wlens, Thomas B. (1982)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Barker, Randolph, Sinha, Radha and Rose, Beth (e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托马斯·B·威恩斯：“技术变化”

Wolf, Arthur P. (1984) 'Fertility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3, pp. 443—70.

阿瑟·P·沃尔夫：“革命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

Wong, Christine Pui Wah (1982) 'Rural Industrialisation in China', in Barker, Randolph, Sinha, Radha and Rose, Beth

(eds)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and Croom Helm, London) .

克里斯廷·王培华 (音):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

Yang Quanhe (1985)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Huaibei Plain, Anhui Province, China 1982’, MA thesis,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杨泉河 (音): “1982年中国安徽省淮北平原的人口出生率和计划生育”

Zhang Yigong (1981) *The Story of Criminal Li Tongzhong*, Selected Novellas of 1979—80 vol. 1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Beijing) summarised and discussed by Rosemary A. Roberts, ‘Politics and Patho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vol. 13, pp. 85—95.

张宜公 (音):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Zhao Xuan (1983) ‘State of Women’s First Marriage in Forty—Two years from 1940 to 1981’, in *An Analysis of a National One Per Thousand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in Birth Rate. Population Economics* (special issue) Beijing.

赵旋: “1982年全国妇女初婚生育情况调查报告”

译者的话

彭尼·凯恩是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国的大饥荒》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自然灾害很有影响的著作，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版。它详细记叙和分析了中国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起因、发生和发展，政府的对策，饥荒造成的惨重损失。书中以大量的材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这场大灾难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尤其是婚姻状况、生育率变化、人口流动等几乎方方面面的影响，生动地把困难时期人们求生存的种种方法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样重要的是，本书还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因旱涝灾害造成的饥馑，提供了1980—1981年河北、湖北旱灾的材料，并对中国今后的粮食情况作了预测。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把中国发生的饥荒与孟加拉、埃塞俄比亚、荷兰等世界上几次大饥荒进行了比较，对中国政府的救灾措施给予了肯定。当然，由于作者站在西方立场上，且掌握的材料不够全面，书中的某些结论，尤其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人们千方百计生存下去的手段等的描述有一定的片面性，谨供参考。

总的来说，该书内容全面，材料丰富，描写生动，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学者对中国自然灾害的研究情况。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难免，欢迎指正。

全书分工如下：

郑文鑫 译第一、二章

戴龙基、王华 译第三章

戴龙基 译第四章

曹宏举、刘铁栋 译第五章

吴会艺、尉颖颖 译第六章

李晓宪 译第七章

毕健康、翁萍 译第八章

全书由冀飞校订，孟庆龙统稿，李庆红做了许多文字工作。

译者

1993. 5. 13

Famine in China, 1959—61

Demograph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Penny Kan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RG21 2XS

and London

根据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年版译出

ISBN 7-309-0465-3/D·126 定价 4.50元